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35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新燕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25 印张 165 千字

199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ISBN 7-80023-138-0 / K · 172

定 价：3.20 元

目 录

文 献

- 谈神府调查的体会 张闻天(1)
〔附〕新发现的张闻天农村调查史料述评 张兆宪(5)

回 忆 录

- 动乱中的八年 伍修权(13)
√ 回忆和平解放西藏 李 觉(80)

人 物 介 绍

- 张闻天传略 程中原(118)
陈翰笙事略 吴友文 田野(188)

专 题 资 料

- √ 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军区党史办(212)

文献考辨

为《湖南致中央函》辨白 吴荣宣(243)

史料介绍

苏联珍藏有吴玉章的《八一革命》手稿
..... 李良志(255)

谈神府调查的体会

1942年4月22日

张 闻 天

编者按：为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我们特发表他1942年在山西兴县调查期间在晋西区党委干部会上的一次讲话记录。这篇讲话深刻阐述了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和调查方法的体会，其中的一些宝贵思想对于今天广大干部深入实际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记录稿由《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提供并拟标题。

过去领导同志作决定的时间多，许多东西好像发报机一样的发下去。但须知执行这些决定的是广大村庄中的群众。我们检查工作经常是检查干部，但检查老百姓很少。而老百姓是在自然村。要真正的了解我们政策法规执行的情形，必须深入到自然村里去。我们一切政策法规的执行者是老百姓。今天要使党的方针决议执行下去，基本的方针是深入到自然村。

只要我们把老百姓的情形了解清楚，那么我们的政策及办法，就会更加实际。在落后的中国，经过抗战后的农民究竟如何？熟悉老百姓的情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

点。

我们所做的所喊的是离老百姓太远了。老百姓对付“党八股”的办法是不看。他们说“解不下”。开大会老百姓听不懂，等于强迫受训，等于服抗战勤务。群众所想的所了解的，与我们所了解的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农民出身的干部，也是讲“党八股”的一套。

反对“党八股”基本上是如何与群众联系起来的问题。革命工作的出发点是群众，是为了提高群众。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我们的政策法规。调查一个村，范围是很小的，但与转变整个工作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把农村的阶级关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主义不同，就是它是以阶级为出发点的。我们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是以阶级为出发点的。所以要把复杂的阶级关系搞清楚。

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即使有，也是很零碎的。而大部分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太少了，这是过去调查研究的最大缺点，特别是生产力太少了。因而农民感到政治是我们的，农业是他们的。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查，开始要作学生，将来要帮助老百姓提高一步。了解了基本问题之后，一切问题就都明白了。了解了基础，然后再去研究党政民各方面的问题。了解了经济基础，我们的政策就可以放在巩固的基础上。

我们工作中会发生许多意见争执，但我们的意见根据

究竟是什么？许多同志在机关内忙的很，政府、群众团体经常开会，但问题解决不了。正确的办法，是去调查了解群众生活情况，若是我们对物质基础了解了，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现在调查的地区兴县是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从这里开始是第一步。我们到一个地方，首先要找支部和村民谈，了解一般的情况，个别的要和整个的东西联系起来。要掌握每个村的政治地理等特点。调查本身也是实际工作第一，特别是知识分子，首先是实践。表格不过是个参考。更具体的作法是在实际工作中发展。

贺家川的调查经验，是抓住一个自然村作深入的调查，这比走马看花要好的多。调查应该由最具体的东西调查起，由个别的事物个别的人调查起，只描写一个轮廓是不行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分析的方法，一定要分析下去，最后分析到每一个人。过去我们综合的多，分析的少。所谓物质基础离不开个别事物个别人。调查研究，就要不怕麻烦，鸟瞰一下，是要不得的。

我们对地主富农的情况过去是估计的多，现在客观了一些。但主观主义仍是有的。我们有的同志对于一切没有办法补充的情况，就以主观主义补充之，主观主义是可以使人安心睡觉的。农民没有办法时就总是依靠宗教，而宗教是世界上最主观主义的。我们要经常检查自己，因为主观主义是太容易的了，而详细做调查，则是困难的。

我们要同实际接触，只问少数个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需要我们亲自去体验，去感觉，多从生活中去观

察，去体验。这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对于发现的问题不管过去有无规定，都要追下去，一追到底。

调查研究从何着手呢？要从村干部和党员着手。但只是经过他们，而不能经常停留在那里。要从他们里面钻到社会里去。具体方法可以开始先调查几个人，这些人和我们接触后，帮助我们。然后有两种办法，即按户调查和开调查会。出席调查会的人，一定是要可靠的人，这样可能比挨户调查还要反映真实些。调查后，材料的考证很重要。调查中一定会发现一些矛盾的说法，各家与各家，各户与各户的说法会不完全一样，要对这些矛盾作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调查中，对大多数人的问题能解决最好，要启发他们对政府提意见，但不是反对政府。老百姓讲话，不要去堵他，而是让他讲完，要帮助他们解决些问题。在人家讲话时，要注意提问的方式，回答的时候，要进行慎重研究，凡是调查中的东西，都要反复研究。

收集材料，只是调查工作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则是研究。这里材料的整理很是重要。过去调查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研究，结果浪费精力很大，得到的益处很少。要从具体的问题中，找到问题的原则性。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大胆的、有勇气的丢掉旧的及行不通的东西。

整理材料，就要熟悉所有的材料，因此在当地进行整理最好。这个整理和研究的过程是由个别的抽出一般的原则的过程（而调查是由一般到具体，到个别），把一般原则抽出来，我们的工作就结束。

〔附〕

新发现的张闻天农村调查史料述评

张 兆 宪

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张闻天，率先响应党中央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号召，亲自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北神府、米脂、绥德、晋西北兴县等地进行了长达1年零3个月的农村调查。近年来，随着张闻天1943年《出发归来记》的发表（见《张闻天选集》）和他亲自写的以及他直接领导下写的几篇调查报告的相继出版，党史上这次过去鲜为人知的调查已经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关于这次调查的史料。例如日本学者佐藤宏在1986年12月号《亚洲经济》上介绍我国近年来出版的抗日根据地史料时，就曾专门对张闻天的这次农村调查作了介绍，并提到同年9月我国国内出版的张闻天所著的《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一书，说：“这些资料，过去一直没有看到过，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但可惜的是原始记录看不到，如果这些记录能保留下来，就可以和这些调查活动一起对照研究了。”

最近，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在为编写张闻天年谱搜集资料过程中，在中央档案馆大力协助下，终于找到了一批有关这次调查的原始记录。这是一个可喜的重要发现，它为进一步研究张闻天的这次农村调查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这批珍贵史料包括了以下几项：

1.张闻天亲笔调查日记1本。时间自1942年1月26日离开延安起，至同年9月25日抵达米脂县止，共有243天，约3万字。内容除了逐日记载当天行止外，还摘要记载了每天的调查活动，包括村镇调查，主持调查会，访问农民和基层干部，与不同阶级的各种人物谈话，听取调查团成员汇报，以及个人读书，同毛泽东电函来往等。所遗憾的是，1942年9月25日以后的日记至今尚属空缺。

2.张闻天亲笔调查笔记4本。时间自1942年2月神府调查起，至同年10月底米脂杨家沟调查止，共500多页，约20万字。这批亲笔摘抄的材料中有晋西北地方政府的文件、晋西北和神府县的概况介绍、调查团收集到的关于各村专题调查材料，此外还有深入调查神府县贺家川村、兴县碧村、米脂县杨家沟村与村民谈话时所作的详细记录。

3.调查期间在干部会上讲话记录10篇。这是当时晋西区党委作的记录，约2.4万字。记录稿简要地记录了1942年4月至9月张闻天在10次会上的讲话。其主要内容为：整顿三风问题、农村阶级关系变化问题、村政权问题及群众团体、民兵自卫队等问题。

4.张闻天在晋西北兴县调查后写的一篇文章（油印稿）。这篇文章已在《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上公开发表，题目为《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在调查基础上得出的某些重要见解。

以上这批史料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张闻天所作这次调查意义的认识，下面就初步谈谈这批史料的价值。

1. 这批史料使得我们进一步弄清了张闻天这次调查的目的和重点，从而重新认识了这次调查的价值。过去人所熟知的党史上的一些调查多数是政治性的或某个政策方面的，因此对于张闻天这次全面性的调查，人们并不理解它的目的何在，自然也就影响了对它价值的认识。从新发现的材料来看，张闻天在调查开始不久，就专门说到这次调查的目的。1942年4月19日他在日记内所拟的一份谈话提纲中写道：“明确规定调查的重心——调查的目的，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了解。”1942年4月22日，他在同晋西区委工作人员座谈时明确指出：“我们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说：“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即使有，也是很零碎的。而大部分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太少了，这是调查研究的最大缺点，特别是生产力太少了。”

如果拿张闻天所说的指导思想对照来看这次调查，其特点就在于它是一次以经济基础为重点的全面社会调查。张闻天亲自写的《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①报告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份报告全部共分46节，地区一般概况有5节，属于直接反映生产力、生产过程及生产状况的有14节，属于反映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的有

^① 《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17节，村、乡政权结构有8节，政治情况1节，文化教育状况1节。报告明显反映出调查者对生产力的考察十分仔细。从人口的变化到各种劳动力平均耕作的数量，以至各种畜力平均耕作数量，都有全面的统计。调查的精细还可以举出肥料一项为例，从每个人和畜（包括牛、驴、骡、羊、猪）每年积肥的数量到每种农作物（谷子、黑豆、高粱、糜子、黍子、莞豆、红豆、绿豆、春麦、瓜菜等）每垧地需肥的数量均一一列有详细的表格。这样全面详细的调查，显然其目的并不在于解决某个具体政策问题，而是为我党正确了解整个根据地社会的状况和趋向提供全面的、基本的情况，为检验党的总的路线和政策提供全面客观的资料，因此它可以称得上为一次基础性的社会调查，其意义是不能完全从短期效应上来看的，它至今还为我们正确认识过去的社会历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

2.从这批新史料中我们还看到了张闻天当年提出的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见解。这就是：在革命取得政权条件下，在革命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一个阶段资本主义，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打下物质基础。张闻天把这种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称为“新式资本主义”，并认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

张闻天的这一主张主要表述在《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一文中。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接着强

调指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现实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①

张闻天提出的这一见解不但是同当时中央“奖励富农业生产与联合富农”政策（1942年1月《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精神完全一致，也是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一个重要发挥。

张闻天在这次农村调查中提出上述思想并非出于偶然，将他提出的这一思想来同他所写的调查报告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他是从这次农村大量的事实调查中得出结论的。首先他从调查中强烈感受到“中国太落后”，而同时他又从调查中看到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在“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经济，代替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之后，到处都出现了“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对生产发展的“小生产的限制”，另一方面，富农经营的土地产量比较高，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可使商品经济园艺业等发展”。^②可见他正是立足于这些基本事实的调查和着眼于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而提出上述思想的。

要看到，对于张闻天提出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干部中不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第3—4页。

② 同上。

少人是有所顾虑的。他们一怕富农发展控制不住，二怕贫民当雇工受苦。对此张闻天的回答是：中国农村不是富农、资本家过多，而是太少，而贫民要真正改善生活也唯有靠生产力的提高，“富农剥削是不应该怕的，提高剥削，生产力也可同时提高。”他曾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大胆的、有勇气的丢掉旧的及行不通的东西。”而他能在当时那种小生产封闭环境下大胆提出有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应该说确实是表现出相当理论勇气的。可惜的是张闻天的这一思想后来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建国后在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实际存在着惧怕资本主义的思想，过早提出消灭资本主义。这就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

3. 这批史料还记录了张闻天对贯彻整风的某些独特见解，并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张闻天在这次调查中深入基层、亲自动手的许多生动史迹。

1942年中央号召普遍整风，张闻天正在调查途中，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认识，在1942年5月7日晋西区党委整顿三风座谈会上，提出了对贯彻整风问题的一系列看法：第一，“整顿三风要和实际工作联系，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检查与改进工作；”第二，检查工作的目的是看我们的政策是否适合，因此“要打破老一套检查工作方式——天天在会议上，在干部中，在机关里，在文件上”。取而代之的应是“新式的、生动的、活跃的，在实际工作中，在斗争中，在群众中的检查”。第三，“整顿三风之后，要达到了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的目的”。他认为：“中央

的指示是从实际中产生出来的，是行动的指南、方向，不是解决每个实际问题的方案，医治病的万能药方。中央指示本身的执行，要求领导机关对当地情况具体研究，而使之具体化，一直到一个个问题的实际解决。”肃清旧三风，掌握政策，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我们的目的。第四，在实际中学习，“要研究 22 个文件，了解其精神，根据精神解决实际问题。脱离工作学习，效果不大。”整篇讲话突出了整风要结合实际的思想，所以在调查中他反复强调“农村调查就是最具体的整风”。

张闻天不但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人们过去从已发表的《出发归来记》中读到了他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精神论述，现在将它们同这些调查的原始记录对照起来，就更加使人领会到这些都是他从这次实际调查中得来的体验和结晶。当年跟随张闻天参加过这次调查的老同志至今对张闻天在这次调查中向群众虚心学习的态度和调查中亲自动手的认真精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这批日记和记录就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仅仅从这批新发现的短短 8 个月的日记来看，记录的谈话对象就有 100 多人，其中有神府县委、兴县县委、晋西区委各级领导，有自然村中普通的村民、学校的教师、商店的职工，还有属于开明士绅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而这些谈话记录的广泛内容则使得人们完全可以想见：张闻天是如何向村民了解疾苦，如何向小学教员了解学生上学，又如何到商店向顾客和店员了解物价变动等等的情景。此外，他亲手拟定的调查提纲和他摘录的调查资料，包括亲自画的示意地

图和统计表格，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位老革命家亲自动手的感人精神，而且也为今人考察西北地区社会历史留下了许多原始的珍贵记录。

动 乱 中 的 八 年

(1967年1月—1975年1月)

伍 修 权

在我国当代历史和我个人的经历中，横亘着一个不可忽略和难以忘怀的阶段，就是被称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10年中，我有7年半时间，即从1967年4月到1974年9月，是在所谓的“牛棚”中度过的，加上我开始受冲击和等待重新工作的时间，前后正好8年，恰巧与我在外交部和中联部工作的时间相等，成为我建国以后的第3个8年——一个极不正常、度日如年的8年。

这场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大量的小说、电影和戏剧等文艺作品，也对它作了形象而生动的反映。不过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这场运动给自己留下的强烈印象，首先是成千上万名革命干部以至普通群众，遭受到林彪、“四人帮”各种方式的残酷迫害。许多老同志、好同志在这场浩劫中不幸丧失了生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内乱中我能活过来，真算是幸存者。尽管我在这个时期内的经历与别的同志相比，不算最艰难悲惨，但在总的方面是共同的，由于每人所处位置和

情况不同，各自的遭遇和感受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还是把自己这8年的生活记述下来，它对于后人尤其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也许是有些参考价值的。

风 暴 骤 起

1966年一开始就预示着风暴将临。林彪通过他的那帮“秀才”们大肆鼓吹“突出政治”等谬论，公开与《人民日报》阐述的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正确观点“对着干”。江青伙同林彪又搞了个什么“座谈纪要”，造谣惑众地说我国已被“黑线”、“黑帮”“专了政”。康生等又利用某些报刊兴师动众地大批什么“三家村”，叫嚷“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等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不过我由于一直忙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开始对此并未过分注意，并且以为所谓“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文化界的事，同我们是关系不大的，自己又多年来从事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在“反修防修”问题上，自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此对这场运动最初没有思想准备，对它后来的发展及其影响更是没有估计到。

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从参加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会议主要是通过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同志的“反党错误”，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和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林彪在会议中耸人听闻地作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政变讲话”。会议

期间，毛主席不在北京，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但是身在南方的毛主席，通过康生等人遥控着这次会议，因此会议一开始就是极不平常的。给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康生的表演，正是此人，在会议过程中起了极坏的作用。

会上康生首先抓住一个“二月提纲”问题大做文章。会前中央原有一个以彭真同志为组长，有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同志和康生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他们根据当时学术讨论中的一些问题和情况，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汇报提纲，就文化革命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文件写成后，曾由彭真同志向毛主席当面汇报过，后来又由中央作为文件向全党下发。康生本来参加了这个文件的研究和拟定工作，但是他察觉到毛主席对此另有想法，并不赞成这个文件，就马上面孔一变，矢口否认他曾参与这个文件的制定工作，并向毛主席谎称这个文件是将他排除在外的。有人查到文件上有他的名字并经他画了圈，他竟说文件送给他时他并没有看，那上面的圈是由秘书代画的。这样的话他到处讲，有一回还专门向我们讲，可是我听了当时就有看法。我想就算你并未参加这个文件的拟定，后来将文件送给你时，你作为五人小组成员，就有审阅的责任，你应该看却没有看，这至少是政治上的失职，也证明别人并没有背着你。你说那文件自己并未圈阅，只由别人代画了圈，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搞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把别人都当成了白痴。不过康生这样开脱自己、倒打一耙的结果，却使毛主席相信了，他也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康生搞出的。康生就用这套手法不仅使

自己骗取到毛主席的信任，还使彭真等同志受到了诬陷，使原五人小组除康生以外的四个人全被“打倒”，又导致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改组，造成了严重后果。

所谓《五·一六通知》正是在批判了彭真同志“错误”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康生当然地成了这个“通知”的主要草拟人。会前他曾多次飞往杭州面见毛主席，探知他的意图，取得他的宠信。文件在会议上提出时，康生又成了这个文件唯一的阐述者。我记得他在会上对“通知”稿作了逐段逐句的讲解，还借助毛主席的威望来推销自己的一套，说毛主席在哪些地方，作了多少次修改，有过什么指示，自己又是如何领会的，洋洋得意得简直不可一世。

紧接着这次会议，康生又导演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事件。这张最早将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一度被吹成“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其意义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等等。后来康生曾不打自招地说，这张大字报是他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去北大“直接领导”聂元梓等人联名写出的。他得意忘形地说，没有他康生，这张大字报根本不可能出现。事实确是如此，他幕后导演出的这张大字报贴出后，马上又将大字报全文抄送给毛主席，并立即取得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决定将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结果不仅由此冲垮了北京市委，还在全国点起了大火，十年内乱也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文革”开始阶段，我还在部里抓工作，没有直接卷入运动。对于彭真、杨尚昆等比较熟悉的老同志突然遭到批判，尽管不太想得通，但还是努力地从“积极”方面来理解

这场运动。不久我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时“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全面展开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被认为犯了“错误”，从主要领导岗位上被拉了下来。而建国以来很少工作、近年内大搞所谓“活学活用”运动的林彪，突然跃升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央书记处已不复存在，康生、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一下子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其中指出，党内许多负责干部对这场运动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我实际上也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在整个形势的触动和影响下，特别是看到毛主席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意识到这次运动非同寻常，但是仍未想到它同自己有什么切身关系。

十一中全会后不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林彪作为他的“亲密战友”也占据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心位置。检阅开始以后，许多“革命小将”和“造反战士”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向毛主席和林彪以及陈伯达、康生等“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一一献上了红卫兵袖章。我不是这些“小将”们心目中的“革命左派”，当然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荣誉”，只能看着别人被佩戴上当时十分招人的红袖章。检阅中间休息时，我看到刘少奇同志孤寂地在一旁呆坐着，没有什么人去接近他。我这人有点怪脾气，见别人不大理他，偏要去找他谈谈。我过去同他工作接触不少，一向对他很尊重，这次便主动坐到他旁边，同他闲谈起来。开始是寒暄地问问他的

健康状况，后来就谈起当前的运动来了。交谈中我发现他对运动也是很理解的，他说他把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地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便明确地表示支持他，当然也不愿说不同意他的意见，只说自己还没有认真看那张大字报，打算回去再找来好好读它几遍，看看到底有什么意义。

“八·一八”检阅红卫兵以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便一哄而起，那些年轻娃娃们，纷纷“杀”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联部也出现了这样一批“革命小将”，他们到处抄家查“四旧”，结果将李初梨同志收集的古董也当“四旧”抄了出来，被一车一车拉走没收。后来他们听说康生也爱搜集古董，那不全是“四旧”，才退还给了李初梨同志。当时“小将”们劲头很大，唐明照同志由于长期在国外工作，存有一些西服，也被他们连箱子抄去了。可是他们头脑太热了，破“四旧”竟破到了王力家里，王力的妻子自恃家里有那么个“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对红卫兵们十分骄横，把自己的高跟鞋扔到他们面前，将他们不客气地赶走，结果闹起了纠纷，惹得中央领导人都知道并过问了这事。其实这是他们“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在这股“革命”热潮中，我家里的孩子们也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分别参加了所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的还成为小头头。只是他们一开始就分了派，经常为一些“不同观点”争论不休，回到家里也不断谈论和辩论他们遇到的各

种问题，有时还将他们各自的“战友”领回家来，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国家大事”，弄得我家里经常十分热闹。我由于尚未直接参加运动，正好从他们那里得知不少情况和动向，也感受到一些青年人的热情，所以有时也很有兴味地听听他们的交谈和讨论。那时他们并没有搞什么打砸抢活动，只是真正地要革命，虔诚地响应着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其实对当时这场革命，到底怎么革法，别说是他们，连我也闹不太清楚，我们都从不同的地位，以不同的方式，被卷进了运动之中。我在中央的会议上，谈了自己及家中的情况，被编进了会议简报，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在10月间举行的中央汇报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接触红卫兵的情况，以我为正面例子讲道：“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他认为这是我联系群众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件事以后在全党也传开了。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最初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全国各地，所有部门，无一不漏地被卷入了运动之中，中联部当然也不是桃花源。康生早就插手部里的工作和运动，又将他的得意门徒王力从部里提拔到“中央文革小组”，因此中联部的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他们的操纵和干扰。运动开始以后，按照《十六条》规定，部里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我们这样的“当权派”，不是被排除在外，就是被当作“监督使用”的

对象，不仅不能干预部里的运动，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支配了。

中联部较早被拉出来当“靶子”的部领导干部是许立同志。他是分管外国党培训干部教学工作的副部长，是一位勤恳忠实的老同志。他的所谓“罪行”有这样一条，有次讲课时他偶然提到，苏联哲学家们的著作，都是一部又一部大厚本子，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只有一二本小册子。就这么很平常的一句话，加上别的被歪曲夸张了的事，经过无限上纲全成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可是许立同志颇有股倔劲，随人怎么批他总是认错，被认为“顽固抗拒”，打成了“三反分子”，斗得他很苦。他那时已经60多岁了，后来被赶到“干校”去改造，还被迫干掏厕所等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最后终于被折磨病了，在缺乏医疗的情况下十分悲惨地被迫害至死。

当时我还没有被批斗，部里的运动是在康生、王力之流的操纵下，我们有意见也不被人理睬。就在“造反分子”们狠斗许立等同志时，我针对他们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反复强调《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造反派”们“君子动口不动手”。在一次会议上，我说许立同志“人家60多岁了，又有高血压，请同志们还是要照顾这一点。再过30年以后，你们也60岁了，如果那时你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就会觉得应该怎么办了。”我原想提醒和告诫一下“造反派”们不要搞得太过分，谁知反而被他们抓住，说我这是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观念”，说我的讲话压制了造

反派的“革命热情”和“造反精神”。这样，我自己也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后来眼看着一些同志受迫害而无能为力，至今想起还觉心中沉重。

当时运动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康生之流对中联部只斗争了许立等几个同志，当然是很不满足的。6月中，他带着王力几次来到中联部，看了部里的大字报，亲自向部里干部作了“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生气地批评中联部运动的方向不对头，说“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还指着大字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判‘三和一少’？这才是大方向！”他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判斗争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应该将他批倒批臭！他诬蔑王稼祥同志是“定时炸弹”，说“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还大肆攻击彭真等同志，同时又心怀鬼胎地说他自己不是定时炸弹。他说：“我有信心不成为定时炸弹，我要是炸弹，就去炸美帝，炸陆定一，炸彭真，炸罗瑞卿。”

康生亲自出马发出号令，王力身先士卒闻风而动，根据康生的意旨，贴出大字报，将矛头直指王稼祥同志，直接煽动群众批判所谓“三和一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王力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追查什么王稼祥的“复辟活动”，并且要“穷追到底”。原来在王稼祥同志提出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建议被否定后，他在中联部的领导职权就被停止了，他请求中央另外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后来

由周恩来同志批准，要他继续进行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为此，他要求中联部派几个人协助他进行并提供有关材料。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却被康生、王力之流说成是有人支持王稼祥搞“复辟”，要加以“追查”，将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周恩来同志。中联部的同志都知道王力的老底，50年代后期，他曾参加我国出席世界“和大”的代表团，团长是作家茅盾，党内则由他负责。在他同外国负责人的谈话中，也曾大念和平经，出力地散布和平幻想。可是此时，他竟成了反对“三和一少”的斗士，并且对王稼祥同志进行了恶毒的诬陷。

正是在康生和王力的直接煽动和策划下，中联部的“造反派”揪斗了王稼祥同志，不仅在中联部机关内贴满了攻击和诬陷他的大字报，还将大字报和大标语贴到他的住处。我也看了一些大字报，其中有的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如有人“揭发”他在中联部造什么“宫殿”，其实事实很简单，中联部因工作需要计划新建一座办公楼，预算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由我和有关的同志审定了设计图纸，在研究时曾经提出，为了工作方便，拟将部的领导同志和办公室主任等的办公地点设在2楼，开间也略为宽敞一些，以适应开会和外事活动的需要，许多机关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有人却将此事夸大为造“宫殿”，此事不仅根本算不得什么“罪行”，并且也与王稼祥同志无关，“造反派”们完全是信口胡说，乱加罪名。

一般的人这样胡说倒也罢了，问题是有的负责干部说话办事也很不负责。就在所谓“三和一少”问题上，其实既

不是王稼祥同志偶然提出的，也不能算作是他一个人提出的。当时稼祥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考虑了一些外交上使我国尽早摆脱困境的方法，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党委提出，一一征求了几位部的领导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并且可行的，便由部党委决定，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建议提交给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示郑重，参加讨论并表示同意这一建议的负责同志，都在上送的报告上一一签上了名字。记得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只是我按照自己一向的习惯，虽然在时间上我是第一个签名，却把自己的名字签在靠后的地方，因此在报告的签名顺序上我并不在最前面。这个报告上送以后，我一直认为这个建议在政治上是合理的，在组织上也是合法的，我们都应对这一报告负有责任，而不应视作是王稼祥同志的个人建议。可是，这一建议并未被中央接受，并且受到了批评。康生早就忌恨王稼祥同志，连忙利用这一问题大肆攻击他，将这一正确建议说成是“三和一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后又上纲为“三降一灭”路线，成了王稼祥同志的一条罪名。面对这些情况，一开始我就提出，所谓“三和一少”，我也有份，我是同意这个建议的，并曾在上送的报告上第一个签名，如果是错误的我也有责任，我可以和王稼祥同志一起去作检讨。我这样说了，也准备这样去做。可是有的同志却不然，他明明参加讨论并同意了那个建议，报告上也有他的大名，可是一见这建议受到批评，他却不肯认帐了，硬说自己早就反对这个建议，也积极地批判起“三和一少”来。当有人揭露他曾支持过“三和一少”，康生就忙

来保护他，说他是“首先揭露和反对‘三和一少’的人”。他这样做倒是同王稼祥同志划清了界限，可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良好品德也随之失去了。

中联部的“造反派”在康生、王力的煽动指使下，对王稼祥同志进行了连续的围攻揪斗，他几次被架到中联部接受批判，批斗时又挂黑牌又坐“喷气式”，使他从精神到身体上，都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摧残折磨。稼祥同志在战争时期负过重伤，一直身体不好，建国以后长期带病工作，当然很难承受这样的打击。可是那帮“造反派”斗了他还不够，连他的夫人朱仲丽同志也被拉到中联部来批斗，由于找不到她什么大问题，就抓了些对司机、炊事员的态度问题来无限上纲，攻击她如何“反动”等等。只因后来有人说这样斗了朱仲丽，反而便宜了王稼祥，是放过了主要目标，这才暂时放弃了她，又集中火力去攻击王稼祥同志。

王稼祥同志被斗的情况被中央知道了，有次我到中央参加一个会议，休息时周恩来同志找到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周恩来又对我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王稼祥同志讲话。”我接受了这一指示，马上在中联部召开了17级以上干部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同志对党的重大贡献，说他在内战时期，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是有功劳的。他在许多问题上，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毛主席曾经多次赞扬过他。我又针对“造反派”的

过火行动说：“你们批判他的错误是允许的，但是应该讲政策，要文明一点，照顾他，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把人斗死了，那就太不好了。真的把人斗得翘了辫子，并不说明你们斗争水平高。”我还颇有情绪地对“造反派”们说：“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们经过几十年革命，什么艰难斗争都经过了，起码可以向你们提点意见！”谁知我这些话，不仅没有被他们接受，反而被他们当成了我的“罪行”，被他们用来作为我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干将”的证明，后来我就遭到了更狠的批斗和更长时间的迫害。

那个追随康生的王力，后来被人叫做“王八七”，这个外号的由来是这样：1967年8月7日，王力到外交部作了一次煽动性的讲话，将主要矛头对着周总理，企图煽动打倒周总理。他说什么现在“造反派”的头头，有许多人是可以当总理的。改朝换代之心，昭然若揭。此事被毛主席察觉后，指出王力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王力的所谓“威望”也就江河日下，最后不得不被康生之流将他抛出了“造反派”的队伍。

在劫难逃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工作上，对于部里的运动，一是说不上什么话，二是说了也没人听，所以没有过多的干预，只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主动向部里的群众作过关于自己身上有“官、暮、骄、娇”

四气的检查。1966年11月我参加阿尔巴尼亚党五次代表大会回来，又陪外宾去南方转了一圈，直至年底才回到机关。元旦刚过，我就正式上班，投入了部里的运动。当时还真有点把自己既当革命动力又当革命对象的劲头，给自己下了个“一改、二忠、三信”的决心，即决心改正自己的一切错误，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决心相信群众相信党。还曾认真地对家属和孩子们说：“要抛开一切个人得失来看待这次运动，多看它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所以说我那时对这场运动的态度还是相当虔诚的，只是尽管如此却照样未能逃脱被斗挨整的厄运。

运动开始以后，部里的群众也贴过我一些大字报，内容大都是工作中的问题。例如说我在外事活动中，同外国同志谈话没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却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同苏联外交人员接触时，强调友好多，坚持斗争少；1961年讨论苏共二十二大纲领（草案）时，不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却说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是对是错“还可以讨论”。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是关于我在运动中的表现及其态度。这些意见当然有对有错，有的可以参考，也有的是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但是绝大多数群众显然对我还是抱着肯定态度的。这也给了自己一点信心，我曾借用一句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自认从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就不怕人们对自己的揭发批判。正好那时所有的“当权派”都得依次向群众做检查，按照中联部几个领导干部的顺序，我应该排在第二个做检查，但是在决

定谁先做检查的群众会上，应该排在第一个作检查的同志，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借故没有参加会，结果把我这个“第二号”推出来当了“第一号”，当群众问我们谁先做检查时，我觉得不应该推给别人，心想自己反正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第一个就第一个吧，早检查还可以早“过关”呢！

1967年1月12日，我便在部里的群众大会上作了第一次检讨。当时我是真心诚意地按照群众的要求，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来对照检查自己的。我着重检讨了自己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承认自己对运动“一直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思想上墨守成规，习惯于按常规办事，保守得很，……对于大力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而对于群众在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却有过多指责，因而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部的运动长期冷冷清清。”在逐条检讨了自己运动以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之后，又认真地批评自己“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迎接这场伟大的运动，迎接这场对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审查、大批判、大改造的伟大运动，所以运动以来我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形势，迟迟跟不上来。”我甚至主动批判自己借用了“半夜不怕鬼敲门”的俗话，等于把群众比成了“鬼”，“是对革命群众的侮辱”等等。

我以为自己这样检讨已经相当“触及灵魂”了，哪知却一点不中人家的意，我的检查根本过不了关。于是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检查，尽力给自己上纲，说自己“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违背

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特别是“违背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的精神”，并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检查，还“挖掘”自己的思想道：“长期以来很不觉悟，一直坚持认为只是讲错了几句话，因此对于有些同志贴的大字报是有抱怨情绪的，感到委屈”，“有些晕头转向，感到无可奈何，甚至产生了等着挨整、罢官、垮台的错误的消极思想，这实质上是一种抵触情绪。”而自己所以犯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首先是“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因此在检讨中十分真诚地“再次向党、向毛主席、向革命群众请罪。”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愈是深刻检查、真诚请罪，却愈是过不了关，部里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一次又一次大会，对我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斗争，我郑重其事的检查以至必要的解释，竟都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说明我“仍然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是在“攻击革命造反派，支持保皇派”，甚至是在“耍阴谋”、“负隅顽抗”、“利用合法（机会）公开放毒”，对群众“怀恨在心”，尤其严重的是我竟“明目张胆地抗拒康生指示”，“掀起反康生的逆流”等等，连王力的妻子也在散布说我如何“一贯仇恨王力”，我曾说过“王力是康生的黑秀才”，“中联部有康生的一批人马”等等，这一情况使我极为不安，困惑不解，怎么也想不通到底为了什么。

后来我才慢慢察觉，原来问题还是出在康生、王力那里，中联部运动中的种种怪事，几乎全是康生、王力等人搞的。最初他们也曾想拉拢我，假惺惺地为我说过几句好

话，但是后来我并未按照他们的旨意办事，有时还唱反调，尤其是对康生一直不大恭敬。我对此人确实有些看法，感到他在党内一直是个特殊人物。30年代初，他是紧跟王明一伙的，后来和王明一起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工作，1937年底才同王明等人一起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在国内斗争的艰苦年代，他长期住在国外，因此他在我党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实际贡献。但是此人的最大特点是善观风向，能钻会拍，因此他很快取得了中央领导人的信任，大大施展了他纵横捭阖的“才能”，不断在党内兴风作浪。早在延安整风中，他就搞了什么“抢救运动”，使许多同志被错抓、错关起来；在土改时，他又搞什么“搬石头”，打击伤害了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过去我对他一直“敬”而远之，很少来往，直到60年代他插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与他一起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等国际活动，才同他有了比较多的接触，直接感受到此人的反复无常和阴阳怪气。“文化大革命”风暴一起，他更是空前活跃，不可一世，到处煽风点火，实际上是造成这场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此人很可能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还根据他观风使舵、投机取巧的“特长”，给他取了个带贬意的外号——“智叟”（《愚公移山》中的反面人物），在某些场合内谈到康生时都不呼其名，只叫他“智叟”。这样，我当然没有象有的人那样巴结和奉承他，他对我的态度也心中有数，早就把我看作是他在中联部施展阴谋的一个障碍，只是开始抓不住我多少把柄，不便一下子把我除掉，只能指挥一些“造反派”头头们

以“群众”的名义来不断同我纠缠捣乱。

由于部的领导同志对康生的态度不尽相同，康生对我们也分别采取了有打有拉的不同方针，对有的甘愿为他们服务的人，则用各种方式支持和保护。例如那位本来赞成过“三和一少”建议后来又不认帐的同志，在康生的支持下于“文化大革命”前就“从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手里夺了权”（康生语），当群众运动的火也烧到他时，康生则正式出面保护他，发出了书面批示，说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干部，“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康生保护他的结果，自然把群众斗争的火力都转移到别人身上来了，我就不幸地成为他们的又一个靶子。也正因如此，我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不仅如此，“造反派”们对我越来越不客气，不断对我进行围攻，逼迫我交代承认一些莫须有的“罪行”。在批斗我时，对我连推带撞，手指直戳到我脸上，叫骂不绝，唾星直喷，挂黑牌子、带高帽子的滋味我都尝过了。不久中央发出了指示，禁止这些做法，但我已经受过了，真算不走运。我的孩子上来照看我，也被说成“铁杆保皇派”将她撵走。有时我被车轮战术式的连续批斗，长时间得不到休息，脑子被又“轰”又“炸”得昏昏沉沉，有一次我被斗得一下发高烧到 39.8℃，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但是医院也不是“避风港”，我 1 月 31 日住院，病情稍减，2 月 11 日就出院，继续接受批斗和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这样，从我的个人的生活，到机关的工作和秩序，一切都乱套了！一向安静的中联部大院，同全国各地一样，完全陷入于全面内乱、一场混战之中！

除了揪斗“走资派”之外，群众之间大打派仗，看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特色之一。中联部内一直共同工作并且相安无事的干部和群众，很快也分裂为相互对立到视为仇敌的两大派，一派叫“造反总部”，一派叫“工勤总部”，前者的成分主要是机关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后者则以为机关服务的公务员、司机和接待外宾的服务员等职工为主组成。相比之下，“工勤总部”的人数及影响都不如“造反总部”，人员成分及其思想也都比较单纯，可以说还多少带着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不如某些知识分子干部脑子转得快，在一些问题上与“造反总部”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很快就由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发展为“路线”上的对立，双方不断地互相指责和攻击，原来一起工作的同志，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我对于这两大派组织，一开始就持“一碗水端平”的不偏不倚态度，认为双方都是革命群众的组织，不论哪一派要对我进行揭发批判，我都接受和服从。我认为自己的态度是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的，我由衷地希望群众之间不要对立，愿意促成他们的和解和团结。但是事情却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造反总部”的头头们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尤其是有着康生、王力等人的支持，一心要将中联部变成他们的一派天下，竟将“工勤总部”打成了“反革命保皇组织”，要对他们“加以取缔”，企图一举压垮对方。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什么“全面开花”的口号，把凡是不支持他们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拉出去批斗，勒令他们停止工作，下伙房劳动，

连有的炊事员、招待员也被勒令“停职反省”和挨打被斗，大多数处长、科长也都被迫“靠边站”。“造反派”头头们又抓了好几个“反革命案件”，外出的汽车爆了轮胎，成了“政治破坏”；大标语上的毛主席的“毛”字被喇叭挡住了，也是“恶毒攻击”；有人说了几句对“造反派”不恭敬的话，便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一时间真是处处紧张，人人自危。可是，那时“造反总部”的头头竟对我说：“你只要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保你。”我觉得自己作为领导干部，在两派群众对立时，不能偏向某一方，更不能为了寻求保护而随便投靠什么人，仍然坚持了原来的“一碗水端平”态度。这一来我就得罪了“造反总部”的头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使我更疏远了他们。

“工勤总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以后，发生了一起接待外宾的工勤人员“拒绝工作”事件。几十名属于“工勤总部”的同志提出，既然我们成了“反革命”，怎么能继续担任接待兄弟党外宾的重要工作呢？这实际是对片面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的抗议。这明明是“造反总部”压制对方造成的后果，可是他们捅出的漏子却要我们去收拾，我被责成去处理这一事件。我知道这事不好办，一个人更无法处理，便约了别的几位部领导同志一起去了。从心里讲，我是同情‘工勤总部’的同志们的，“造反总部”头头们借口工作对他们发号施令，迫使他们接受别人的非法宣判，如不服从就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论罪，加以迫害和镇压。“造反总部”所以把我们这些“当权派”又推出来，是想迫使部领导按照他们的意图给“工勤总部”以行政压力。我在

解情况后，认为我们作为行政领导，不应该支持“造反总部”的做法，尤其不同意他们将另一个群众组织轻易打成“反革命组织”。当时我曾提醒有关领导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慎重考虑，‘工勤总部’到底是不是反革命组织？有没有证据？有没有反革命头子？该不该取缔？如果我们处理错了，把这么多人打成反革命，那就要犯运动以来最大的错误。”我又按照《十六条》的有关条文，反复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力求平定已经发生的事件。

但是，我的意见并没有被有关的同志接受。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领导同志，竟以部领导的身份公然肯定了“造反总部”的错误做法，也说“工勤总部”是“反革命组织”。也就在那时，江青曾经指名攻击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同志，说他是“工贼”和“反革命”，使他受到了严重迫害。于是我们部的那位领导同志也按照江青的腔调说道：“时传祥不也是工人吗？现在证明是工贼，是反革命！”甚至指桑骂槐地冲着我道：谁支持这类人，就应该“抓起来枪毙！”又在别的场合，把“工勤总部”比作出身于矿工的赫鲁晓夫和英国工党早期的外相贝文，甚至骂他们为“被击溃的反动分子”和“负隅顽抗的残匪”等等。这些话当然伤害了“工勤总部”的广大群众，他们气愤地举行对那位领导同志的批判大会，要求他去参加，可是他拒绝到会，不肯听取批判，还说“你们已经被取缔了，这是非法的会议，你们没有权利批判我！”还威胁要批判他的群众，“以后你们要吃亏！”

由于他拒绝参加大会，坐在沙发上不肯动身，结果被

激怒了的群众将他连沙发一起抬到了会场上。受到他支持的“造反总部”得知，马上出动队伍前来保护他，高喊着“砸烂工勤总部”等口号，冲击了大会，“工勤总部”的人坚持开会，就发生了武斗，不少人挨了打，有的参加大会的外宾的孩子，也被打伤送进了医院。这次武斗事件，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亲自赶到中联部，向被打伤的孩子家长——兄弟党客人表示道歉和慰问，他说首先把孩子的伤治好，还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我在出事以后也赶到医院，看望了受伤的外国孩子。但是有人却不是这种态度，他们在康生、王力的支持下，极力庇护挑起这次武斗的人，使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追究与惩处。

在该不该将“工勤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问题上，我同我们部有的领导同志发生了严重分歧。那位领导同志曾当面指责我，“你现在还保时传祥这样的组织是错误的！”一再要我“放弃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是我坚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仍然为“工勤总部”打抱不平，这就更加得罪了“造反总部”的头头们，他们马上给了我一顶顶大帽子，我一下子成了中联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和“工贼组织的黑后台”等等。他们召开了“粉碎伍修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朴大会”，对我和“工勤总部”进行围攻。在大会上我一面表示愿意接受批判和考验，一面想对自己的观点作必要的解释，但是他们却不准我讲下去，甚至不允许我读毛主席语录。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竟宣称：“伍修权读主席语录是对主席语录的亵渎和污辱！”我不理他们，坚持要读，因为那时正盛行“打

语录仗”，人们常常互相引用“最高指示”来攻击和制服对方。我这时便选了一条大声读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造反总部”的人一听就向我喊道：“你就是我们的敌人！”我马上抓住这句话进行质问，因为到当时为止，康生、王力之流只是借助“群众”之手对我乱轰，并未抓到我什么把柄，没法一下把我打成“敌人”。那些唯康生、王力之命是从的“造反派”们，也不敢自作主张，加之我态度强硬，一定要他们明确表态我到底是不是“敌人”，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只得表示“收回”刚才那句話。但是好景不长，我不久就真的成了“敌人”。

由于“造反总部”和“工勤总部”的两派对立，形成了中联部领导和领导、干部和干部、群众和群众之间的深刻分歧和尖锐冲突，我很反对有的领导同志支持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法，更为部里这种严重的混乱局面而不安。但是我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林彪、江青及其同伙康生之流造成的，却从个人的美好愿望出发，希望很快解决中联部发生的问题，制止事态的发展；便采取了一个当时十分正常的作法，写了一份大字报，公开阐明了我对中联部发生的严重问题的看法，直接批评了某位部领导同志的错误作法。这份大字报于4月6日贴出，它的出现马上在中联部院子里成了人们的注意中心，首先是“工勤总部”的人们，认为我的大字报讲了公道话，一个个都非常高兴。由于我写的大字报上提到的一些被批判的人名上都没有打“×”，他们认为也应该象当时流行的做法一样，

自动地都给那些名字上打上“×”。“造反总部”的不少同志看了我的大字报，也认为我说得有道理，不满所在组织的错误作法，便大批地退出“造反总部”，引起了他们组织内的分歧以致分裂，使一度强大的“造反总部”一下子处于濒临瓦解的境地。

我那张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被人们称为中联部有名的“四·六大字报”。开始我以为自己那样做是符合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的。因为就在几天以前，中央针对安徽省发生的问题，作了“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的指示。谁知正是这张大字报给我招来了大祸。我的言行完全不合康生、王力等人的意图，我成了“自己跳出来的敌人”。为了立即消除我的“四·六大字报”的影响，他们马上作出反应并采取了行动。4月8日深夜12时，康生通过王力为头头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直接对中联部“造反总部”下达了“重要指示”，他们说：“希望你们同中联部伍修权划清界限，他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继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和革命群众，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完全歪曲了中央四月一日对安徽问题的指示，颠倒事非。”当夜，康生、王力直接派人到中联部，宣读了他们的“指示”，这就使我的问题立即起了质的变化。我开始还什么也不知道，到下半夜，“造反总部”的人突然冲进我家里，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在一片辱骂和震耳的口号声中，我被反扭着双手，又推又搯地拉到会场批斗。开始我还蒙蒙懂懂不知怎么回事，慢慢地才听出来，事情

已非同寻常，康生、王力已经公开将魔手伸到我头上来了。也有好心的同志，悄悄向我透露了康生、王力“指示”的内容，提醒我注意。但是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专政对象”，一切都身不由己了。

“造反总部”的头头们声色俱厉地向我宣布，从现在起，不准我再上班，停止我的工作，剥夺一切权力，进行审查和接受批斗。于是，我这个革命几十年的负责干部，党的中央委员，仅凭康生、王力几句话，便被一下子“打倒”了，什么中央任命和党的决定，在那伙“造反派”眼里，全成了废纸。开始我脑子里总转不过弯来，一个普通的群众组织，怎么能否决党中央的决定呢？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却无法作任何抗拒，只得迷迷糊糊地被人猛斗狠骂着。第一场批斗过后，我才发现中联部院内院外，楼里墙上，从脚下到头顶，到处都刷写和张贴了巨大的标语：“打倒黑帮分子伍修权！”“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修权！”……我稍稍清醒过来以后，觉得情况不妙，便悄悄用红机子电话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我的情况，希望他们能派人来中联部处理一下这里发生的严重事件。其实那时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同样的电话打到周总理那里，但是他自己也正处于艰难甚至危险之中，不可能顾得上每一个向他告急的人。这个电话没有起到理想的作用，却引起了“造反派”头头们的注意，他们马上将我的全家轰出原来的住处，搬到另一处很小的没有电话的房子里，并且勒令我不准乱动和自由行动，使我一夜之间就由一个党的负责干部，突然变成了“牛棚”中的被管制分子。

康生和王力之流对我直接迫害，林彪和叶群马上也来落井下石。我同那位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早就相识，只是一直格格不入，老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他是明显地对我抱有成见和戒心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同他都在东北，他是野战军司令员，我是军区参谋长，本来有不少工作关系，但是他却只信任和重用他自己那个小圈里的人，尤其是在他同彭真同志有分歧时，我曾支持过彭真同志的意见；到辽沈战役时，我又曾对他军事指挥上的某些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并向毛主席和军委作了反映。这当然地引起他对我的忌恨。我在中联部被揪出以后不久，他和叶群就通过王力专门讲了我的“罪状”，把我的问题同彭真同志连在一起，定我为“彭真黑帮分子”。他们恶意煽动地说：“伍修权这个人很坏，阴险得很，一般人看不出来”，“他是个危险的人物，是个坏人，是隐患。他脑子里一点毛泽东思想也没有。”“（在东北）他安排开干部会议，不让林总参加。”“他支持彭真，每次开会他都骂娘，……骂的是林总。”“彭真同苏联人接触，他翻译。林总说，他们几个都是洋奴，坏事他都有份。”“东北所有的坏事，都有他的份。”“他为什么当上中央委员，是谁搞的还要查。”“这次他自己跳了出来，很好。”……这些话当时对我来说，可都是能致我以死命的！正是在他们直接的迫害和诬蔑中，我真的厄运难逃了。

“牛棚”生涯

我蹲“牛棚”的第一阶段，是软禁式的“家庭管制”，除了“不准乱说乱动”和“不准自行外出”等禁令外，还是相当“自由”的。只是康生、王力及中联部的“造反派”将我的问题一下子捅到了社会上，大大扩大了我被批斗的范围。4月8日深夜，康生专门对我的问题作了批示，并亲自拟写了打倒我的几条标语，发动了对我的全面攻击。在他和王力的指挥下，当夜大街上就出现了“打倒”我的巨幅标语。接着，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人大三红”等造反组织又成立了什么“专揪伍修权兵团”，专门揭发批判我的问题。说来也好笑，我在战争时期还没有单独指挥过一个兵团，现在专门揪我的人倒有了一个“兵团”。不仅如此，还由什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及“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等组成的“社会斗批改联络站”专门出版了题为《伍修权罪行录》的铅印小册子，作为他们编印的“斗批改丛书”中的一本。编者在《前言》中宣称，对我的揪斗“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重大胜利！”又说“长期以来，伍贼与彭贼结成死党，狼狈为奸，大肆吹捧苏修、南修，积极鼓吹刘修的‘三和一少’，给修正主义头子们贴金镶玉，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中央文革，犯下滔天罪行！”罪名实在可怕，但内容却少得可怜，使人看了感到啼笑皆非。

他们将我在遵义会议上为李德作过翻译，会后又“得

到彭德怀的重用，被提拔为三军团副参谋长”一事作为我早就在“反对”毛主席的证明。而我“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证据，则是我在1964年或1965年对外宾说，“在国内，我们可以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在国际上就不能这么说，而只能说一切革命同志都要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们又把我对中联部机关干部提出的在保证劳逸结合改善生活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说成是“把学习毛著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认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学习毛泽东思想，这真是修正主义混蛋逻辑。”真不知到底谁是“混蛋逻辑”？又说我曾如何“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许立”，是什么“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罪行录”中还将我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南关系时的一些活动和言论，加以歪曲和恶意渲染，攻击我如何“里通外国”搞了“阴谋”等等。总之，按照这本小册子所说的，我完全成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危险人物。

康生之流就这样对我进行着诬蔑陷害，听说有关我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连远在德国的李德也看到了关于我的“罪行”的大字报英文稿，他曾在自己写的《中国纪事》中引用了一份大字报，其中说我如何“反对毛的革命路线，反对林彪，亲近南斯拉夫和苏联修正主义，攻击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在关于遵义会议的一段中说：“李德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都是反对毛主席的，而把李德的话忠实地翻译过来的不是别人，就是伍修权这个混蛋。”

我除了在中联部接受批斗和审问以外，还不断被拉到社会上去批斗。这类批斗分为大、中、小三种形式，最大

规模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北京体育馆内，一次是人民大学操场上。这两次都斗得我莫名其妙，除了听到“造反派”们大骂我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黑帮分子”和“里通外国分子”等等之外，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在体育馆批斗时，是以我为主角，仅有许立同志陪斗。那时我身体不好，情绪更坏，又正是夏天，脑袋昏昏沉沉，只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支持不住，被斗得一命呜呼了。在人民大学斗的那次开始我竟暗自好笑，原来那次挨斗的除我以外还有张闻天、李昌和黄甘英等同志。那次批斗不知为什么把我当成了主角，却让张闻天同志“屈居”配角地位，李、黄二位名次更低。当时我就窃笑，“造反派”今天搞乱套了。张闻天同志过去是中央的总书记，地位比我高多了，现在竟让他当我的“配角”，未免太不“公正”了。至于那次为什么拉李昌、黄甘英等同志去陪斗，我一直也未弄清楚其中原因，也许因为他们负责全国青年和妇女组织的外事工作时，与我有过工作关系。“造反派”们后来似乎也发现了有问题，将我们斗了一阵以后，又互相调换了位置，张闻天同志终于“恢复”了他的应有地位，被单独斗了一气，只叫我们在一边呆看陪斗了一番。这两次批斗会，每次即使不到1万人，也总在5000人以上。

其实这种大型的批斗会，除了被口号和骂声弄得脑袋发涨震耳欲聋以外，到还过得去。比较难对付的是中型批斗会，“造反派”们根本不让被斗者安静，得不断回答各种意想不到的刁钻古怪的问题，常常弄得人无所适从，既无法回答，又不能不答。小型会人少些还可以对付，唯有中

型会不好应付。“造反派”总结出经验说中型会是整人的最好“好”方式。“造反派”真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七嘴八舌地集中批斗一个人，脑子再灵活的人，也对付不了。这种中、小型批斗会场次太多，确切次数无从计算，只记得被纠缠追逼得最多的是我在东北工作一段的问题。

历史上有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造反派”的创造本领可不小，他们说，东北有个桃园四结义，除了原有的彭真、林枫和吕正操外，又增加了个伍修权。我当时所遭受的一切，很明显地都是林彪、康生一伙造成的，可是“造反派”批斗我时，一会宣称我“是中央揪出来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给伍修权定了性”，一会又说我“是群众揪出来的”，否认对我的揪斗主要是林彪、康生之流背后施展阴谋的结果，他们是假借“群众”之手来消除自己的仇敌。

林彪和康生素来阴险毒辣，我自知落在他们手中是很难脱身的。数不清的批斗、审讯，弄得我精神非常紧张，身体极度疲惫。批斗之余还不准呆着，被迫去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造反派”用各种办法来折磨和侮辱人。我心情烦躁苦闷得常常整夜睡不着觉，想想自己十几岁参加革命，40多年来南征北战，中外奔波，对党和人民不说有多大贡献，至少是尽力尽心地工作着，党对自己一直也是十分信任的。记得1965年我有一次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他还指着我对外宾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是没有反对过我的一个。”我自认对他是有相当感情的，从心里把他当作当代的一位伟大人物。就在运动开始以后我受到冲击

时，孩子们几次劝我将有关情况 and 想不通的问题，用红机器电话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我总是不同意。孩子们要自己写信给毛主席，我也不让寄发。一再告诉他们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打扰主席。”我始终都是由衷尊敬和自觉维护毛主席的。

可是万万想不到，我的勤恳忠诚，换来的只是一顶顶大得不能再大的可怕帽子：“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甚至是“苏修的间谍”等等，简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了！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又加上难以忍受的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还祸及全家老小，妻子儿女都因我大受其苦，眼看全国大乱，不知何日是头，真想一了百了，自我解脱。我虽然成长在革命队伍中，在思想上多少也还带着一定的“封建烙印”，“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句古话，对我就有过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我又觉得对不起党对自己的培养教育，也担心家人和孩子们能否经得起风浪和“继续革命”，心情真是极度痛苦和矛盾！在那些年月中，全党、全军和全国有多少老同志、好同志，忍受不了摧残凌辱，陷入绝望难以自拔，被迫含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确实是一个幸存者，至今想起那些日子，还觉得不寒而栗，余悸未消！

“造反派”们发现我的反常情绪和表现后，立即对我采取了新的措施，将我升格为“机关隔离”，关到了南小楼的一个房间里。这样，我就进入了“牛棚”生活的第二阶段。那时中联部的“牛棚”已经“高朋满座”了，随着运动的发

展，几位当初被“造反总部”保过的同志，也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先后抛了出来，与我“殊途同归”地进了“牛棚”。只是“牛棚”里管住不管饭，每天还得自己家里送三次“牢饭”。原来在家里帮忙的阿姨已被迫离开了，每顿都由徐和或孩子自己做了送来。不过这也好，可以不断见到家里人，并且能适当保证我的营养。我的孩子还利用送饭的机会，仿效过去搞地下工作的方式，常在馒头、米饭和水果等食品里，夹塞一些小字条，对我进行必要的劝慰，向我透露一点外头的新情况、新动向，以免我完全与周围的生活隔离起来。关我的地方是一个套间，里间由我住，外间当“看守室”，由两个“造反派”轮流看守，昼夜不断人，倒也十分辛苦。

那些“造反派”们对我们真是充满了“阶级义愤”，总是想了各种办法来折磨人。他们说你们这些老家伙从来不劳动，这回就让你们尝尝滋味，还说他们反正有办法不让我们闲呆着，就安排我们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我们劳动的内容很丰富，开始让我去清扫旧大字报。那时的大字报真是铺天盖地，一批刚贴上去，另一批又加上来，一层又一层，贴满了楼内楼外墙上廊下，每天都要收拾清理，不然就会塞满通道。我的任务就是把旧大字报集中起来，用手推车一趟趟送到大门外头的垃圾堆去。原来打算放在那里由清洁工人把它拉走，不想那时出现了一种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运而生的新兴行业——收大字报卖废纸。我的工作就得到了这批收废纸的人的欢迎，他们每天到时候就站在外头等着我，只是那时的人们不

太讲文明礼貌，每次一见我推着小车出来，不等我推到地方，就一拥而上，你争我夺，把大字报抢得满地都是，弄得我满头满身也是废纸残片。他们抢过以后，我还得把地上打扫收拾干净，以免“造反派”说我没有完成任务。这是较轻松的一种劳动方式，还有一种劳动方式是掏公共厕所。这时我才进一步体会到我国许多人没有卫生习惯，那些公共厕所一个个都又脏又臭。有的人拉了大便不冲，大粪把便池都堆满了，许多下水口都堵塞不通，我的职责便是将它们一一疏通冲净。可是说来容易，做起来真难，虽然我不顾脏臭，一面用水冲，一面用棍子捅，可是有的就是捅不通，冲不动，不仅如此，由于我把上面的硬粪便捅到底下，结果反而把里头堵住了，我再用水冲，却把底下的粪水弄得全泛上来，溢得满地都是大粪，急得我手忙脚乱，也整治不了。最后我只得狼狈不堪地去找“造反派”，请求他们马上派水暖工师傅来，在他的技术指导和亲自帮助下，才使我摆脱了困境。就这样，我也懂得了一点掏厕所的“学问”，掌握了一种“技能”，以后又发生了几次这样的情况，我都按照师傅教的办法，一一修理和收拾好了。这是一种使人难以忘怀的劳动方式。到了冬天又给我们增加了一项任务：劈柴。那段时间我天天抡着斧头，把大块木柴劈成一定长度的短块，以保证几个火炉的需要。此外，还叫我们去收集拣拾散落在院内各地的乱砖头，并从这大量的乱七八糟的残砖碎瓦中，挑出比较完整一些的弄回来码好。这样的劳动如果说有什么实际意义，那就是古代陶侃搬砖式的磨炼意志吧。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

时，“造反派”们便指派我们到一片高低不平的闲地上，命令我们把高处的土铲起来，填到比较低凹的地方去，进行着除了折腾人以外毫无意义的平整土地的工作。每当我们满头大汗地干着这一切时，“造反派”的头头们就洋洋得意地说，他们总有办法让我们干活就是了。后来因为被揪出的人越来越多，南小楼“牛棚”有人满之患，又把我们送到中联部院内盖起的 22 号楼继续隔离着。

在这二等“牛棚”中呆到 1968 年 4 月，不知“造反派”们为什么忽然实行“仁政”，放我们回家去住。我过了一年牢狱式的“牛棚”生活，虽然今后还命运未卜，但能重新与家人相聚，还是十分高兴的。谁知这却又空欢喜了一场，我刚在家里过了个五·一劳动节，5 月 3 日我奉命去继续劳动时，突然来了一辆吉普车，由中联部的“造反派”头头领来两个军人，就地对我宣布了一项命令，说是奉中央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监护”，现在立即将我带走。说着就一人一边，绑架式的将我押上了车。吉普车路过我家住处，见老伴徐和正在门口，我却连一声招呼也不能打，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东西也没有拿，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

后来知道我的这次被突然抓走，也是在康生直接指示下干的。当时他曾几次说：原中联部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坏人和叛徒比较长久地篡夺了”中联部。部里“特务叛徒很多，部长、副部长也垮了。”还特别指名诬陷我，并下令“把伍修权关起来”。

长 期 “监 护”

我这人在许多事情上，总是既不冒尖突出，也不落在最后，常常处于“中游”状态，连“文化大革命”挨整也是这样。就以当时风行的“监护”措施来说，待遇也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同志是被用飞机送到外地一个隐蔽的处所，不许他出来，条件相对地比较好，并且可以同家属在一起，这是最高级的一种“监护”。另一些同志则被关到秦城等地的正式监狱里，这就完全是犯人的待遇了。我被关在北京卫戍区则处于这两者之间，不算最艰苦，但也够受，在个人经历中，也是一次难忘的磨难与考验。

1968年5月3日，我突然被一辆吉普车拉到了通县一个地方。后来知道，这是北京卫戍部队一个团的驻地。我一到就被投进一个楼上的房间里关了起来，开始我并不明白，我享受的待遇是叫“监管”还是叫“监护”，因为我以为监管也就是坐牢，而监护则含有保护的意思。我就向带我来的卫戍区同志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说我是属于“监护”。上面发来的文件就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怎么也感觉不到是在被“保护”，只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是在坐牢房。

关我的地方是一座二层楼房，楼下住着看管我们的连队，楼上的一个个单间，分别关着我这样一些特殊人物。我住的那个屋子约有12平方米，进去后发现里头只有3件东西，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桌子和一把椅子，床上扔着一条破棉絮。卫戍区一位很神气的干部将我带进去以后，

冷峻地对我说：“你就住在这里，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可是我只身一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来，这日子怎么过呢？那干部不顾我有什么反应，又指着床上那条破棉絮道：“这就是给你用的”。我一看更是哭笑不得，那简直是叫化子也不愿用的东西啊！用它当被子盖，显然太小，当褥子垫又太薄，卷起来当枕头又太脏，这简直是一种人身侮辱和讽刺。那干部说完就不屑一顾地转身将我锁在屋里。我正在犯难时，中联部转送来了我的全套被褥、衣物等等生活必需品，其实都是些简单的家常东西，可是我得到时简直是喜出望外了，高高兴兴地把被褥铺上，把衣物一一放好，心情也渐渐地安定了下来。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漫长的被“监护”的生活。把坐牢说成“监护”，这也是自我安慰的说法吧。我努力适应着这个特殊的生活环境。关我的屋子也有着一门一窗，只是窗户早就被粗木条钉死了，从我进去后就没有打开过，窗户玻璃上还涂上了白漆之类的不透明的东西，关在里头就无法窥视外界的一切。这个所谓的窗户，除了透进一丝光亮之外，连新鲜空气也无法进来。唯一可开启的房门也是整天关着，不过那上面开了一个鸡蛋大小的洞，看守人员可以从那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每天除了送饭、上厕所开一下门，使我能够接触一下除我自己以外的人，看到我房间以外的天地外，几年间我同外界的联系，也就是那个鸡蛋大的观察孔了。由于门窗终年关闭着，里面的空气当然十分污浊，好在每隔一段时间还给我放一次风。放风的地方也很特别，不是通常的院子，只是

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天井，这样的天井有4个，设计得很巧妙，入口的门是错开的，每隔10分钟送进1个人，送进4个人要30分钟。四周都是高墙，站在上面两个警卫就可以同时监视4个人，使用兵力是很合理的。每人到了这个地方，尽量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接受一点珍贵的阳光照射，只是照样与世隔绝着，外头的一切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放风半小时或更长一点时间以后，又一个一个地带到原房间，谁也见不到谁。根据气候的好坏，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次放风。最头痛的是每天夜里睡觉都是在强烈的灯光下，刺目的灯光直射着眼睛，叫人根本无法入眠。有时还有些战士在外面大声逗闹，好象是存心折磨人，更增加了自己的烦恼焦躁。实在睡不着时，我就拣了块毛巾蒙在眼睛上，不过又被看守的战士训斥了一顿，勒令我马上拿掉。后来我发现战士们对我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就钻了他们一个空子，一听到他们换班时，就马上拉手巾盖上眼睛，有的认为是上一班岗允许我盖上的，不再强迫我取掉，我就可以安然地至少睡到下一班岗。不过如果新换班来的人过分严格，我还得老老实实地将毛巾取掉。

我到那里不久夏季就到了，管理人员开始给了我一顶蚊帐，因为那儿蚊子很多。谁知用了没多久又给收走了。我猜想可能是蚊帐影响了看守者监视的视线，担心“犯人”在帐子里出什么问题。只是帐子一收走，我就被整苦了，每夜被蚊子围攻和干扰得无法安睡，但是我除了干挨着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情况直到秋后才得到缓和。不过紧挨着冬天就来了，我的房子里是没有暖气的。我正在发愁这

寒冷的冬季怎么过，管理人员就来给我安了个炉子，我可以生火取暖。可是他们却不给煤球和煤块，只给了一些煤末子，让我自己用它做成煤球，这是折磨人的另一种方法。严冬腊月要用冷水搓煤球，这确是不好受的事，但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总是要想方设法生存下去的。由于监管人的恩典，允许用热水和煤，我又在一边摆一盆较热的水，当搓煤球的手有些发僵时，就在热水盆里泡泡，以便恢复活力。做好的煤球一排一排地晾在屋子的一角，等它晾干后再集中堆放起来。每做一次够两三天烧的，用完再做。就这样我熬过了3个严冬。手总是黑乎乎的洗不干净，也管不得那么多了。

“监护”时的伙食与战士同一个标准，只是他们连队里自己能养猪种菜，又有伙食结余，经过调剂还是可以的，我们可就只有4角来钱可吃，每天照例早上一顿玉米糊糊，中午一顿粗粮窝窝头，晚上吃馒头算是细粮，副食更是白菜萝卜之类最便宜的东西。这种伙食在全国人民中按说也不是最低的，我在年轻时也长时期过着困苦的生活，但是这与我近一二十年的生活水平相比，可就悬殊很大了。最初确实难以适应，尤其是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受到压抑，根本谈不上什么胃口，只是勉强吃点维持生命而已。这样，营养就很难跟上，体内原来的储存也一点点消耗掉，加之夏天蚊子侵扰，冬天冷热不均，每天睡眠不好，体质迅速下降，身体渐渐由消瘦变得浮肿，各种病状也陆续出现了，我就请求给我看病和吃药。可是那时林彪一伙正强调什么“医疗为政治路线服务”，我这样的“黑帮

分子”病了也不给治。有个医生竟对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敌我矛盾，而我们对于敌对分子是决不施仁政的，你们的身体就自己能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吧！”面对这种不通事理的人，我又能说什么呢？想想自己革命大半辈子，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却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特别牢房，并且连个普通犯人的正常待遇都没有，真是又委屈又生气。但是此时此地，有理难说，有口难辩，除了继续忍受、坚持，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时关在同一个地方“享受”着我同一种待遇的，虽有10多个人却从未见过面，只出现过这么几件事。那里的厕所是公用的，一共有4个便池，我们被分别带去大便，隔着一块木板蹲着。次数多了总想试试了解隔壁是什么人在大便，当然不能问话，只好咳嗽几声，看对方有什么反应，有时对方也咳嗽几声，如果彼此能从中辨别出熟人的声音来，就感到莫大的欣慰，真可谓厕所寻知音了。这样搞了几次，引起了战士的注意，他们的警惕性就提高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战士就训斥说，你们这些人已死在临头，还在搞什么阴谋？从现在起，禁止你们咳嗽。结果我们一下子就成了无权咳嗽的人。又有一次我被叫出去受审，刚走到半路上，另一位战士赶上来了，说让我快回去，不是提审我，是提审蒋南翔，这样我无意中又知道了一位难友。

又一次我从厕所被带回房间，迎面见到了平杰三同志，他当时蓄满胡须但我还是认出来了。我知道彼此不能见面的规定，便马上停步转向一侧，让平杰三顺利地进了

厕所。事后战士问我见到了什么人，我说我认真执行了规定，见有人来自觉地侧身不看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战士也就放心了，仿佛一件大的机密没有被泄漏，使他得到了没有失职的安慰。几年以后我“解放”出来时，陆续得知吕正操、赵毅敏和张学诗等同志也同我在一个楼上关着，真是他乡有故知，相邻不相见，相见又“不相识”呀！那里为了保密和计算人数方便，我们都被编了号，不准用自己的名字，我是第“42”号，我的有些用物上都被贴上了“42”号，看守人员平时也只叫这个代号。

我被“监护”起来以后，也体会到一点被“保护”的好处。在外头时；每天不是批斗，就是围攻，一会来勒令，一会听声讨，加之没完没了地逼供交代，还要从事各种劳动，把人折腾得昼夜不得安宁，每天都疲惫不堪。关到卫戍区以后，除了专案组来找我，其他人都不来抓我了，相对地安全和安静了。但是每种生活都有其难受之处，唯一同我打交道的那个专案组就很难缠。他们经常来找我的有3个人，都是部队干部，正好陆、海、空三军每家一个，由陆军的那一位负责。看来那人级别不算低，50来岁，派头不小，可能是个抗战时期的干部。每次提审他当然地朝中间一坐，开始审问以前还要先泡上一杯茶，都是挺讲究的龙井之类的好茶，抽的烟也是比较高级的，每次都得等他泡好茶点上烟才开始审讯。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前提，即先肯定我的问题是敌我性质，那位专案组头头振振有词地对我说：“对于你的问题，应该先按敌我矛盾来考虑，自觉地以此为根据进行交代检查，这样才有利于解决

你的问题，否则对你将是很不利的。”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就提出自己的意见说：“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该首先依据事实来说话。在还没有弄清我到底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不能先定下我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我又说：“我在长期的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但是我的一切活动和一贯表现，组织上都是了解的，而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属于敌我性质的，因此我的问题应该首先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考虑。”这就同他们顶了牛，结果每一次审讯的开头，都得进行一场辩论。可是我那时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专案组那个头头既主观又蛮横，根本听不进我的申辩，却又不能说服我，只能凭借权势对我发脾气，说我态度恶劣，不肯认罪。我不管他怎么生气，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他们提出的各个问题，认真地按照事物本来面貌来回答。在陈述一些事件时，不免要讲讲道理和自己的经验，结果搞得他非常恼火，责问并训斥我道：“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现在根本不是在接受审问，而是在摆老资格教训人！”他们这样审来审去，当然得不到他们预期的结果，使这来自陆、海、空军的3位干部对我毫无办法，我对他们当然也不感兴趣，但是我们仍然得不断打交道，双方都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可惜当时不允许我问问他们的姓名和单位，不然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友谊”呢！除了那位负责的陆军干部外，对海、空军的那两位印象一般，每次审讯都由他们两个做记录，审讯结束让我看记录时，我发现他们的记录都记得比较准确，说明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的，可惜他们的才能却没有用在有益

的地方，但愿他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也能得出一点经验教训。

在同专案组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掌握我多少材料。由于我的“态度”一直不好，没有顺从他们的意愿，对我就渐渐失去了信心，提审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后来隔两三个月才来一次，平时我就被他们扔在一边关着。这样的状况继续到1971年秋季才有了改变。这年发生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我们在这里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也觉察到一点异常迹象。我从国庆节期间的报纸上，看到林彪的名字不见了，开始还在外国来的贺电上出现过，只是不象往常那么显眼，渐渐地就完全消失了。当时有几个外国首脑来华访问，周总理出面接待时，按照惯例总是要代表毛主席和林彪对他们表示欢迎，可是在周总理的讲话中，却只代表毛主席不提林彪了，我便猜想到可能是林彪出了问题。也就是“九·一三事件”以后1个多月，专案组又来找我了，向我提出的问题也变了，不再只是我自己的事，而都是有关林彪的，他们虽然什么也不明说，我却多少心中有数了。最初他们问了我两件事，第一是解放战争中林彪在哈尔滨同苏联领事馆有过什么接触？第二是在同一期间与美国人有过什么接触？因为当时我不明白林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愿暴露出自己已经察觉和猜想到什么，便故意若无其事地说：“第一，我是1947年初由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回到东北军区的，在哈尔滨时我主管军工生产，没管司令部的工作，同林彪就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我也没有同苏联领事馆打什么交道，因此不知

道林彪同苏联人有过什么接触。第二，我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工作时，曾经奉命两次陪同美国人去见林彪。第一次是1946年8月，由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通知我，陪同北平军调部美方主任丁伯门少将，去哈尔滨见林彪，我执行了这一命令。林彪与他会见时，陪同者除我以外还有李立三和翻译等好几个人，会谈中间还吃过一顿饭，当天就结束了会谈送走了那个美国人，我没有发现在会谈中有过什么问题。第二次是同年的11月，东北执行小组的美方组长戴梯乐上校，要求去哈尔滨见林彪。当时林彪是我军在东北的主要指挥者，对外有点影响，过去也比较出名，美国人很想通过林彪摸一点我军的动向，试探我们有没有进攻国民党的意图。他的要求被我方同意，仍决定由我陪同他去会见林彪。这些活动都是通过组织进行的，我认为其中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样答复了以后，专案组的人却以为我还有什么顾虑，不敢揭发林彪的问题，就对我说：“你现在不要有什么顾虑了，林彪已经成了一个大坏蛋，有什么你就只管说吧！”他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是我表示了惊奇后，又对他们说：“林彪是不是个大坏蛋，我现在不了解情况不好说，我只知道讲事实，没有问题的就是没有问题，我不能随便说。”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专案组对我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对于我自己的问题，也能够听取我的申辩和解释，只是有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有的历史上大的事件，常常各执一词，得不出妥当的结论来，其中有的连我自己也记不准确了，这就给审查工作带来了麻烦。例如有这样一件

事，有一位叫林瞳的同志，我记得他是1939年在苏联受训结束，回国时是通过我所在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转赴延安的。40年代初我调回延安工作，还曾同他互有接触，这些印象我都相当清楚。后来他又去了苏联，1946年初他再次回国到达东北，当时我也在东北。他这次是由苏联派遣回国工作的，中苏双方事先协商并征得我方同意，将他安排在东北军区司令部三处（即通信联络处），负责中苏双方的联络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说我替苏联人做情报工作，把我当作“苏修间谍”来审查。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40年代还是斯大林领导的，两党的关系是正常的，友好的，相互间有互通情报的协议，林瞳的工作不是非法活动，是由我党领导机关批准的，不存在什么“间谍”问题。我把这些情况反复地给专案组的人说了，可是他们总是抱着自己的先入之见，就是不同意我的说法，双方一直在扯皮。直到我被“解放”以后，有一次到济南见到了林瞳，专门向他询问了这件事，他说他1939年回国是从苏联直接到延安的，并没有经过兰州办事处，还有许多情况都与我说的一样。原来正是我们两个人各自都按自己的记忆去说，结果出现了矛盾，专案组就抓住这个问题，认为我态度不老实，干扰了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直接影响到我的问题的解决。可是我却以为这些事都算不了什么，并不是很难搞清楚的。倒是那些审查人员自己抓到一点问题就大惊小怪，又总是想把问题搞得严重些，甚至按照一些对我的诬蔑不实之词来追究问题，结果当然越缠越乱，把对我的审查一再往后拖

延。

尽管审查过程中遇到了不少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原来的伙食是由看管我们的连队代管的，他们的伙房主要为战士服务，当然不管我们这伙“黑帮”吃得如何，营养不良造成了体质下降，这个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6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1角5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有了改进，怎么说也是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是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关到这里几年，我自己感到身体越来越衰弱，发现了不少病状，糖尿病就是一种。这是我过去在北京医院住院时，从别的病友那里得到的知识。糖尿病的主要症状之一是尿多尿急，我那时正是这样。我便把这情况告诉了医生，要求给我诊断一下。医生很负责，亲自陪我到卫戍区的医院作了检查，果然确诊为糖尿病，就让我进行药物治疗，每天服用D860，1天3次，连吃了1个月，复查了一下，认为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也挺高兴。可惜当时实际上并未根治，以后又复发了，并且至今也没有治好，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在我身上留下的一个真正的后遗症。

总之，虽然我们那时刚得到这样最起码的待遇，我们

却觉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改变是很有来头的。林彪事件暴露以后，有人向毛主席反映了监狱和“监护”中的许多严重问题和恶劣作法，毛主席对此作了批示，批评了这种“法西斯审查方式”，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改进，使我们因而沾了光。

曙 光 初 露

林彪垮台以后，好事接踵而至。1972年1月，又有了个新情况，我得到通知，准备与家属见面。从1968年5月被关进卫戍区以来，我已整整4年没有见过妻子儿女，连他们的音信也一无所知，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的下落，现在能够重见，当然非常高兴。见面以前，我连忙向看守人员讨来刮胡刀，在他们监视下刮了刮胡子，以免家属看到我真成了一副“囚徒”模样。上午我就被带出关押地点，送到附近一个地方，看到徐和已经领着孩子们守候在那里了。亲人相见，真是感慨万分，只有二女儿望生，远在安徽，未能赶回，别的全都见上了。原来在我进了“牛棚”以后，我的全家人除了最小的女儿以外，先后都进了各个所在单位或学校的“牛棚”，其重要“罪名”之一也就是因为有我这么个“黑关系”。他们被关了一阵以后，又分别被下放到外地的干校、农场或生产队劳动，只有大女儿曼曼由于早在部队医院工作，所以还留在北京，她到处打听我的下落，直至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来探望我。经过不少周折，也可能是她给周总理的信起了作用，终于被允

许来看我。她一得到批准探望的通知后，立即向散在外地的亲人发了电报，让他们赶回来参加探望，所以这才有了这么一次极为难得的聚会。

只是在见面之前，管理人员就预先对我下了禁令，同家人谈话时只准说说家常事，不准涉及政治问题，尤其不准说“监护”中的情况。家属子女们看来事先也得到了同样内容的警告。在见面的时候，旁边还坐着一个看守，监视着我们的活动及谈话，开始我们确曾认真地遵守着有关规定，不过孩子们总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尽可能让我多知道一点外头的情况，他们便趁看守人员比较松懈走出室外的机会，让几个女孩子故意大声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掩护着我的儿子天福，让他凑在我耳边悄悄对我讲述了林彪的“九·一三事件”等重要情况，这对我当然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以外我们都没有违犯禁令，特别是我自己，不让讲的事确是没有讲，因为讲多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又会增加家里人的不安。卫戍区方面对我们这次见面看来还是相当照顾的，中午还让我们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虽然吃的是战士做的简单饭菜，但是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家里的人知道我在这里生活不会好，来时给我带了不少吃的东西，有糖果和各种罐头，还有西瓜，这都是几年来未见过的东西呀！他们初见我时，还以为我是发胖了，一细看才知道是浮肿，这是几年的囚禁生活和低劣的伙食造成的，营养不足加上精神压力和无法活动，使我体质迅速下降，浑身软弱无力，过去就有的心脏病加重了，又增加了糖尿病等新症。老实说，在那种情况下，我能一

直支持下来，没有被折磨倒下，已经是万幸了。好在大搞法西斯专政的林彪终于倒台，我们的生活已有改善，精神上也稍为放松，这次又能与妻子儿女相见，还得到他们带来的食物，真是精神物质双丰收了。

这样的亲人相聚，以后又安排了几次，他们每次来探望，都给我带来一些吃的，既补充了我的营养需要，又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安慰。我的孩子们了解到我的病情后，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及时治疗我的疾病。他们的信不久就有了反应，1973年春季，我被送到阜外医院住院治疗。这家医院在治疗冠心病方面很有名，我能到那里住院看心脏病，当然是很满意的。只是住院时仍有值班战士日夜守看我，不准我与别人接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使用，临时给我起假名字，因为本来不是我的名字，我早已把它忘记了。不过医院方面看来还是知道我的身份的，他们对我的态度比较和善，治疗也十分细致认真。医院的生活自然比在卫戍区好多了，每天的伙食费有8角钱，可以自己自由预定饭菜，我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计划，这一天吃得好一点，下一天就吃得稍差些，使生活有所调剂，在伙食标准以内尽量作些改善。不过，我本人虽然进了医院，被“监护”者的身份并未改变，不仅身边还有看守，专案组的人也不断来医院找我，继续审查和核实我的问题。

从1973年3月起，专案组的负责人换了，这个人还是部队来的，但却不象他的前任那么蛮横和主观，对我比较客气，能够听取我的意见。由于我常常就自己的问题进行申辩，他就和缓地提醒我，“你现在最好不要老是讲自己

正确的方面，应该多讲讲自己历年来究竟有过哪些错误，这样子可能更有利于早日解决你的问题。”我想想也对，老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把事情搞僵了是不大好，一个人既然做工作，就不能没有错误，我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作些实事求是的检查，这是可以的。于是我就按照当时的情况和个人的认识，主要检查了三条：第一是抗战胜利以后到东北，“执行了彭真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错误路线”。“文化大革命”时，彭真同志的“罪名”大得可怕，其中一条就是他在东北的问题。由于他同林彪发生意见分歧时，我曾支持过彭真同志，林彪一直对我怀恨在心，结果给我戴上了“彭真黑帮分子”的大帽子，因此我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进行检查。但是我在检查中反复强调自己同彭真只有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任何特殊的不可告人的关系，实际上否认了林彪等人强加给我的“黑帮分子”和“反党集团”的问题。我检查的第二条是50年代出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时，对南共的“修正主义”本质认识不足，曾经为他们说过好话。由于此事，我一直被批判为“政治立场”和“为修正主义涂脂抹粉”的问题，我在检查中承认了这条“错误”，但是只认为是个认识问题，否定了所谓“里通外国”等诬陷的罪名。第三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例如我那张著名的“四·六大字报”，曾经被康生点名批过，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可以不那么做，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但是要注意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尽可能不要扩大和加剧内部的矛盾。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当然都算不了什么了，但是在当时我不检讨一下也是不行的。我这样检

查以后，专案组也认为基本上可以了，只是还有些具体问题要进一步弄清事实，我也应该有所交代并作出检讨，以便作出适当结论。可是一接触实质性问题时，我们又发生了分歧。例如他们提出，我曾经攻击过康生和江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我是马虎不得的，一开始就尽量否认它，他们却抓住不放，反复追问我有过什么反对康生的言论。有一次把我逼急了，忍不住发火道：“康生现在是那么大的官，谁个敢反对他？”我心想康生正红得发紫，你们搞专案的人当然要听他的，并且紧跟、维护他。这样，双方就顶起牛来了。专案人员见我情绪很大，就指责我这是一种对抗情绪，说我用这样一种语言说康生，本身就是对他的不尊重，如我继续这样，就将严重影响解决我的问题。我听了考虑过后，觉得不宜在这上面纠缠，还是要有利有节，不能把问题闹大，更要给专案人员一个台阶下，便顺水推舟地说：“好吧，我刚才有点感情冲动，说话欠冷静，现在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他们倒是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往下追，却又追问我怎样攻击过江青，这更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很容易引起麻烦的问题，我便努力回避它，坚持说自己没有攻击过江青。但是专案人员还是不放弃这一条，反复让我谈谈有关看法。其实我对江青此人确是早有看法的，我们许多人对她一直印象不好。最初她与毛主席结婚，我们就认为是她挖了别人的“墙脚”，不是什么正派行为。现在把这种人一下捧成了什么“伟大旗手”，我在心里就接受不了，因此我在运动初期，曾经在小范围内议论过，江青过去没做过多少工作，现在竟一下

子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啦！对此表示了怀疑和不满。我想也许有人将我这话反映出去了，但如果说我曾表示过什么看法，那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攻击。专案组说我有那些看法也是不对的，并要我写一个书面材料给他们，我想脑子里想的、口头上说的同形成了文字的东西是大不一样的，深知其中利害，便对专案组的人说：“你们要我谈看法，我已经告诉了你们，该说的说过了，就不必再写什么书面东西了。”可是他们还是坚持要，我就坚持不写，结果又顶起牛来了，我又没好气地说：“这事对于我来讲，未必能定我多大的罪，对江青来说，也不会给她增添多少光彩，情况你们已经知道了，该向上反映的你们自己去反映就是了！”磨了好一阵儿，我就是不写，最后大概他们觉得我这个人也不大好缠，这个问题本身搞不好也有麻烦，也就悄悄作罢，同上述康生那个问题一样，搞不出什么油水来就放弃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扯了一阵皮，就是在我开始受到冲击时，有位住在我隔壁的亚洲某国兄弟党的负责人，平时由于工作关系和互为邻居，有过一些接触，他的孩子在中联部武斗时被打伤，我是部领导人中唯一去慰问看望过的，因此他对我印象比较好。这次见我受到攻击和批判，觉得很理解，为我抱不平，当时我还可以在家里住，他主动找到我，说很想找我谈谈。我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觉得不大合适，“造反派”们不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弄不好反而惹是生非，但是又觉得不宜断然拒绝人家，便说我的行动受限制，不便去找他，如果他乐意到我家走走，当然也

欢迎。我原想这样委婉地推托一下，哪知他真的到我家来了，我只得接待。他一来就十分关切地问我，到底因为什么事，将我打成了“黑帮分子”，问我认为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他说他很想为我说说话，不愿眼看着我一下倒掉。我便简单地向他讲了自己的问题，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谈了自己在东北和南斯拉夫等问题上的“错误”，还就一些事作了说明解释，主要是一些个人的事。据说后来他真的找周总理谈了我的问题，他的一片热心本想帮我解解围，不想事与愿违，他同我的接触也被“造反派”侦知了，这件事被他们传来传去，竟以讹传讹地将这次接触说得很严重，似乎我与那位外国人谈了多少不可告人的问题，特别是说我曾指名攻击了康生，所以成了专案审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对于那些本来不存在的事，当然坚决否认，但却引起了不少麻烦。因此我也承认了一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正处于那种境地，可以避免那次接触，也不必要谈那些问题，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我们自己尚且搞不清怎么回事，外国人更不可能正确理解它了。让一个外国人来“保”我这样的中国干部，是不妥当的，也不该将我们内部的事，渗进与外国党的关系中去。

1973年秋，我还在医院中，专案组又来找我，让我看了他们为我写的审查初步结论。我看后发现原来许多对我的诬蔑不实之词，基本上都没有了，一些被歪曲了的事实，也一一订正恢复了本来面貌，连历史上的家庭成份和我入团、入党的时间等等，也都重新按照事实肯定下来。我的主要错误，也就剩下了我自己承认并检讨了的3条，

即在东北、南斯拉夫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3个问题。只是在对我的整个评语中，说我“推行了刘少奇、彭真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说我仅仅是“执行”而不是“推行”，我没有独立地“推行”过什么路线，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和决议做过一些工作。开始他们认为不必要改，但我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将“推行”改成了“执行”，这是通过结论时发生过的唯一的争执。按照这个结论，我的问题的性质当然地就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工作中犯的错误了。我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说的“犯错误的好人”。专案组对我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相互间也不再是对立的敌我关系，双方可以平等地交谈一些事。他们告诉我，我的问题基本上都已查清，他们非常愿意帮助我尽快解决问题，马上向中央提出建议，及早批准对我的结论，争取尽快将我“解放”出去。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我当然不想在结论稿的细节和字句上再作计较，爽快地表示了同意，由他们去上送批准。

这时我还在医院中，专案组将那个结论拿走以后，我就十分安心地等待着对我的“解放”了，谁知左等右等却总是不见下文。我觉得自己已经住了半年医院，病情已处于稳定状态，老这么住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就提出了出院的要求。原来我想通过这个办法试探一下，促进自己问题的解决，好早点将我放出去。哪知道又是事与愿违，我倒是被批准出院了，只是并没有获得“解放”，反而又被送回卫戍区，重新关进了那间门窗紧闭的房子里，弄得自己十分丧气。当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了原因。

林彪虽然垮了，他的同伙“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们继承着林彪的衣钵，变本加厉地继续迫害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并图谋进一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此又煽起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反对复辟回潮”的黑风，干扰和破坏党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才将我们的问题一下子又搁置了起来，使我在反“复辟”声中反而“复辟”进了牢房，连原来被允许和家属的见面也被取消了。我重新沉入了无天无日的失望之中。

由于不了解外头的形势，思想上因过分的孤寂而十分苦闷，觉得自己本来没有多大问题，已经挨了那么多整，问题又已搞清楚了，却还出不去，心想按照这个样子，以后就是出去也没有什么作为了，走到哪里也是“犯错误的干部”，不可能再给什么重要工作干了。将来最好的出路可能就是给点起码的生活费，以了晚年。我本来出身贫苦，倒也不怕生活艰苦，能够维持衣食就行，只是希望不要再被折腾，能比较安定地度过余年也就满意了。有时候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我已经被囚禁了许多年，还要继续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不知何时是尽头，那日子真是难熬啊！幸好当时我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因此每天报纸来时，也就成了我最愉快的时刻，读新来的报纸，就是每日大事了。每份报纸从第1版头条的大消息，到末版下角的小球讯，我一个字都不肯漏掉。我本来是不大注意体育消息的，但那段时间里对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了什么比赛，哪几个运动员出场，什么人得了多少分，最后的名次如何等等，我都非常熟悉。

也就是这么一份报纸，使我与外界的社会生活还存在着一
点联系。我带在身边的《毛泽东选集》，也被反复阅读和
朗读了好几遍。我总想扩大点阅读的范围，就请求管理人
员给我些别的书看，并要求家里送来了《反杜林论》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我开始一
一认真阅读起来，觉得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以后
我又要求家里给我送一套《资本论》来，好利用时机啃一
啃这部巨著。过去我只是片段地读过，现在很想有系统地
通读一遍。家里及时将《资本论》送给了有关组织转交，
我催问了多次，却老是置之不理，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这
部书。我真不理解为什么不让看这样的书，这真是我学习
上的一大损失。当时正是“尊法反儒”的高潮时期，他们
也给我送来了当时流行的杨荣国编著的《简明中国哲学
史》等书，还给我拿来了《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长篇
小说。我是来者不拒给了就看，并且认真地看，总想吸取
点有用的东西。这样读读书，总比每天呆坐着好。于是我
这个平时难有空闲读大部头小说的人，也饥不择食地将
《艳阳天》等百万字巨著，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拜读了一
番，欣赏了当时我国最红的文学名著，也填补了我囚禁生
活中的不少空虚。在读《中国哲学史》时，看到书中引用
的唐代佛教徒写的几句偈语，其中一段是：“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这使我深有所
思，觉得一个佛教徒尚且有这样的精神，作为一个共产党
员应该怎样呢？因此拟了以下几句：

“身为共产党，

坚贞为革命，
时时勤检讨，
莫使染病根。”

听说许多“文革”中被关着的老同志，都写了一些“明志诗”，我除了上述这几句“偈语”，也曾谄过几句。因为我从1967年初到当时已近8年，所以写道：

“人生八年有几何？
岁月蹉跎风浪多，
艰苦奋斗如一日，
古稀年后晚节歌。”

虽然不算什么诗作，却也表明了当时的心境和感慨。

那几年除了隔一段时间接触一次专案组人员外，同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看守我的战士了。那些纯朴而天真的年轻人，一面忠实地执行着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一面也不得不观察和思考着他们面前发生的事物。有好些战士就在我面前逐渐流露出了自己的疑问；越来越多地表示出同情心。前面说过，当我睡觉时用毛巾遮住刺眼的灯光时，有的战士开始按规定不准我遮，有的却善良地默许我遮上安睡一阵儿。特别是我在阜外医院住院时，负责看守我的一位战士，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洞庭湖边一个农民的儿子，几次让我给他讲讲我军几位元帅的故事，充满了对革命前辈的敬佩之情。他还把自己不理解的问题向我提出来，有一次他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叫“超天才”，我开始不清楚怎么回事，他就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就被人称做什么“超天才”。我说我只知道林立果小名叫“老虎”，却不知

他怎么成了“超天才”。他还问我当时挺有名气的谢静宜是不是谢富治的女儿,我更闹不清了。在日常接触中,我们相互也产生了一点友谊,他对我也比较照顾,有一次我将医院里的温度表打坏了,我问明价格后,正好是我一天的伙食费,便决定每天从伙食费中省出一些来赔偿,他却不同意,说是可以让公家报销,可见他对我是十分体谅的。

直到“批林批孔”告一段落的1974年8月,我才被允许见了一次家属。这次没有在通县,却把我拉进市里的一个“中立地点”,好象是铁狮子胡同的太帅府内。这次见面,家里人悄悄向我透露,现在已经有不少老同志被“解放”出来了。我在前几天的报纸上,也在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的报导中,看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曾经被“打倒”的杨成武、王尚荣和吕正操等同志,还有许多也被“监护”的同志。都一一出狱参加了社会活动,并在报纸上露了面。我想别的人我不太了解,吕正操同志的事我知道一些。他在东北时是所谓“桃园三结义”成员之一,“造反派”对他加上了许多十分可怕的罪名。他都“解放”了,而我这个后来被称为“桃园四结义”成员之一的人却被压着“解放”不了,未免有点不合理。家属在同我见面时,不断地宽慰我,说可能要等一个时机,赶一个什么节日“解放”一批,让我耐心等着。我想也可能是这样。下一个节日是国庆节,到那时可能又会“特赦”一批,我也许会在其中。从那时起我便一天一天地盼望着国庆节的到来,真是度日如年啊!哪知一直等到9月28日,离国庆节还有两天,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不禁失望地想道:这一批可能又没有希

望了，国庆节出不去，至少又得呆到元旦，还得准备在这里再被关3个月。这3个月我该怎么过呢？8月里家属来探望时，曾经给我送来了一些食品，现在还剩下五六个罐头，得有计划地食用，打算每两个星期用它改善一次伙食，这样就可以坚持到年底，如果到那时还出不去，家里可能又会来探望，会带一些吃的来，我就继续坚持下去，反正是“听天由命”吧。

正在我作这样的打算时，1974年9月29日上午，卫戍区派人来通知我，让我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全部整理捆包起来。我一听心里立刻欢跳起来，心想这可是一个新动向，希望终于来了！马上遵命收拾好东西，反正很简单，几下就弄好了。不久他们把我带出了这间消磨掉我近7年光阴的房子，来到了一处挺体面的会客室，里面除了卫戍区的同志，还有中联部军管会的负责人。他同我见面后，说他受部里的委托来通知我，对我的审查已经结束，现在就接我回去。还特别告诉我，我将参加明天（即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久盼的一天就这样来到了！上午我就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物品，在中联部来人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机关住地，马上同家里人见了面。部里还通知我，已经给我家另外找了个住处，那是原来给外国学员住的地方，正让那边腾房和清理一下，下午就让我们搬过去。其实当时我能如愿“解放”出来，已经喜出望外，对于搬什么地方也就不介意了。这样我的生活又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结束了将近8年的“牛棚”生活。

欢聚一堂

我从1967年4月起被剥夺了自由，先后被“家庭管制”两个月，“机关隔离”11个月，“卫戍区监护”6年零4个月，共被关了7年零5个月，加上开始受冲击和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正好整整8年。说来好笑，刚刚恢复自由回到家里时，总想先来点好东西吃吃。我向家里人说，先给我煎几个荷包蛋吃吧！因为这是湖北人最爱吃的东西，也是最容易办到的事。在长期的关押中，别说吃荷包蛋，连一个完整的鸡蛋都没有见过，这次得给我补偿一下。按我以往的惯例只吃一两个，今天我要求家里人煎它3个，好吃个痛快。哪里知道，那几年国家被“四人帮”和“左”倾错误搞得市场贫乏，鸡蛋很少，我家里一共只有两个鸡蛋，无法满足我的“奢望”。见此情形，我只得遗憾地说，好吧，就来它两个吧！心想要在“牛棚”中连这两个也得不到呢！

令人遗憾的事还不止这一件，我自己总算出了“牛棚”，但是，经过8年分离的全家人，却很难一下子聚齐了，几个孩子都还流落在外地。在我被整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全家每个人也都历尽艰苦，吃了不少苦头。就在我被抓进卫戍区的那一天，我家里又再次被抄，不久又说不能让我老伴徐和“逍遥法外”，将她也关进了机关里的“牛棚”，不是写交代，就是挨批判。关了几个月后又被迫去黑龙江中联部五·七干校，连床铺桌椅都被捆扎起来带去

“安家落户”，去后先自己和泥做砌住房用的土坯。过了不久，中苏边界上打起来了，康生他们又说，那里成了前线，中联部的这批人会外语，要防止他们叛逃和里通外国。一声令下，又将干校迁到内地河南，床铺桌椅和行李用具等，又被捆扎搬运了一次，许多都被折腾坏了，人更是弄得狼狈不堪。迁校时火车路过北京转车，命令一律不准出车站，只准在京的亲人到车站上去见一面，搞得家家户户如生离死别般的难受。那时徐和已年近花甲，但也不得不“战天斗地”了好几年。几个孩子都以各种罪名被关了起来，有的什么罪名也没有，只因为是我的孩子，就作为“黑帮子女”、“狗崽子”被狠整了一番。康生甚至点我四女儿的名道：“伍延力这个人很坏，她连毛主席都敢反对，更不要说是反对我了。”其实延力也只是议论过对康生的一些看法，康生却诬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结果使她被关后又被赶往外地，党籍也丢了。大女儿曼曼正怀孕，也得挨斗和进行“劳改”，直到生孩子也逃不脱进“牛棚”的厄运。最小的女儿伍星才是个初中学生，在全家都被关进“牛棚”后，感到自身难保，只得自动报名上山下乡，可是因为是“黑帮子女”，连农场都不能进，只能到内蒙古大青山下武川县的一个农村插队劳动。这几年中我全家人真是高度分散了，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广宗，一个在河北尚义，一个在安徽淮南，还有一个在内蒙古，直到我“解放”回家，他们还大都是分属于外省各地的人。

因我受株连的范围还波及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例如我在中联部的秘书于洪海同志，当我一被揪出时，“造反

派”们就胁迫他交代揭发我的“罪行”，不交代不准回家。当时有不少领导同志的秘书，在这种情况下就“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按照“造反派”的需要，胡说一通，将自己的首长搞得很狼狈。但是于洪海同志一直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肯乱说，结果也被当作不可信任的人被下放到外地。开始要他与王稼祥同志的秘书一起“流放”到新疆和青海，因为接收单位看到档案里注明他们是什么人的秘书，表示不敢接受，后来才与徐和等一起，被送到干校劳动。

我听了自己全家人这几年的遭遇，一面觉得心情沉重，一面也觉得他们都经受了一场难得的考验。特别使我欣慰的是，我们全家人几乎无一不漏地被林彪、康生之流狠整了，但是却没有一个向他们屈服讨好的，更没有跟他们跑的。尽管他们由于年轻，在动乱开始时也曾热情投身运动，但是现实生活很快教育了他们，使他们一一清醒过来。延力在被康生点名受迫害时，曾经写诗明志道：“大江千古流，英雄难究，巾帼女儿何自羞，不肯深院锁春秋，此生何求？峥嵘岁月稠，百感心头，来日方长显身手，血气方刚不须愁，大任肩头。”甚至还曾写了血书，表示忠于毛主席，来抗议康生之流对她的诬陷。从这一点上来说，年轻一代都在政治动乱中经受了锻炼，逐渐成熟起来，大概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之一，虽然它是由痛苦的代价换来的。

我回家的第2天，即9月30日，接到参加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的正式通知。当我步入8年未

进过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碰到了不少久违了的同志，有不少同志与我一样，也是刚刚从“牛棚”中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许多人都有着相似的遭遇和经历，所以在我们重逢的时候，心情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庆幸的不只是个人的解放，而是看到党的干部政策又开始落实，使我们这些一度被打成“黑帮”的人，终于又获新生。

后来我们知道，这次许多同志的获得“解放”，是毛主席直接干预和周总理努力工作的结果。当时江青和康生之流还攫取着一定权力，在他们的干扰下，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得很慢。后来毛主席指示，这样一个一个地解放干部太慢了，应该一批一批地解决问题。周总理根据这个指示，一下子提出了几百人的名单，通过让他们参加国庆招待会的方式，宣布他们的“解放”。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名单，江青之流也就无法表示反对，这才有了我们大批人的同获“解放”。在招待会上，我们见到了一直在为党和人民事业操劳的周恩来同志，他是从医院里直接来到人民大会堂的，只见他的身体同8年前所见相比，已明显地瘦弱和衰老了。林彪、江青之流的破坏捣乱，造成了全国性的人为灾害，成千上万件令人心焦的事，过早地消耗了他的精力，加重了他的病情。尽管在一个时期内，他不得不还同康生和王、张、江、姚等人坐在一起，但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着党的正确方针，尽可能地减少着、弥补着内外敌人造成的损失。就在这次招待会上，我们又听到了他那熟悉和亲切的声音，他在招待会上作了简短而鼓舞人心的祝酒词。他讲话结束后，我和全场几千人一起，

由衷地为他的讲话，也为我们能重新听到他的声音，更为在艰难时刻度过的国庆 25 周年，热烈地鼓掌和举杯祝贺。

10 月 1 日的报纸上，登了一个长达一个多版面的几千人大名单，公布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全体人员姓名，前面照例是党、政、军和北京市负责人的名单，在“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之后，也出现了我的名字，虽然它只占了 3 个小号铅字的位置，但这是 8 年来第一次不是作为“打倒”对象出现的，它标志着我的生活的又一转折。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又恢复了自由，重新获得了一个公民和革命干部的起码权利，当然这是值得庆贺的。

解除“监护”以后，虽然已经审查结束，却未分配我的工作，只得在家休息和闲呆着。这时我的老母亲还在武汉老家，这几年动乱中也不知她怎么样了，只听说她和在老家的亲属，也都因为我的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我决定利用这一空闲机会回武汉去探望他们。这年 11 月，我同徐和还有大女儿曼曼，自费回到了武汉。虽然当时我什么职务也没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同志还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武昌东湖边的“翠柳村”给我们安排了个住处。一安顿下来，我就到武昌戈甲营那个巷子里的老家，看到了久别的年高老母和其他亲属们。这次相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原来我在北京被“打倒”以后，武汉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马上在我家里里外外刷上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修权”等大标语，糊满了公布我“罪状”的大字报，高音喇叭整天冲着我家大门吼叫。尽

管我从来没有在戈甲营这个家里生活过，“造反派”们却照样在那里抄了家，我的老母亲已经 90 多岁了，从来不问外头事，只知道忙家务，竟也因为有着我这么个儿子受到训斥。别的亲属也因受我株连影响到他们的处境，有的被迫离开部队或调动工作，有的被下放外地，有的档案中夹了说明与我的“黑关系”的材料。真是“一人犯事，九族受害”。林彪、江青之流口口声声“反复辟”，其实他们当时搞的那一套，才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大复辟。

这次回武汉我顺便考证了一下我的家庭成份，因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曾经也是我被审查的内容之一。我家里明明都是普通劳动人民，属于“城市贫民”成份，“文化大革命”中竟被“造反派”们说成是什么“反动资本家”，甚至说我家“五代以前有过血债”，据说北京的专案组以及什么“专揪伍修权兵团”之类的造反组织，曾经到武汉来外调我的材料，真的追查了我家五代以前的历史。当他们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证实我家确实是“反动资本家”时，那位同学说：“这真是活见鬼了，你们说他家是资本家，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们家的房子，有哪个资本家是住那种破房子的？”原来武昌确曾有过一个叫“伍意丰”的大杂货商资本家，只是我们除了同姓一个“伍”字之外，没有任何瓜葛。想不到连这点捕风捉影的事，也被“造反派”利用来当作诬陷人的“炮弹”。

1975 年元旦，我们全家好不容易地集合起来，过了 8 年以来第一个团圆年。我和一家大小挤在临时分给我们住的不大的房子里，我欣喜地看到，几个大孩子已经在动乱

年代分别成了家，并且有了下一代，我们这一家没有被政治风暴吹垮掉，反而兴旺起来了。在历史进程中，我党我军曾经遭受过几次重大的挫折，但是每一次都在危难中重新站立并且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中间，有多少好同志牺牲了生命。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大内乱，又有成千上万名好同志，在这次“内乱”中失去了生命。我本来是历次战争的幸存者，又成了这场特殊“战争”的幸存者，抚今思昔，不由感慨万千。全家团聚时，我给孩子们讲了我党的历史和个人的经历，我说我们党和军队的每一次从失败走向胜利，都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援。记得红军长征后期，部队正处于弹尽粮绝无以为继时，一下得到陕北人民和当地红军的支援，吃到他们送来的小米，穿上他们新做的棉衣，使我们这些历尽艰险、饥寒交迫中的同志，一个个都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我在谈到这些历史时，自己也很激动。因为当时江青、康生之流还在台上，党和国家还没有摆脱他们造成的巨大灾害，但是也正因如此，中央已经在全国开始进行整顿，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正在用各种方法，尽力减少以至克服江青、康生一伙造成的灾害后果。

元旦后不久，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意外地又成为这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我是被编在天津市的代表团里，周恩来总理也在天津代表团。我住在京西宾馆，同江华同志在一个房间，只是他天天回家没有去住，我却充分享受着给我的优待，重新参加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会议期间，我还利用机会一一拜望了朱德

委员长和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师，他们都对我说了不少宽慰和鼓励的话。这次会议表面上开得比较平静，实际上在会下尤其是在会前，江青之流正在进行猖狂活动，妄图篡夺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把人民敬爱的朱委员长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赶下台。中央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周总理抱病出席了大会，并且亲自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正是在这次报告中，他代表党和人民的意愿，发出了鼓舞人心的伟大号召：“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报告以后不到1年，周恩来同志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在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总理亲自参加了天津代表团的座谈会，他亲切地问候了到会的代表，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和工作情况，对他们提出了希望和告诫。还同一些年老的爱国民主人士一一作了亲切的谈话，问了他们的近况和要求。对于我们一些老同志，他说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同你们就不多谈了。我见他拖着衰弱的病躯，也不忍心再占他的时间，虽有千言万语却一句没说，只向他作了早日恢复健康的祝愿。但是事实上他的病情已经日益加重，他能为我们造福和操心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就在他同我们的谈话中，他坦然地说了自己的病情。他说：“我已经得了癌症。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仍然在同疾病作斗争，相信自己还能够再坚持一阵。”他说得安详自若，但是我们听得既心

酸又心疼。他的身体原来可以说是很健康的，但是十年动乱的内忧外患，很快把他折磨得这样。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拖着病躯来继续操劳，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届人大经过与江青一伙的激烈斗争，仍然选出了德高望重的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陈云等同志为委员长或副委员长，继续任命周恩来同志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副总理。中央并决定，在周总理治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此以前，已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次人大的选举中，我又意外地成为本届全国人大常委，这表明了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也是我在“牛棚”中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从1967年1月我开始受到冲击，被迫停止了工作，到这时整整8年，恰好与我在外交部工作的8年和在中联部工作的8年相等，成为我建国以来度过的第3个8年。所以我曾自嘲地说：“我现在也是‘三八式’干部了！”

不论怎么说，当时全国的十年动乱虽然尚未结束，我个人却同许多同志一样，终于告别了恶梦似的长达8年的“牛棚”生活。

回忆和平解放西藏

李 觉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党中央、毛泽东英明领导和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关怀和支援下，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建设西藏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共中央做出和平解放西藏 的决策，第18军受领进军西藏、 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第二野战军于1949年11月1日，发起了向西南进军的战斗。当时，我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进军西南的战斗虽依旧频繁紧张，情况仍复杂多变，但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不论从全局还是从西南局部来看，胜券已经在握。这时，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3日关于由西南局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指示，着手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了。

西藏是中国领土，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席卷全国之际，西藏地方当局的反动分子则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于1949年7月制造了“驱汉事件”。党中央对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行为极为关注。9月2日，新华社发表《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这次“驱汉事件”的目的，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并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西藏。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希望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揭穿帝国主义阴谋，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我们预感到解放西藏将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

1949年12月中旬，党中央转来了毛主席在访苏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首长的信，信的大意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元旦过后，党中央又转来毛主席从莫斯科给刘邓贺首长的电报，要求立即研究部署进军西藏问题。提出

进军兵力只需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应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进军。为此，指示进藏部队应迅速进驻打箭炉（今康定），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12月8日，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领导打电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并决定以18军为主，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同时，建议第一野战军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力形势。

刘邓贺首长决定由18军担负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支部队英勇善战，作风顽强，有独立作战的光荣传统。在坚持冀鲁豫、开辟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经验和能力。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为首的领导力量坚强，在军师领导层中还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的。

1950年元月10日、15日，刘邓首长在西南局驻地重庆曾家岩，接见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刘伯承司令员说，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当起来！

邓小平政委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去争取政治解决。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靠政策走路，要坚持民

族区域自治，团结达赖、班禅两大集团。最后邓政委鼓励到会同志，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军人无尚的光荣。

党的信任，领导的期望，激励着参加会议的每个同志。他们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统一祖国大陆，实现解放西藏的责任感和 18 军军师领导的革命激情，使我强烈地希望回到我战斗过的老部队，同战友们一起战斗。当夜，我在张国华住所谈到这一愿望时，他欣然表示欢迎。随后，我即向领导提出进藏的请求。

3 天后，李达参谋长对我说：刘邓首长已批准你的要求，决定你去 18 军任第二参谋长。李参谋长深情地说，进军西藏是十分复杂而艰苦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精神准备。他说，红军长征路经甘孜时，都亲身经历过那个地区的艰苦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进军西藏的关键是我后方保障能力。刘邓首长对此非常关心。他要我与后勤部长姚继鸣同志全面研究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问题。

春节后，我就要离开重庆，节前晋见刘伯承司令员。他亲切地对我说，我们上上下下对西藏情况了解的都不多，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完成进军西藏、经略西藏的任务。他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最重要的是切实执行共同纲领、民族政策。语言不通会带来诸多不便，这就要更加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热爱西藏人民，以实

际行动团结群众。他非常郑重地说，这次进军，要进得去，站得住；保卫好边防，搞好交通运输建设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在进军的同时，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筑路。西藏的公路建设要先纵后横，首先修通联接内地的战略纵深道路，尔后再以拉萨为中心向横的方向、向边境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住脚根，建设西藏，保卫边疆。刘司令员还风趣地对我说，这次进军，领导思想上要有饿肚皮的准备，一个军在高原上前出几千里，要保障不饿肚皮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他伸出手指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军部队要精兵；二是加强部队管理教育，保障人马健康；三是要搞生产，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产，历代王朝在边疆也搞戍边屯垦，我们叫建设边疆；最后一条是西南人民和部队全力支援你们。刘司令员的话使我深受教益。

1950年春节过后，张国华同志来重庆研究进军方案。他对我说，毛主席1月10日致电党中央和刘邓贺及西北局，指示西南局拟定一个负责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构及委员人选。中央已于1月24日批复了西南局的报告，同意组成由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以及天宝同志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委。中央批示中还提请西北局考虑是否有其他人可加入此委员会。对此，西南局正与西北局研究安排。张国华说，这样不仅加强了领导力量，而且有利于互相学习，增强团结。随后，张国华心情不安地说，中央要求我军于4月中旬以前，争取由康定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路，于5月中旬开始入藏。而目前川西、西

康匪患十分猖獗，严重影响进藏的准备工作的。军拟以主力投入剿匪，打开前进道路，自己动手，争取时间，做好进军准备，安定进军后方。同时，再组织一支强大的先遣支队，进至甘孜、巴塘及金沙江东岸沿线，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的进军部署。

农历正月初五，我带领 30 辆满载新式无后座力炮、高平两用自冷式重机枪、各式电台等新武器装备的汽车车队，离开重庆，踏上了新的征途。

张国华从重庆返回军部驻地乐山后，召开了军党委会，着重研究进军问题。会上，他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他说，我军解放西藏是坚定不移的。至于以什么方式解放，无非是军事的，或政治的即和平的两种方式。鉴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央希望并争取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中央要求进藏部队切实贯彻这一方针，争取实现和平解放西藏。他接着说，中央和西南局指出，国内外形势对我解放西藏非常有利，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面前，西藏可能出现和平解放的前途。对此，中央已同意西南局派出人员赴藏，劝说达赖集团脱离帝国主义势力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并指示西北局如有适当人选也可派到拉萨，进行劝说达赖集团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军解放西藏的事业，正受到西藏当局和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势力的阻挠。西藏上层集团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地方政府中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组织“亲善使团”，寻求外国

出面干涉，妄图以武力阻止我军进藏。因而军事较量的前途是严重存在的。但是，当其受到我军军事打击之后，又可能出现和平进军的局面。因此，实现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要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的。

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师的领导着重讨论部队进军的实际准备，他们对后勤补给尚有顾虑。

张国华最后说：我军进军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是向广大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谈判，甚至派兵阻止我军进藏，不打不足以敲开和平大门时，才施以必要的、有节制的打，这个打也是为了和，这叫先礼后兵，以打促和，打了再和。总之，我们要两手准备。3个师主要是做好打的准备，能战方能言和，这是军事工作的基点。至于后勤补给问题，刘邓贺首长非常关心，多次指出：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重于军事；作战与补给比较，补给重于战斗。进军西藏的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其关键在于能否实施顺畅的运输补给。为此，军区决定：成立支援司令部，全面规划后勤支援工作；不惜任何代价，赶修公路；抽调4至5百辆汽车组成汽车部队；各军各抽组1000匹骡马组成兽力队，担任甘孜以西的随军运输。

2月中旬，军拟制了两步进军方案。第一步军前指率52师及157团入藏，军主力集结于甘孜，修公路，组织支援工作，在补给求得解决的情况下，实行第二步——后续部队进驻西藏。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3月14日军党委决定组织南北

两路先遣支队，由王其梅同志和我组成前进指挥所（以下简称前指），统一指挥先遣行动。北路先遣支队由 52 师师长吴忠、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同志率 154 团组成。南路先遣支队由 53 师副政委苗丕一率 157 团组成，分别进至甘孜、巴塘地区。先遣的主要任务是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兵志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进军部队和西南军区提供可靠资料和政策意见；开展对西康藏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和对广大藏族人民的接触，宣传我党我军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取得当地上层人士和群众对我进军西藏的支持，并通过适当的关系和方式对西藏上层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屯积物资，准备翻译，训练藏族青年；积累高原行军、作战经验，策划进军方案。

先遣支队进驻金沙江东岸地区， 建设进军前进基地，为争取和平解 放西藏而努力

1950 年 3 月 29 日，我军揭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当日 10 时，王其梅与我率前指（侦察营、工兵营、司政后机关部分人员及政策研究室）同北路先遣支队乘车由乐山出发。出征的第 1 天，乐山人民倾城出动，夹道欢送，将慰问品一一送到战士手中。军领导频频挥手送别，预祝先遣成功。人民的嘱托，战友的祝愿，激励着每一个同志。

次日，我们顺利到达雅安。当晚，王其梅和我拜见 62 军政委、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和刘忠军长。廖志高同

志详细介绍了西康藏族地区的基本情况。他说，进军西藏是党赋予的共同任务，省委，省政府和各族人民、62军要全力做好支援工作。他们在西南局的统一部署下，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和政权建设。沿途各级政府成立了支援委员会，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进军。省委、省政府和西康人民，为稳定和建设前进基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路先遣支队4月5日由雅安出发，经过20余天艰苦的徒步行军，于28日进抵当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康北重镇——甘孜。5月5日，吴忠同志来电反映“部队携粮已吃完”。我们所担心的断粮问题终于发生了。154团经受了解放西藏进军中的第一次考验。实际上，他们对粮食一时接济不上是有精神准备的。在雅安了解到雅（安）甘（孜）公路已基本被毁、补给和购粮十分困难的情况之后，吴忠同志对完成任务满有信心并作出节约粮食、长期打算、争取时间、确保到达甘孜的决定。他们从天全开始就减少了粮食定量，一路挖野菜代粮。部队初到甘孜时，群众对我尚存疑虑，郅晋武团长、杨军政委在吴忠师长领导下，带领全团官兵，以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挖野菜、捉地老鼠充饥，战胜了粮荒，而且还处处为群众做好事。他们秋毫无犯的行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密切了军民关系，赢得了群众的初步信任，群众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康定是自古以来进藏的要地。相传诸葛亮南征，于此地造炉打箭，因为得名打箭炉。4月24日，前指进驻该地。这座小城安宁而美丽，我们初次领略了藏区的风土人

情。康定解放后，62军187师驻守，师政委苗逢澍任地委书记。苗逢澍同志诚恳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我们与康定地委密切配合，全面展开了先遣工作。

全面深入调查研究西藏，是先遣支队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在对西藏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中认识到：

西藏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富于创造，对祖国统一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西藏社会是封闭的，是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西藏人民笃信宗教，喇嘛教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上层建筑的有力支柱；

西藏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地方政府当权的某些上层人士对祖国有离心倾向；

西藏没有共产党组织，没有党的工作，人民没有经过中国民主革命的洗礼。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深深感觉到，西藏社会矛盾状况特别错综复杂。阶级矛盾是基本的，但渗透与交织着民族的，宗教的，统一与分裂，统治集团上层内部之间的诸多矛盾。西藏上层和政教中枢的噶厦政府，既能统治人民，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

正确认识西藏特点和矛盾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进军与经略西藏的重要依据。王其梅同志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们，根据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宗族政策，认真细致地进行社会调查，为上级制定政策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建议。

西康藏族地区当时还是土司、头人、寺庙统治着。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上层人士，对创造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对支援我军进藏，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为此，军建立了统战部。这个地区有四大土司，即康定的明政、康南的木理、邓柯的林葱、德格的降央白姆。此外，上层实力人物，还有玉隆的夏格刀登和巴塘的邦达家族。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对于团结康区大小土司、头人十分重要。

我们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藏族上层人士及起义的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所属官员，只要热爱祖国，拥护共同纲领的，都真诚团结，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赞助和支援我军进军西藏。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在统战工作中要妥善处理好我党我军与西藏民族、上层人士之间的关系，促进藏族内部的团结，强调平等待人，严于律己，规定各级领导，分工负责，由吴忠、天宝、杨东生、陈竞波、平旺等同志分别做好甘孜、德格、巴塘地区的统战工作。我与王其梅及苗逢澍同志负责康定地区及夏格刀登等人的工作。

当年红军路经甘孜时，夏格刀登曾担任过博巴（即藏族）苏维埃政府委员、军事部长，支援过红军长征。西康解放后，任康定军管会副主任。我们非常尊重他的地位和光荣历史，遇事共同商量，赢得了他的信任。夏格刀登、降央白姆、邦达多吉等康区绝大多数上层人士，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支援我军进军，作出了很大贡献。

5月底，军转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行政

治争取”的指示。6月2日，西南局发出经中央批准的《关于以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给西藏工委的指示》。十项条件的主要精神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其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其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中央要求我军将这些原则向群众宣传。中央的方针和十项条件为和平解放西藏规定了正确方向。

前指和先遣支队依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在军的统一部署下，向西藏当局展开了政治争取工作。我们通过康定、甘孜、巴塘等地的上层人士和来往于金沙江两岸的商旅，将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十项政策以及党的民族宗教等政策，以各种方式传给西藏当局、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及驻守金沙江沿岸的藏军各代本。为表示和谈诚意，6月25日，我将邓柯方面渡过金沙江之小分队撤回东岸。

这里值得回忆的是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格达在西康和

西藏宗教界内，是一位有名望的活佛。1936年红军在甘孜时，曾任博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德总司令有过友好的交往，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西康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他满腔热情地支援我军，成为天宝，吴忠同志的朋友。他多次表示西藏只有回到祖国怀抱才有光明前途，而以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最明智的办法。格达活佛为了和平解放西藏，致电朱德、刘伯承，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规劝达赖喇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朱德、刘伯承同志高度赞扬了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同意了他的要求。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带着党和政府对藏族人民的关怀及十项和谈条件，由甘孜起程赴藏。

先遣支队广大指战员，在高原艰苦环境中，以高度革命责任感，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胞风俗习惯，宁可受冻也不住喇嘛寺院，宁可挨饿也不拿群众一粒粮食，还为群众挑水、打柴、春耕播种、送医送药，处处为群众做好事。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行动，向藏胞作了最实际的宣传，同时也促进了统战和政治争取工作的开展。藏胞一旦了解我军是人民军队，他们支援我军进军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几百名藏族青年参军，加入了解放西藏的行列；甘孜空投时，群众将散落在空投场外的大米、银元搜集起来送交部队。154团班长宋毛在帮助群众打柴时，不慎将卡宾枪掉入江中，被水冲走，藏胞格洛

捡到这支枪后，尽管他是爱枪的猎手，还是走了几十里路，把枪亲手交给吴忠师长。我军与藏族人民的亲密关系，就这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了。

先遣支队几个月的亲身体会，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运输补给没有基本保证是进藏之大忌。军党委遵照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和当年解放昌都的部署，在西南军区直接领导与关怀下，组建了以交通运输为重点的后勤保障系统。

8月26日，支援司令部在胥光义、谭善和等同志组织指挥下，经4个多月艰苦努力抢修的雅甘公路粗通甘孜。同时，开始了紧急抢运。然而，甘孜至金沙江边尚有250公里重型车辆不能通行，如不屯粮，部队则无法开进。为保证进军行动，支司与前指共同组织了两个轻型汽车连，3个胶轮大车连和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加上动员部分民畜，自9月初起经1个月的努力，向邓柯、德格抢运了40万斤粮食。与此同时，前指与康定地委通力合作，经与康区上层人士协商，在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前提下，一面采购部分青稞，一面组织玉隆至昌都300万斤粮食的牦牛运输。

9月初，我军主力在四川、西康人民和当地驻军支援和配合下，取得了川西剿匪重大胜利，歼灭匪特两万余人，稳固了我军进军后方；西康藏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广大群众积极支援我军解放西藏。加之，雅甘公路抢修工程和运输补给工作进展顺利，我军在西康藏族地区站稳了脚跟，有了一个较为坚实的进军基地。

西藏地方当局关闭和谈大门， 我军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在我政治争取面前，西藏地方当局置我党和平解决西藏办法于不顾，自恃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倚仗军事力量，一面施展拖延策略，将其和谈代表滞留印度，迟迟不赴京谈判，借以争取时间；一面接收外国军援，扩充藏军，武装民兵，陈兵昌都，妄图以金沙江为界，将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形势的发展，迫使我军与西藏当局，不得不在昌都进行一场军事较量。

1950年7月24日，王其梅与我率前指进驻甘孜，与吴忠、天宝会合。7月30日，苗丕一率领南路先遣支队157团进抵巴塘。

为了统一指挥解放昌都的行动，张国华军长、刘振国主任率军机关部分人员于9月5日到达甘孜。我们会合后，组成了18军前方指挥所（简称军前指）。

9月上旬，中共西藏工委为贯彻中央当年解放昌都、第二年进军拉萨的指示，在甘孜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昌都解放后的有关政策及工委机关的建立。张国华在会上说，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对西藏当局已做到了仁至义尽。1950年1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遵中央指示给西藏当局写信，阐述中央方针政策；5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绕加措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达赖速派代表团赴京谈判。之

后，又由西康、青海派遣和谈使者，并通过我国驻印度使馆多次敦促西藏当局，派代表协商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但是，他们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渠道，关闭了谈判大门。8月22日，和谈使者格达活佛被害于昌都，劝和的“青海藏族代表团”被软禁于黑河（今那曲）。中央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代表团：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和谈诚意，希望于9月上旬到达北京。但至今仍得不到他们的响应。因此，我军不得不以军事手段进占昌都。尔后，再做和平解决西藏的努力。

张国华说，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青藏高原气候特点，期于我军10月解放昌都。并指出：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们能于10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张国华说，毛主席对我军解放昌都后将主力撤回甘孜，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的部署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会议遵照西南军区“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的指示，根据藏军依托金沙江，扼守入藏咽喉要道，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经生达至邓柯（不含）线为重点，沿国德至盐井千里金沙江西岸，分南北两线，做分区配置的布势，决定我军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部署上，我与藏军针锋相对，分南北两个集团，对付藏军南北两线部署，将我军主要兵力用于藏军主要防守之北线生达、邓柯地区，以精兵奔袭类乌齐、丁

青，出恩达，兜击昌都，抢占邦达，切断藏军主要退路，制约藏军西逃。主力则分路合击，割裂藏军部署，协同一致地向心机动，将藏军会歼于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以东及类乌齐、恩达地区。

会议认为，昌都战役的结果，为国内国外所关注，对解放西藏，尤其是争取西藏当局和平解决问题关系重大，歼灭藏军越多，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越大。会议号召参战部队，坚决机智作战，排除一切困难，达到歼灭藏军有生力量之目的。在战区内人人宣传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俘虏政策，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自觉遵守纪律，做好统战和群众工作。

会议决定，昌都解放后，立即成立以王其梅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昌都分工委，统一领导昌都地区工作。同时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早日成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认为，打好昌都战役、做好解放后的昌都地区工作，对稳定西藏、争取和谈、准备明年进军关系极大。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全体指战员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而努力。

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鼓舞了士气，为昌都战役的胜利，为战后昌都地区的工作，做了思想和政策准备。

会后，张国华要我陪他去拜访夏格刀登等上层人士。13日，我与张国华、刘振国赴玉隆、邓柯，了解玉隆至昌都运输300万斤粮食的畜力落实情况。当张国华确认了藏族土司、头人支援我军进军昌都的诚意和能力之后，才

定下了进行昌都战役的最后决心。

这时，西北军区在彭德怀同志的亲自部署下，第二军独立骑兵师在新疆组成，其先遣连已进至西藏改则。青海骑兵支队已进驻玉树，完成了作战准备。

9月中旬，52师主力与先遣团会师甘孜，云南之126团先头营进驻德钦。各参战部队于9月26日向战区开进，北集团位于玉树、邓柯、德格地区，南集团位于巴塘、德钦地区，在金沙江东岸一线完成了战役展开，对昌都地区之藏军形成了弧形战役包围。

1950年10月6日，我军发起了昌都战役。

北集团为战役进攻的主要集团，由52师统一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钳击合围昌都及其以西之藏军。右路，由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率154团、青海骑兵支队、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担任战役迂回任务。当日，骑兵支队由玉树南下，154团、骑兵侦察连乘夜暗偷渡金沙江。该路部队日夜兼程，每日以120至160里的速度强行军，抢占甲藏卡，直扑类乌齐，实施千里大迂回。中路，由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领155团、师直、军炮兵营、156团组成，担任战役主攻任务。于7、8、9日，隐蔽渡过金沙江，依次作斜梯形展开，向生达，昌都攻进。左路，由苏同卿、王达选率侦察营、工兵营和54师炮兵连组成，担任正面箝制任务，7日，于岗托强渡金沙江，向当面藏军进攻。

南集团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担任歼灭南线藏军、抢占邦达、八宿要点的任务。5日，云南14军之126

团以及 125 团一个营在盐井方向发起战斗；7 日，157 团三路渡江，进击宁静。

我参战部队在进击中，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有的班长和党员要背 90 多斤。他们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在风雪晴雨变化无常的千里征途中，在海拔 4000 米的冰峰雪线上，在横断山脉的峰峦叠嶂中，风餐露宿，忍受着饥饿、疲劳和高原不适应带来的病痛，爬雪山，过草地，越冰河，淌急流，奋勇直前，战役按预想的方案顺利发展着。

10 月 12 日，南集团进占宁静，解放盐井，藏军第 9 代本格桑旺堆在我政治争取下率部起义，南线藏军所剩无几。北线藏军遭我打击后，逐步向昌都收缩。至 18 日拂晓，右路我骑兵支队以日行 160 里的速度急驰，累垮了战马 500 余匹，先于藏军 4 小时抢占了恩达。154 团经 36 小时的强行军攻占了类乌齐，切断了藏军主要退路，胜利完成了战役迂回任务。中路之 156、155 团及侦察、工兵两营，分 3 路逼近昌都。至此，除 157 团正向昌都以南之邦达、八宿急进，封闭尚存的一个缺口外，藏军其它退路均为我堵死。

我各路部队进展神速，藏军在我强大攻势面前已无法抗拒我军攻势。18 日晨，退集昌都的 4 个代本向恩达、类乌齐方向退却。当晚，进至宾多，发觉退路已为我切断，即掉头南下，改向邦达、八宿方向撤退。行至宗驿山，遭我阻击，在我政治争取下，新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放下武器。至此，昌都战役

遂告结束。23日，西南军区发来嘉奖令，庆祝解放昌都、类乌齐、江达、宁静、盐井、碧土等地、歼藏军5738名、争取第9代本起义的伟大胜利。

昌都战役使西藏地方政府丧失了藏军总兵力近2/3，在政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比喻的：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它的胜利，粉碎了西藏当局以武力阻止我解放西藏的企图，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在北京签字， 我军完成进军拉萨的准备

昌都战役的胜利，使西藏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藏当局武力较量失败后，内外政策四处碰壁，内部分化，矛盾加深，战与和的斗争十分激烈。主战者为失败而辩解，主张挟持达赖外逃，投靠外国，继续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主和者则追究未与中央谈判的原因和责任，主张即刻派人与昌都解放军谈判。大多数官员权衡利害，认为只有接受和谈才有前途。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促使爱国力量抬头，亲帝分子开始孤立，摄政大扎被迫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府遂决定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前往昌都，摸摸与我军和谈的底，同时组织达赖及其主要官员出走亚东，准备和谈不成，随时外逃。

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为争取实现全国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和平解放西藏的强烈愿望，在我军取得昌都战役胜利之后，因势利导，一面向外国政府表明西藏是中国领土，解放西藏是中国内政，不允许外国干涉的严正立场，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向西藏地方政府阐明我军进入西藏，旨在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维护祖国统一，帮助西藏民族和人民团结、进步，发展的政策，同时指示我军，充分准备，争取早日进军拉萨，解放全西藏。在进军中要坚决执行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实行一面进军，一面生产、建设的方针。

1950年12月，中共西藏工委为了贯彻中央的上述方针，召开了第2次工委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昌都战役震撼了整个西藏，拉萨当局已失去武力对抗的能力和信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前途日益明朗。为了迎接这一形势的早日到来，会议决定加强昌都地区工作，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和影响群众工作。号召爱国志士去拉萨劝和，联络进军道路上的土司头人，切实做好俘虏工作，以推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

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军进军与建设西藏的关系，提出长期建设西藏的任务。指出：解放西藏只是我军第一步任务，而长期建设西藏则是党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军长期的重要任务。为了统一全军意志，要求部队工作在观念上和行动中，从战争状态转变到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上来，真正成为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号召共产党员、全体指战员树立长期建藏思想。

会议根据西南军区关于解放西藏“用兵越少，胜利越大”的指示，决定将全军分为两大部分，以张国华、谭冠三，刘振国和我率军前指、中共西藏工委机关、52师师部及两个团、警卫营、炮兵营进驻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以陈明义、何雨农组成军后方司令部，率军主力进至甘孜及其以西地区，修筑甘孜机场、康藏公路，支援进军。同时，成立4个办事处，在后司领导下，部署3条兵站线，使各兵站成为既能进行统战与群众工作，组织运输，又能成为联接前后方的据点。

我驻昌都部队，在中共昌都分工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部队在粮食暂时接济不上、生活用品极为缺乏的情况下，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藏军官兵生活上以特殊优待，向他们宣传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帮助被俘的藏军官兵找回战斗中丢失的生活用品，释放时发给足够的粮食、现金和骡马。而我部队住帐篷，食野菜稀糊，不进民房、寺庙，爱护群众一草一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严格执行新区经济政策，不征购粮草，控制银元投放，稳定了物价，这一切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我军赢得了“新汉人”的美称。我党的政策和我军模范执行政策的行动，通过遣返藏军官兵和来往商旅迅速传到拉萨和前后藏。

昌都解放后，藏族上层人士和群众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阿沛·阿旺晋美和在昌都的40名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联名给达赖写信，告其解放军已停止前进，以亲身经

历阐述我党政策，要求达赖喇嘛派人和谈。昌都地区各阶层人士，为敦促拉萨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成立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主任的“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委员会”。和平解放西藏成为人心所向、不可抗拒的潮流。

达赖喇嘛一行到达亚东后，召回了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夏格巴等人向达赖报告了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政府的态度。这些国家都认为目前再用战争手段已不可取，只有谈判才是上策，至少表面上要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并表示目前难以给予西藏当局军事援助。达赖及其官员感到，目前依靠外国势力支持，搞所谓的“西藏独立”已不可能，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祖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凝聚力，在期待他们回到祖国怀抱。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和谈的办法，并委任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

3月下旬，阿沛偕部分和谈代表离开昌都前往北京。沿途受到我军修筑公路、机场部队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他们目睹了我军在高山严寒地带住帐篷、食野菜、面对缺氧、冻土、流沙、坚石不叫苦、不畏难的英勇献身精神，深有感触。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军建设西藏的实际行动，增强了代表们的和谈信心。

我军后方部队，在陈明义同志率领下，强化了后勤组织，全力修筑机场、公路。甘孜以东之八大桥相继通车，当年红军战胜“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英雄精神，又造就出千百名新的英雄。至3月底运至昌都粮食及物资700万斤，

为进军拉萨打下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1951年4月底，以阿沛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开始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双方代表本着友好团结的精神，经过20多天的协商谈判，圆满达成协议，于5月23日正式签字。

当夜，我们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的电报。消息不胫而走，军民奔走相告，机关、部队连夜座谈，欢呼这是党中央、毛主席解决国内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光辉胜利，祝贺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祝贺西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携手走上团结、进步的道路。

协议签字的第3天，毛主席发布了“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派必要兵力进驻西藏”的训令。我军高举着和平解放西藏的旗帜，开始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

我军高举和平解放西藏 17 条协议 的旗帜，胜利进军拉萨，把 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

和平解放西藏 17 条协议的签字，是我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我军根据协议规定，在中央和西南军区统一部署下，担负着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使命。6月17日，张国华军长和我陪同西藏和谈代表团由成都返回甘孜，研究

进军部署。

昌都是军前指进军的中间站，是52师进军拉萨的起点。由昌都进藏有3条主要道路。中路，为康藏通商大道，全程1100公里，要翻越念青唐古拉山脉的18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北路，在唐古拉南麓的广漠草原上行进，尔后翻念青唐古拉山脉，全程1500公里，地形较平坦，便于机动。南路，越横断山脉，全程1500公里，道路崎岖难行。为了加快进军速度，根据道路补给情况，决取中、北路西进，18军独立支队南下，3路相互策应的进军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分兵开进，缩短了队径；战斗部队走中路，行程短，争取早日到达拉萨。军前指干部多，辎重庞大，北路比较安全。决定以王其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成先遣支队，陪同西藏和谈代表团走中路，先期赴拉萨，配合张经武代表及阿沛等和谈代表开展工作，并为军前指进驻拉萨做准备。52师师部率154团主力、155团尾先遣支队以营为单位分批开进。军前指、中共西藏工委、警卫营、炮兵营走北路。

党中央为了安定出走亚东的达赖喇嘛及其主要官员，决定派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经香港，取道印度，直去亚东。7月16日，张经武代表在亚东向达赖喇嘛面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并向其讲述了中央承认其固有地位和协议精神，达赖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协议。

7月1日，是我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我军前指以实际行动庆祝这一光辉节日，从甘孜出发，开始了向拉萨进军。

张国华、谭冠三、刘振国和我率军前指与阿沛等人在向昌都进发途中，会见各界上层人士，宣传 17 条协议。途经昌都以东之达马拉、加皮拉时，我们与和谈代表团参观了 155、156、157 团筑路工程。代表团的官员们深有感触地说：西藏欢迎这样的军队。我们在和干部战士见面时，从他们的言谈表情中，看到了他们决心取胜所表现出来的军人特有的活力和勇气，使我们感受到部队在与大自然搏斗中，再现战争中我军战无不胜的精神风貌。

这一阶段的行动，使我亲身体验到高原行军和进行各种劳动，确实是一场与西藏特殊自然条件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战斗，它更需要勇敢、坚毅和忍耐。

7 月下旬，我进军部队自昌都地区分批开进。王其梅同志率领的先遣支队于 7 月 25 日自昌都出发，沿途克服重重困难，于 9 月 9 日进入拉萨，受到僧俗人民万人的热烈欢迎。然而，西藏当局在拉萨维持政务的司曹（为代理摄政王）鲁康娃，极端仇视协议，反对我军入藏，煽动少数人向我人员挑衅，制造事端，破坏协议，甚至企图以藏军向我动武。为了配合张经武、王其梅与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我进驻拉萨人员以极大忍耐精神，严守政策，同时令 154 团 3 营急进拉萨。由于我加强了兵力和后续部队陆续靠近拉萨；张经武、王其梅同志向上层人士耐心教育和严肃斗争；阿沛等爱国人士以亲身经历讲解 17 条协议精神，分裂分子才未敢动手。

我军前指出发前夕，胥光义同志于 8 月 18 日由重庆兼程来到昌都，向军领导传达党中央、西南军区对我军进

军和进到拉萨后各项工作的指示。他说军区领导指出：坚决贯彻执行协议是我军进军拉萨、立足西藏的政治基础。因此，要求部队必须深入反复学习，模范地执行协议和党的民族、宗教、外事政策，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真诚团结上层人士和西藏人民，促进藏族内部团结，并结合实际情况修订和充实进军守则，严守党纪、军纪，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人人争做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胥光义说，邓小平政委、李达副司令、张际春副政委，非常关心进军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他们说进军拉萨是十分艰苦的，深入进行政治教育，搞好内部团结是克服困难的重要条件。随后，我们与胥光义同志一同学习了中央和军区指示。

军前指于8月28日由昌都出发。这是一次极其艰苦的、历时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军需物资除有限的骡马驮运外，大部分由干部战士个人背运。为多带粮食，战士平均负重七八十斤，最多近百斤。进军途中，军前指和52师部队先后翻越了10多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涉过数十条冰水河。爬雪山是异常艰难的，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呼吸困难，胸闷头涨，每走一二十步就必须休息。我们在翻5900米的比如大雪山时，爬了1天，宿营山腰，已接近雪线。次日全天在冰峰雪地里行进。军领导同志的马匹全部给战士驮背包。谭冠三政委的马驮了1名重病号，我们几个人步行了6小时才到山垭口。谭冠三同志年纪较大，因严重缺氧，步履极为艰难，但他坚持爬到山顶。我们到达山口时，寒风卷着满天大雪，使人看不清道路，张

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我们司令部的参谋们顺着风势，人畜一起滑下了雪坡。下山后，我去帮助辎重连的同志们救护1匹滑入冰河的骡子，也被风雪卷进了冰河。翻越这座雪山，我们的代价是很大的，它夺走了6名战士的生命。进军拉萨最艰难的行军，是到达拉萨河谷之前。军前指翻越念青唐古拉山到达墨竹工卡，52师越过穷八站到达太昭段时，骡马已死亡2/3，随军运输的牦牛距本队尚远，后方补给一时又接济不上，干部战士体力急剧下降，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使许多同志脸上都脱了一层皮，疲劳、饥饿、高原不适应时刻威胁着人们，几乎每天都有战士、干部默默地长眠在行军途中。我们的部队毕竟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英雄部队，依靠各级党组织坚强的政治工作，依靠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团结互助，发扬吃大苦、耐大劳、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顽强跋涉3000里，胜利完成了进军任务。

10月26日，军前指进入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两万多人的隆重欢迎。进藏以来一直担任先遣任务的154团，在团长鄯晋武、政委杨军率领下，接受了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领导和阿沛、然巴、夏苏、绕克夏等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检阅，举行了入城式。

我们到拉萨的第3天，中共西藏工委、军党委与张经武代表一起遵照毛主席9月13日的指示，讨论了部队工作方针。毛主席指出：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购买则对藏民不好，故须实行

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毛主席还指示，为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开展工作，应改变明年不进驻日喀则和江孜的决定，要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上述各点，并在这些地方进行生产。我们根据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精神，首先分析了我军进入拉萨后的形势。认为协议签定之后，经中央代表和先遣支队过去一段的耐心工作，达赖与西藏地方政府先后发出拥护协议、庆祝国庆的电报，多数高级官员及贵族对我态度较过去有所好转。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分裂祖国、反对解放军入藏的态度尚未基本改变。而我军初到拉萨粮食补给则有接济不上的危险。故决定后方部队全力修筑康藏公路；前方部队以生产为长期的中心任务，战斗部队可适当分散就食的原则，军直及18军独立支队、154团3营驻拉萨；154团2营配以地方干部进驻江孜；154团1营、18军独立支队一部保护班禅进驻日喀则；52师师直、军炮营、155团1营驻太昭、则拉宗；155团主力驻沙丁宗至桑达本滚一线，开展统战工作，组织运输，维护交通线；亚东暂不去部队。11月底，西南军区批准后，我们按照上述计划调整了部署。

新疆向阿里派出的后续部队，由安志明率领于1951年5月底到达改则，与1950年8月29日到达的先遣连会合。先遣连在改则被风雪围困了200余天。他们与高原的恶劣环境进行英勇顽强的搏斗，住地窖，食猎物，烧草皮，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先后牺牲了38人。患病垂危的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同志，在与后续部队会合后几分钟即光荣牺牲。他们的事迹为我军谱写了一曲顽强不屈的凯

歌，为解放西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6月底该部进驻中尼边境重镇普兰。

范明率领的18军独立支队（西北西藏工委）与计晋美率领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先遣工作队，于8月22日由香日德分两批出发。沿途跨黄河，越巴颜喀喇山，于9月20日抵长江源头通天河畔，时值河水上涨，浪大流急，在试渡中牺牲4人，冲走150多匹骡马。他们不畏艰险，自制牛皮筏摆渡，历时半月，全部通过了通天河。10月下旬，该支队进至青藏交界、唐古拉山北麓时，为避免大雪封山、部队受阻于海拔5300米无人区的危险，全体人员忍受着严重的高山反应，每天行军10多个小时，奋战3天，穿过了决定这次进军成败的唐古拉山区。11月4日，该部进抵藏北重镇黑河，27日胜利到达拉萨郊区。我受西藏工委和军党委的委派，前往欢迎这支历时3个月跋涉4000里的英雄部队，并向他们介绍了拉萨情况，传达了中共西藏工委、军领导对该支队进入拉萨的有关指示。12月1日，该支队进入拉萨，受到了拉萨军民万人的热烈欢迎。接着，我们举行了会师大会。

14军126团主力，在团长高建兴的率领下，于9月12日自盐井之扎那出发，翻越横断山脉，攀高山、过险隘、跨藤桥、滑溜索，穿越瘴疠险区，战胜艰难险阻，于10月1日进驻察隅。

至此，我各路进军部队按中央计划，进驻西藏重要城镇，完成了战略展开，实现了将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誓言。

我军实行“慎重稳进”方针，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与群众影响工作，加强生产、建设，认真维护与贯彻 17 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政治形势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统治之后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团结、进步、发展，就成了我党我军和西藏人民共同奋斗的任务。

我军进驻拉萨，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不甘心其失败，鲁康娃狂妄地对张国华、王其梅说：过去满清入藏大臣也姓张，在拉萨设了一个衙门就行了，你们象他们那样就行了，何必来这么多军队。饿着肚子跑回去可比打败仗更难受啊！他们一面以离间政策严厉控制群众，利用民族、宗教旗帜，破坏民族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一面以困饿政策，控制粮食，提高物价，嫁祸我军，妄图进而撕毁协议，制造分裂，迫使我军不战而退。而我军初到拉萨，脚跟站的十分不稳，其根本原因是运输补给极其困难。因此，我党我军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而严峻的。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西藏特殊的社会形态，科学地分析了协议签订后西藏的内外形势，指示我军在西藏的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心任务是大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在统战工作中，“以争取达赖集团为主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和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分化和争取右派”为方针，本着有团结有斗争、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维护祖国统一，扩大爱国进步人士的阵营，争取将动摇于内向与外向之间的上层人士稳定下来和分化、争取亲帝分子和分裂分子，使其中多数与帝国主义割断政治上、经济上的依赖和联系，逐步地向爱国方面转化。通过团结教育上层，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同时，相应地进行影响群众工作，逐步实现协议，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创造条件，为我党我军站稳脚跟而奋斗。

为了加强党对西藏的统一领导，1951年12月19日，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委成员的调整方案。不久，中央通知张经武为工委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1952年2月10日，在与西藏上层人士充分协商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西藏军区。

西藏工委、军区遵照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要求所属部队及进藏人员严格遵守纪律，模范执行政策，厉行节约，紧缩开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以减轻人民负担。

我军广大指战员深知西藏反动分子的阴谋，对其各种挑衅活动，晓以大义，极力避免冲突，严守政策，使他们

的阴谋一次次被挫败。我军为争取主动，部队刚刚进入拉萨、日喀则、江孜、太昭，还没有消除几千里行军的疲劳，即以战斗姿态开始了冬季开荒。军前指及驻拉萨部队，12月初组织了70%以上人员，在谭冠三、慕生忠等领导同志亲自率领下赴拉萨西郊开荒。时值严冬，冬衣尚未下发，部队曾一度煮豌豆，喝粘粑稀糊，却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向荒原发起挑战，在缺少工具的条件下，有的连排分3班作业，昼夜垦荒。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是运肥。1952年春节刚过，驻拉萨机关部队全体出动，掏光了许多贵族家的厕所，同时，铲平了布达拉宫门前堆积如山的垃圾，形成了今日的拉萨广场。驻拉萨机关、部队经7个月的努力，开荒2000余亩，迎来了丰收。我军生产的实际行动，在藏族人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们看到了我军执行协议的决心和力量，看到了我军与西藏人民共同建设新西藏的美好前景。群众对我军生产粮食可以平稳物价感到十分满意，同时，垦荒的成绩也有力地鼓舞了部队长期建藏的热情和信心。

西藏工委、西藏军区遵照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在统一部署下分工负责，和噶厦政府官员和各地土司、头人交朋友，联络感情，团结了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然而，达赖集团的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惧怕17条协议的实行，他们于3月10日又以反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为借口，召开所谓“人民会议”，发动武装骚乱，指使藏军包围我中央人民政府代

表住宅，向张经武代表“请愿”，提出“解放军撤出西藏”等无理要求，并恫吓、袭击阿沛等爱国进步人士，性质十分严重。这是一场关系到祖国统一与分裂的重大政治原则的较量。

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首长对我军处境十分关怀，一天几次电报，连粮草、工事等情况都一一问到。毛主席为我平息这次伪“人民会议”事件制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指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十七条协议》，要把协议精神和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工委和军区遵照毛主席指示，高举反帝爱国旗帜，以坚持 17 条协议为原则，本着团结争取上层中的多数、促进反动营垒内部分化、利用反面教材教育群众的指导思想，对以鲁康娃为首的反动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其阴谋和反动面貌已经暴露于众时，达赖喇嘛在张经武代表表明我严正态度后，不得不撤销首要顽固分子鲁康娃、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当其主要分子已受到打击后，我们在工作上也做了适当调整，确定目前不改编藏军，不成立军分区，也不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照旧，把协议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以团结达赖集团中的多数，争取他们回到反帝爱国方面来。在这场斗争中，我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军区在工委的领导下，说服了个别同志的急躁情绪，本着后发制人、不打第一枪的方针，采取克制自己、避免冲突的原则，做了充分准备，制定防卫预案，调整了部署。拉萨发生骚乱的当天，155 团 1 营自隆子宗日夜兼程赶到拉萨，52 师率

155 团主力向拉萨以东、墨竹工卡以西一线机动。反动上层分子制造的长达 1 个多月的紧张局势，在我坚决斗争下终于缓和下来了。

此间，迎接班禅大师返藏，促进藏族内部团结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西藏解放实现民族内部大团结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促使达赖与班禅两集团重新和好，实际恢复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工委、军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由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王其梅等领导同志对达赖及其僧俗官员和班禅以及堪布厅的主要官员，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达赖喇嘛遂于 1951 年 9 月 19 日、11 月 4 日致电班禅大师，欢迎班禅返回西藏。班禅大师在中央安排下，于 1952 年 4 月顺利到达拉萨，同达赖喇嘛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初步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这是我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

工委、军区通过半年多维护、贯彻 17 条协议的实践，切身体会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西藏工作采取“慎重稳进”方针的正确。这是因为我们在西藏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尚不能改变，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议这两点一时也不会改变。因此，当时我们没有全部实行协议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议的群众基础和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我们当时只能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等好事，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再谈实行协议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根据毛主席“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的指示，其“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

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人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解决了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就有了物质基础，就剥夺了反动上层煽动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的借口，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坚强有力。为此，工委和军区于1952年5月经中央、西南局批准，军区前方部队进行整编。把驻太昭以西的人数紧缩为8000人。本着战斗部队基本不动的原则，撤销了52师师部，加强了各地区的工作力量。精简使我减少了供应，争取了主动，工作面扩大到全区，统战和影响群众工作向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这就象抗日战争我党以“精兵简政”渡过艰难的相持阶段一样，意义深远。

1952年，中央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在印度政府的合作下，由广东取道印度运送大米2500万斤到西藏，并协商开辟与印度通商贸易。工委、军区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1952年6月18日，我与罗家镛同志由拉萨出发，途经锡金首都甘托克，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我们与使领馆同志一道，在印度政府的合作下，经40多天的努力，完成了接运任务，并采购了一批油脂、布匹、药品、鞋等物资，以及种牛、种猪、种鸡和苹果树苗，初步打开了中印边境贸易。中央这一有力措施，大大缓解了供应紧张状况。

我军在西藏站稳脚跟，最根本的问题是加速康藏公路

的修筑。前指部队刚进入拉萨河谷，在补给困难、部队体力极度下降、发生了大量浮肿病的情况下，仍以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吃大苦、耐大劳、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精神，全力投入开荒生产和修筑康藏公路西段的紧张劳动。为了解决拉萨军民烧柴困难，平抑牛粪价格，增加内地与西藏贸易，加快康藏公路进程，我们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从全区各地动员 8000 名民工参加筑路。带领民工是一项政治任务。155 团在带领民工中，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把党和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带到广大群众中去。对线路上的宗教设施，选线时尽力避开，对不能避开的与僧俗官员协商移位重建。干部战士人人学习藏语文，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带头干最累最艰险的工程。医务人员跟班巡诊，两年医治病伤民工近 13000 人次，有 42 个小生命在医生精心护理下降生在工地。民工实行按劳计酬，战士亲自将工资发到民工手中，民工们流着泪领到一生中第 1 次工资，农奴们从此认识到劳动的价值和社会的公正。我军全心全意为藏胞服务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民工的爱戴，他们以深厚的感情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解放军，他们把共产党视为解放军，把解放军视为共产党，真诚地热爱与保护她。

1954 年康藏公路在后司的坚强领导下，战胜了最后一座高山——色齐拉山。10 月，前后方筑路大军会师于巴河桥头。联系西藏与内地的“金桥”架通了。筑路军民和当地群众纵情欢呼胜利。与此同时，青藏公路进展顺利，

10月到达当雄，正向羊八井石峡作最后的冲击。12月25日在拉萨举行了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

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分裂势力所奉行的离间与困饿政策彻底破产。实行17条协议的政治、物质基础有了巨大的增强。但是，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仍不甘心其失败，继续进行其所谓的“独立活动”。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从奴隶到主人的历史性进步，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大道。我们深信，一切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必败。西藏人民在维护祖国统一，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事业中，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张闻天传略

程中原

张闻天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从投身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50多年。他的光辉的一生，是以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农家学子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张家宅（今属上海市川沙县）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意，起名应皋，字闻天。

张家宅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紧贴着一道海堤“钦公塘”。塘东一片荡田，到东海边不过十几里。沿浦东运河西行60多里，就是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张闻天的童年是在一种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父亲张芹梅，以勤劳能干闻名乡里。张闻天是长子，从小跟随父母参加劳动，养成了勤勉、俭朴的习惯。双亲体贴入微的关怀爱抚，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繁富多变的自然景观，陶

冶了他温和自由、细致绵密的情致。张闻天生当世纪初新旧交替之际，时代风雷的激荡，欧风美雨的吹打，自然在潜移默化中给他以刺激和影响。

张闻天6岁发蒙，进设在“张氏宗祠”的私塾，聪颖好学。第2年（1907）私塾改名“养正小学”，开始接受新知。1912年8月1日，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成为肇建中华民国后该校的第一届学生。南汇“一高”是一所新式学堂，全部采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最新编辑出版的课本。学校教学认真，管理严格。教师中不乏新派人物。张闻天在全班年纪最小，功课出类拔萃。深思好学，讷于言而长于文，是他留给同学的突出印象。他有一弟三妹，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时大哥完全是一个读书人了。假日归来，独自在房里念书，还常常将房门反锁起来，不让弟妹打扰。过于用功的结果是眼睛开始近视。父母见他读书专心，不是农忙季节，也不再叫他下田干活了。

1915年夏，张闻天从南汇“一高”毕业。8月，就近考入设在宝山县吴淞炮台湾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他在这里学习了两年，由于身体不能适应海上捕捞作业，只得转学。1917年7月，他以“相当学历”的资格报考“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3天后，7月20日的《申报》上就登出上海考区录取名单，“张闻天”的名字赫然在目，于是成了“河海”正科第三届学生。

参 加 五 四 运 动

“河海”是张謇创议、黄炎培具体负责于1915年春在南京开办的。目的是为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培养中国自己的专门人才。在这里，张闻天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接触了欧美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受到了民主、自由的熏陶。特别是《新青年》杂志，对他思想的觉醒起了决定的作用。他在40年代初回顾个人经历时写道：“‘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于此开始。”^①“1917年在学校中看到《新青年》，我的思想即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②然而家中对他婚姻的包办和强制，却无情地摧残着他那觉醒了了的“自我”意识，在他心里激起了对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极端憎恶。

正在1918年2、3月张闻天最为苦闷的时候，十月革命的胜利愈益引起中国舆论的关注。张闻天深受“劳农革命”胜利的鼓舞，在黑暗中依稀见到了曙光。他开始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去探求改造中国的新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闻天立即投身南京学生运

① 引自张闻天1941年1月14日写的《洛甫自传》。

② 引自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动，成了“河海”最为活跃的几个学生之一。6月23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张闻天是它的编辑科科员、重要撰稿人。他在这份日刊上发表了不止政论、杂评和随感录，开始了最初的政治、社会活动。

张闻天最为引人注目的文章是《社会问题》^①。在这篇文章中，他紧紧围绕中国革命这个根本问题阐述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按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社会发展经历了四大变动。运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来“进窥”中国当代社会，张闻天认为，辛亥革命取得的进步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中国依旧退回到封建专制时代去了。出路何在？张闻天认为唯有“革命”：革命的目标是“铲除士大夫阶级”；革命的方式“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即发动革命的主力“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张闻天阐述的革命主张，显然是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又学习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而得到的。张闻天还论述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他指出，“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成功，“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这之后，“再进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文章相当具体地对比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以肯定的态度全文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突出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

张闻天此文发表于1919年8月，说明他也是中国早

^① 《社会问题》连载于1919年8月19、20、21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51、52号。其中51号迄今没有找到。

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张闻天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展现了他日后成为革命思想家、理论家的才华，是他革命一生的光辉起点。

选 定 社 会 主 义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大潮退落以后，张闻天经历了一段“向光明的地方摸索的时期”。1919年9月11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因“重组会务”而“暂停”。张闻天乃实行当时青年中流行的激进行动：脱离家庭，脱离学校，脱离婚姻，在工读主义思潮影响下，投考了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9月下旬被录取，从10月5日起，开始“日间习法语，夜间习工艺”的工读生活。但两个月后，张闻天离开了留法预备班。^①他认为现在还不是到法国去的时候，要将学问和事业“从根本上筑起”，必要时进社会这个“大研究室”之后，“方才到外国去”。他还说“要读社会主义，不能不读哲学心理学等”。因此，他与同学刘英士租了一间小屋潜心读起哲学来。

就在这时，一个刚诞生的进步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又吸引着他。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为信条。它的南京分会在1919年11月成立，

^① 据1919年12月12日《时事新报·学灯》载张闻天致张东荪信。以下引述均见此信。

张闻天的至友沈泽民就是会员之一。张闻天在12月由左舜生、黄仲苏介绍入会。1920年初，张闻天同沈泽民一道，住进上海华山路上空着的蔡锷住宅“松圃”，^①试验过工读生活。他们一面负责《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校对、出版事务，一面读书和著译。

张闻天在《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报刊上发表了评论、通信、散文、杂感和诗篇，视野开阔，意气恢宏，劳工问题、农村问题、文化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无不在他观照审视的范围之内。从对社会问题的许多真知灼见中，可以看出张闻天深沉的思考，不倦的探索，“向恶社会宣战”的勇气，改造中国的决心。

张闻天和沈泽民在“松圃”过工读生活不到半年，又感到很不满足了。这时，“少中”会友纷纷出国留学。张闻天同沈泽民相商，决定一起前往日本。1920年7月中旬，他们到东京进了一所日语学校，同时自学哲学及其它社会科学。^②在东京半年，张闻天结识了田汉、郑伯奇和康

^① 据恽震1980年2月4日复笔者信。恽震当时是南洋公学电机系学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常去“松圃”与张、沈晤谈。

^② 《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会员消息”载：“上海方面会员沈泽民张闻天两君，已于7月14日赴日留学”。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他们进的是一所私立的专教中国人学日文的学校。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说在东京“学习了一点日文，读了一些西洋哲学的书籍”。在茅盾的藏书中，有一本贴有“闻天存书”浮签的《English Literature: Modern》(《现代英国文学》)，上有用英、日、中文作的批注，当是此时的张闻天自学书籍之一。

白情等文学青年，他对文学的兴趣也从这里萌生。

1921年1月，张闻天同沈泽民又一道回到上海。3月，张闻天移居杭州里西湖边上的一个寺院里读书和写作。在近3个月的隐居生活中，他读了不少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人的作品，还研究“圣经”、“佛学”，几乎完全沉浸在对泛爱哲学的崇尚中，相信托尔斯泰“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无抵抗主义是实现“泛爱”的一种救世新术。6、7月间张闻天就发表了一些文章宣传这些思想。对于张闻天在这段时间内思想认识上的偏颇，沈雁冰、陈望道先后著文提出批评，提出无抵抗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到自由之路”就是俄罗斯人造下来的这一条。^①

就在张闻天因探求改造社会的途径而陷入烦闷的时候，1921年8月，他经左舜生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当了“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套丛书以选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美社会科学学术名著为宗旨。其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也在中华书局任职，对张闻天多有指点、鼓励。^②在“新文化丛书”社同坐一室工作的还有沈泽民和田汉。^③职业和环境，给张闻天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条件。经过对各种思潮的比较和鉴别，经过对马克思主

① 雁冰：《无抵抗主义与“爱”》，载1921年7月5日《民国日报·觉悟》。

② 据茅盾《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载198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

③ 田汉同“张闻天专案组”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63年1月29日）。

义学说的学习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到1922年初，张闻天思想上完全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了。他这样叙述“我个人思想的变迁”——

412
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而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底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这种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①中得到充分的阐发。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相当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学说来解释社会矛盾，并由此分析中国的乱源。他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乱源的根本办法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实行社会主义”，而且反对“照抄西洋镜”，认定中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1922年初对于中国乱源的分析 and 实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可以说是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

^① 此文完稿于1922年1月2日，连载于1922年1月5、6日《民国日报·觉悟》。上引文字见该文“篇末附白”。本段引文均见此文。

中的一次跃进。

赴美勤工俭学

不过，那时张闻天的志趣还在个人的文学爱好上。他的文学事业首先从译介外国文艺理论为发端。1921年春他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同年冬又译完了柏格森专论喜剧的《笑之研究》。^①1922年起，张闻天译介的重点从文艺理论转到著名作家作品。在《小说月刊》第13卷第2号“泰戈尔研究”专辑中，闻天的译作居半。4、5月间，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王尔德介绍》^②，对这位众说纷纭的新浪漫主义作家进行辩证的分析，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到8、9月间，《东方杂志》又发表张闻天为纪念歌德逝世90周年而作的长篇论文《哥德的浮士德》。这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一篇研究《浮士德》乃至歌德的论文。他有意将外国文学名著的介绍同中国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指出：“执着人生，充分地发展人生，我以为就是《浮士德》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启发读者冲破思想牢笼，为创造合理的人生而不倦奋斗。

张闻天在译介外国文学中显示的识见与才华受到社会的瞩目。远在美国的“少中”会友们在1922年5月底正好

^① 《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发表于1921年9月《小说月刊》号外“俄国文学研究”。《笑之研究》于1923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王尔德介绍》为张闻天与汪馥泉合作，其中第1—9段和13段为张闻天作。

同致公总堂签订了合办《大同报》(中文)并实行改革的合同。他们推定张闻天担任该报编辑，要他早日前往旧金山就职。张闻天乃于1922年8月20日从上海乘“南京号”轮赴美，9月中旬到达大洋彼岸。他主要利用设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图书馆进行自学，下午或晚饭后渡过金门海峡，赶到座落在旧金山委巴利街18号的《大同报》社上班。职务是从各种英文报纸选译并编排好“本埠新闻”在《大同晨报》上刊出。

在美国最初几个月的工读生活，使张闻天感到非常失望和颓丧。从他写给郁达夫和汪馥泉的两封信^①来看，几乎可以说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危机。是对当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使得张闻天的生活充实起来。到1923年春天，他摆脱了孤独、伤感、浮躁的心绪，离开《大同报》社，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文学翻译上面。短短八九个月，贡献了30多万字的译作。其中包括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盲音乐家》，安特列夫的四幕剧《狗的跳舞》，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名剧《琪 康陶》，黎巴嫩新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以及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西班牙作家倍那文德的剧本——描写爱情对于传统道德巨大冲击的《热情之花》和尖锐

^① 1922年11月11日复郁达夫信，载1923年2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月6日致汪馥泉信，载1923年2月20日《民国日报·觉悟》。

讽刺旧道德、旧习惯的《伪善者》。^①从这时写的“译序”、“评传”中可以看出闻天对国内反封建斗争的关注，觉察到他的情绪从抑郁低沉转而为乐观高昂了。在文艺论文《生命的跳跃》^②中，张闻天重又强调“人生的意义只在发展人生”，认为在为了一种理想贡献一切中间，“生命才达到最高潮”，呼唤青年朋友们“投到人生的急流中去奋斗吧！”

1923年初冬，张闻天决定回国。他眷恋祖国，“觉得在国外有点虚浮”，说“人家都厌恶中国，而我却不是这样。”^③1924年1月，张闻天重又踏上黄浦江畔这块养育他的故土。

“少年文学家”

张闻天回到上海后，继续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但他的兴趣已经集中到文学创作上去了。在4、5月间他完成了两部作品：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赢得了“少年文学家”的美名。

① 《盲音乐家》，1924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狗的跳舞》，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热情之花》，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7、8、12号，后与《伪善者》一起收入与沈雁冰合译的《倍那文德戏曲集》，1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琪琪康陶》，192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所译纪伯伦的散文诗载1923年10月28日《创造周报》第25期。

② 《生命的跳跃》载1923年9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

③ 引自张闻天1923年11月给弟弟健尔的信。该信内容录入健尔写的《落日》一文，载1923年12月2日《民国日报·觉悟》。

《旅途》从1924年5月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到12月登完并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是《小说月报》革新后连载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中国青年工程师钧凯先后同蕴青和美国女青年安娜、玛格莱恋爱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振作起来，继续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献身的历程。《旅途》可以说是“恋爱与革命”小说的滥觞。当时灵敏的文学家感受到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革命发展，把“人生究竟”的探究扩展到“社会革命”的领域，整个现代文学也由“人的文学”演变到更加政治化、社会化的“革命文学”。张闻天的《旅途》正充当了这种历史演变的“中介”。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构成《旅途》艺术上的显著特色。小说分为上、中、下三部，活动的主要空间从中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分别写出主人公人生旅途苦闷、振作和革命三个阶段。用这种三部曲的结构写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具有开创意义。

当《旅途》开始连载时，《青春的梦》也在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上发表，引起颇为强烈的反映。《旅途》中青年男女爱情的悲剧的命运，在充满青春理想的这个话剧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剧本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发动反抗运动，冲决封建罗网的故事，较为深广地揭露和批判了20年代初期中国的黑暗社会和封建家庭，为广大青年男女指出一条走向光明自由的道路。在艺术上，重在心灵震动的人物刻画，与之相适应的富有诗意的语言，愈演愈烈的戏剧冲突，使这个戏有着自己的特色。

可以说，张闻天 1924 年春的文学创作，是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文学的最初实践。他在创作中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青年生活历程的总结，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求，预示了他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只是由于他这时还倾心于个人的自由的文艺创作，所以暂时还没有参加党组织的强烈愿望。

“我要加入 CP!”

张闻天废寝忘食地埋头文学创作，势必影响正常的编辑业务。中华书局的主持者啧有烦言了。这时恰好有朋友邀他入川，张闻天乃应约前往。11 月起在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员。

在重庆，张闻天完全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姿态现身，利用学校讲坛和报刊，鼓吹“五四”精神，推动了重庆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斗争中，张闻天同党在四川的领导人萧楚女、杨闇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点燃起的革命火焰，引起了反动军阀和守旧势力的憎恨和恐惧。“萧楚女播弄风潮”、“张闻天提倡自由恋爱”，成为两个主要的攻击目标。他们集结力量，造谣诬蔑，迫使张闻天难以在二女师执教，乃于 1925 年 3 月应聘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

在顽固势力的攻击面前，张闻天没有丝毫动摇退却。他同进步学生一道，于 1925 年 3 月 30 日创办《南鸿》周刊，亲任主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南鸿》以杂感、

短评、散文诗、小说等活泼泼的新形式，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深刻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热情宣传以“人”的觉醒为中心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男女平等思想。张闻天用本名和笔名在《南鸿》上发表了十八、九篇文章，约占该刊全部篇幅的1/4。《南鸿》的战斗火焰简直把死气沉沉的重庆变成了一个造反的世界。这就引起了反动势力更大的忌恨。4月初，顽固守旧势力发动了一个诬蔑张闻天没有“人格”、鼓动学生予以“驱逐”的谣言攻势，妄想将张闻天赶走。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造谣激起了川师学生的强烈不满，酿成了“川师学潮”。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张闻天不避锋芒，用杂文作武器，揭露与回击对他的攻击。萧楚女、杨闇公则到处动员青年支持张闻天。斗争延续到5月中旬，反动军阀伸出了压迫的魔掌。重庆卫戍司令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封禁《南鸿》、《曙光》，并勒令张闻天、萧楚女等两周离渝^①。

经过这一场同恶势力的正面冲突，张闻天的思想取得了突飞猛进。他“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此时，张闻天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②

张闻天回到上海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张闻天立即

^① 据廖划平 1925年6月30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抄附的1925年5月28日“重庆卫戍司令部训令巴县知事文”中对事情经过的追述。廖后来叛变。

^② 张闻天《1943年延整风笔记》。

汇入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5月31日，在南京路上与友人郭绍棠不期而遇。郭问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张闻天脱口答道：“我要加入 CP！”郭绍棠当时是 CY。他立即将张闻天的这个心愿告诉沈泽民。^①沈泽民听到这个信息十分高兴，就同董亦湘一道介绍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时，张闻天创作了书信体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②。小说主人公长虹对他母亲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张闻天对党立下的誓言：

我亲爱的妈妈，你的长虹，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他将把那一点光明拿来，高举在无穷的黑暗中间。妈妈，他更将借你的精神上的帮助，自己变做光明，照澈这黑暗如漆的世界！

张闻天入党后，即以私立乐益女中教员的公开身份在苏州参加开辟党的工作。1925年9月，张闻天同侯绍裘、叶天底、徐诚美等一起建立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苏州，他以新文学家、留美归来的学者的公开面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0月2日中国济难会发表“发起宣言”，张闻天和于右任、杨杏佛、陈望道、恽代英、沈雁冰等同

^① 张、郭“五卅”运动中相遇于上海街头一事，据“文革”中专案组对张的《审讯笔录（10）》（1969年4月16日）。谈话内容等据访问郭绍棠谈话（1986年7月19日，北京）。郭绍棠，即 A. Г. 克雷莫夫，苏籍华人，1988年逝世，生前为苏联东方研究院顾问，教授。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② 载1925年6月《东方杂志》第22卷12号。

为主要发起人。正在这时，董亦湘来苏州巡视工作。他带来了一个消息：苏联上个月（9月）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现正招生。董亦湘问张闻天是否愿意去学习一个时期，张闻天欣然同意。不几天，就得到党组织派他前往学习的通知。1925年10月28日，张闻天登上了一条返回海参崴的苏联运煤船。同船赴苏的有100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生。

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

1925年11月下旬，“中大”首批学生到达莫斯科。办理入学手续以后，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个俄文化名，张闻天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伊思美洛夫”，学号42。他被编入英文班。同班的有沈泽民、吴亮平、朱务善、杨放之、李敬永（稍后到达）等。张闻天一面在英文班听苏联教员用英语授课，一面担任学校的英文翻译。4个月后，他就掌握了俄语，又任俄文翻译。除课堂上、大会上充当口译以外，还笔译学校的名种讲义和一些马列著作。

以张闻天原有的学识和名望，再加上他的勤奋、坦诚、谦和，很快就在同学中建立了威信。中大开设的各门课程他都学得很好。关于进校后学习情形，他在一份表格中写道：“对于学习，极感兴趣。各种功课都能引起我的注意。最初二年内，极努力一般政治经济知识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及俄国党内争论，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曾特别

用过功。”“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①1927年9月张闻天毕业留校，被分配在列宁主义教研组，先后教授“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在中大3年间，张闻天还先后担任过中大支部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宣传部委员、指导员、翻译委员会主席、《国际一周》编委会主席、班长等党内外职务。他以刘云的笔名同吴亮平合译了《法兰西内战》，还校订了李敬永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举行，会议期间他在城里专事“六大”文件的翻译。^②

为了给中国共产党造就高级理论人才，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于1928年9月选送几名中国同志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张闻天即为其中之一。旅莫青年称他和同时入院的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为“四大教授”。红色教授学院规定，学员都要担任一项党的工作。张闻天在该院历史系学习的同时，参加过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院的工作，经常任务是到东方部阅读中国报纸和中共文件，将重要者译成俄文或用俄文写成综合报告供共产国际领导参阅，参加过共产国际主席团及东方部的一些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同时，还到“劳大”担任一些教

^① 引文及下述任课、任职情况均据1928年填写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员班登记表》。这份表格及以下提到的在莫斯科期间填的表格均为苏联外交部1989年5月经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提供。

^② 访问郭绍棠谈话（1986年7月19日，北京）。

学工作（讲授“中国阶级斗争史”、担任工人班的指导员等），参加一些活动。^①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后，原来张闻天虽然很感兴趣，但“苦无时间”加以特别研究的“中国革命问题”现在成了研究的重点。他写出了一些有深度有见地的论文，论题涉及中国革命性质与动力、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富农问题、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等。当然，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尽符合中国实际，张闻天的论文也难免存在某些偏颇，例如，认为中国土地革命中应该加紧反对富农，就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旅莫期间，中国经历了从大革命胜利发展到遭致失败的重大反复，中共和联共党内斗争都很尖锐。张闻天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地参加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派、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他被选拔为中国共产党在宣传理论工作方面的领导干部。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组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分部编委会编委。在莫斯科5年的学习和工作为他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但同时又形成对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过分的信任与尊崇。所有这些，对他日后的革命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情况据张闻天1930年9月17日填写的《国际农业研究所登记表》（俄文）、《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和访问郭绍棠谈话（1986年7月19日，北京），“劳大”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简称。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中大”乃于1928年春改用此名。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

1931年1月，张闻天结束了5年旅莫生活，与杨尚昆一起回国，于2月17日（辛未年正月初一）到达上海。这时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已经以“反右倾”、“改造各级党的领导”为名向各地派出干部。沈泽民被派往“鄂豫皖”，他原来担任的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由张闻天接替。从3月2日起，张闻天即以党中央宣传部长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接着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编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周报》和《斗争》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在上海的两年间，他用“思美”、“洛甫”、“平江”、“歌特”等化名发表了100多篇文章。

1931年4月底至6月初，张闻天写了《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和《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①参加批判取消派的斗争。这是两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前者从政治上、策略上批判“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后者批判任曙、严灵峰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通过中国社会性质的学术论辩驳倒取消派政治策略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张闻天的文章论证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驳斥了取消派取

^① 分别载1931年5月11日《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和1931年8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

消土地革命的主张，捍卫了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论断，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机关迭遭破坏、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上海，张闻天不怕艰险，坚持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9月下旬成立，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常委。其时反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张闻天写了很多文章，及时地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发动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分析各国的态度，教育人们抛弃对“国际联盟”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注意研究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党尽量利用公开活动，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为中国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但是，张闻天同整个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对日本进攻的新形势下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缺乏认真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看不到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看不到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因而无法提出适合当时新形势的统一战线策略，而执行了“左”倾的路线和策略。张闻天所犯“左”倾错误首先在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斯大林一贯的观点，把中间派别看作最危险的敌人，采取揭露、打击的方针。这种错误，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仍未转变。张闻天的另一错误是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当前主要问题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指导思想，阐述和发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观点，批评以至打击党内对于“左”倾观点持不同意见的组织和同志。《满洲事变后各个反动派别

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以及《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①等文章集中表现了上述错误。

实践是最好的导师。一方面是在“左”倾路线下实际工作的不断受挫，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一方面是全国各阶层反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张闻天思考临时中央的那一套是否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反对“左”倾的思想，开始在张闻天的头脑中萌生和发展。在1932年10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目前形势”报告中，第一次将“左”倾作为一个突出的、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后，的确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易发生的。”他特别强调这次提出“左”倾问题“的确与过去提的是不同的”。^②会后，张闻天因住地被破坏而匿居“摩律斯新村”将近1个月。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两篇反对“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用“歌特”的化名在《斗争》上发表。张闻天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家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否认“第三

^① 这三篇文章分别载1931年11月《红旗周报附刊》1932年5月15日《红旗周报》第40期、1932年4月25日《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

^② 引自会议记录（藏中央档案馆）。由于记录者不可能逐句完整记录发言人的原话，引文则必须忠于记录，故难免有不够完整通达之处，请读者解读时研究。以下凡引述会上发言均据会议记录。为免辞费，不再一一作注。

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 和理论上的机械论 (认为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 指出影响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最大障碍物, 却是‘左’的关门主义”。他尖锐地批评了宣传鼓动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教条主义的“左”的毛病, 并概括其特点“就是‘党八股’ (又名‘十八套’)”。由此还涉及许多实际问题, 对思想方法、群众路线、党内斗争、白区工作等方面的“左”的倾向都表示程度不等的不满以至反对。这是一次可贵的突破, 虽然, 在总的路线和策略方面, 这时张闻天还没有摆脱“左”倾路线。

在 中 央 苏 区

1932年冬, 临时中央在上海再也无法继续立足了, 遂决定迁到刚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1933年1月中旬, 张闻天到达瑞金。没过几天, 博古、陈云等也陆续到达。随即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 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张闻天被推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博古是中央局书记。

1月下旬新的中共中央局刚一成立, 就面对着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央领导人以一种狂热的态度来领导粉碎四次“围剿”的斗争。在2月8日作出的决议中, 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借二十万担谷子”等显然过高过急的任务。为了推行“左”的政策, 发动

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张闻天参与了领导。3月下旬，又发动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在开始阶段也作报告、写文章。不过由于他的工作很快转向政府方面，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由中央局别的同志负责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得到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大约持续了半年光景。在此期间，张闻天在中央局常委内分工管理政府工作，着重研究解决根据地中涉及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张闻天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逐渐觉察错误，汲取教训，对不少“左”倾的具体表现，加以反对，有所纠正。在经济政策、劳动政策、政权建设、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比较正确的观点和比较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

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摆脱“左”的桎梏，这就不可避免地同迟迟没有觉悟的博古产生分歧。争论首先发生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张闻天与博古不同，认为“三条件”体现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①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主张也大相径庭。博古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工农民主专政

^① 引自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76页。

“无情斗争”的目标，主张对资本主义“系统限制”^①，张闻天则提出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的观点，主张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②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产生在福建事变前后。针对博古对于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写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③，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予以严肃的批评。在军事行动上，博古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完全相反：“主张积极配合”，明确“反对”红军西调而主张“东调”援助十九路军。^④在广昌战役失败后，1934年5月召开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博、洛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中“不该同敌人死拚”，说这种拚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过来指责洛甫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两人在会上争执起来，结果不欢而散。^⑤

① 见博古《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载1933年4月15日《斗争》第8期、6月25日《斗争》第16期。

② 见张闻天《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论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分别载《斗争》第10期（1933年4月1日）、第11期（5月10日）和第14期（6月5日）、15期（6月15日）。

③ 载1933年11月26日《斗争》第36期。

④ 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分别见《遵义会议文献》第37页、第76页。

⑤ 据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分别见《遵义会议文献》第77页、第111页。

张闻天在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接着举行的“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随着同博古分歧的发展，在实际上他受到了一些排挤。1934年6、7月间，派他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张闻天意识到，这是不让他与闻重大决策的一个由头，但他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党内矛盾促进了张闻天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搬到沙洲坝人民委员会工作，同毛泽东合作共事也增进了对毛泽东的了解，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样，张闻天反对“左”倾的思想逐步占了主导地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①等文章就是明显的标志。张闻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利。

在长征出发之前，张闻天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在9月29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同六届五中全会断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观点完全不同，张闻天清醒地指出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张闻天还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

^① 两文分别载1934年7月14日《斗争》第67期、9月7日《斗争》第71期。

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这篇社论实际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社论发表以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据这篇社论“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忆录《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这一切表明，张闻天踏上长征的途程时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反对“左”倾路线的一边。

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10日，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突围西征。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通过行军路上的交谈、讨论，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进一步理解，对李德、博古军事领导的错误认识更加清楚了。

11月底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12月初过了老山界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就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在12月12日通道会议上，李德、博古不顾变化了的于我不利的情况，仍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主张，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一起又一次就行军方向同博古等展开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毛、张、王提出、周恩来支持的战略方针。但在进

军途中，李德、博古仍不放弃错误的战略方针，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遂决定停止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和党与军队的许多领导同志一道，跟错误领导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他手里拿着一个提纲，侃侃而谈，旗帜鲜明而有系统地批评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张、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会上得到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

遵义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选为常委，委托洛甫起草决议，常委中再适当分工。1935年2月5日，在一渡赤水后向扎西（今威信）集中的途中，党中央到达水田寨附近一个村子，在这里常委讨论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就职以后，从2月5日当天到2月9日，在由水田寨到扎西的行军途中主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了军事问题，做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议；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特别重要的是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立即由张闻天在2月10日向中央军委纵队党员干部会作了传达。

《决议》通过反“围剿”战争中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战略战术的对比，论证了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并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还对实行战略转变与突围的过程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其间博古、李德的原则错误作了深刻的批评。《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决议》反映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所已达到的比较成熟的水平，是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自觉实现“转变”的标志。

张闻天担任党中央书记以后，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总指挥”，到撤销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重新建立的“三人军事小组”，直至5月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到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是有力的支持者。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合作，是毛泽东军事指挥顺利进行的可靠保证。

反对张国焘右倾军阀主义

长征是一次举世罕见的伟大而艰难的进军。毛泽东担负军事领导以后，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会理会议以后，又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天全芦山，于6月12日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围绕着“北上”还是“南下”、“西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同张国焘展开了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毛泽东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张闻天积极予以配合。在两河口会议前，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①一文，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原则，并针对张国焘的主张，不指名地批评“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战略方针作了思想准备。6月26日，两河口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举行，他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明确指出“北上”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西进”方针“是退守的，不适用的”，当前应“首先进攻或控制松潘”。6月28日即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然而张国焘对自己在会上赞成的攻打松潘计划却极力延宕。他还仗恃人多装备好，在“组织问题”上提出种种要求。为了团结北上，张闻天主动表

^① 载1935年6月24日《前进报》第1期。

示愿意让出党中央书记的职位。毛泽东从全局考虑以为不妥，后经芦花会议决定，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担任。张国焘这才勉强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张闻天协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上旬，在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和组织问题。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作了“报告”和“结论”，并起草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经沙窝会议讨论通过的这个决议，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1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和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创造了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

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两面派惯技，会上表面赞成沙窝会议《决议》，会后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为了克服张国焘新的阻挠，8月20日在毛儿盖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东（陕西）”发展的方针，反对“向西”。会后，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进入茫茫草地，行进5天，终于在月底胜利通过，到达四川、甘肃交界之班佑、巴西地区。尽管张国焘执迷不悟，反对北上东出方针，张闻天、毛泽东等还是宽容忍让，耐心等待。到达班

佑、巴西地区后，右路军即在这里进行休整，等候左路军到达。张国焘却坚持分裂党的错误和逃跑主义的南下方针。在滞留班佑、巴西地区后果难卜的情况下，张闻天同毛泽东、博古一起赶到三军团驻地，与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一、三军团组成陕甘支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9月10日凌晨2、3点钟立即行动。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危险处境，还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错误及行动方针。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实质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同时又指出“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9月20日左右，张闻天等到达甘南小镇哈达铺。在这里，从报纸上获悉陕北不仅有红军、游击队，而且有大块的苏区根据地。张闻天立即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①表示了前往那里落脚的意向。到达榜罗镇后，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作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定。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跋涉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到这里终于胜利完成。张闻天同红军指战员一起走过了这一艰难而

^① 载1935年9月28日《前进报》第3期。

光荣的历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瓦窑堡会议到西安事变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彭德怀等在前线指挥作战，张闻天先率领党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直罗镇战役给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革命有了落脚点，张闻天这才成了家。他同长征中接替邓小平担任过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结成终身伴侣。

1935年11月17日，张闻天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①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一些转变的环子，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上层社会与某些军阀）的策略，导致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就在这时，张浩到达瓦窑堡。1935年7、8月间他作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中途被派遣回国。一路走了3个月，终于寻找到了同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他向张闻天传达了国际“七大”关于转变策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当时毛泽东正在前线，凡策略转变中的重要问题，张闻天都同毛泽东函电商量，征得同意。在11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的报告，对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按照

^① 载1935年11月21日《斗争》第74期。

六大纲领，我们可以和国民党的队伍结成反日反蒋同盟”，提出“要反对主要敌人”，“坚决同关门主义作斗争”，就是“只反日不反蒋”“也可以”。12月6日张闻天又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纠正了“加紧反对富农”的“左”倾错误，提出在白区“联合富农”，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使其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11月底与12月初张闻天主持的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拉开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伟大策略转变的序幕。

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后，从12月17日起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12月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历史大变动的前夜，“决议”和“报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能够 and 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说明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的张闻天，跟随毛泽东，已经从过去革命的成败中汲取了教训，学会了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当时共产国际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

瓦窑堡会议以后，张闻天立即进行具体部署，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12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提议“为加紧北方的领导”，派刘少奇到天津任北方局中央代表。会前他先同刘少奇商量，得到刘同意。1936年4月，又派冯雪峰前往上海担任中央特派员。9月又派潘汉年重返上海。很长时间，白区工作一直由张闻天分管。他同胡服（刘少奇化名）、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小开（潘汉年）电报往还，频频不断，推动了全国青年学生与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张闻天非常重视并始终关注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工作。他协同毛泽东制定了联合东北军的方针，亲自指导过西北军工作委员会。^①他还首先建议指派一批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936年2月底，受托为南京方面送信的人员到达陕北，传递了与共产党商谈联合抗日的意向。张闻天同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复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点意见。从此开始，对这种断断续续的秘密交往，张闻天也一直关心和参与指导。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发动抗日，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决策，张闻天坚决支持。为表示东征决心不动摇，张闻天在1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常委提出：“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2月20日部队

^① 据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第102页。

过河东征，张闻天一直随军行进。途中得到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张闻天乃于3月下旬在晋西交口县至石楼县一带召开政治局会议。“晋西会议”持续一个星期左右。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论述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提出对国际“七大”决议，“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环境”；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朝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方向发展”。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和策略的转变以及东征的决策。5月初，中央决定结束东征，撤回河西，5日发出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这个口号集中体现了晋西会议决定的方针。

1936年8月8日，潘汉年到达延安，汇报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张闻天于8月10日召集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和8月15日“国际电报”（即“政治指示”）精神，他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8月25日发），直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下达了张闻天写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适时改变了“抗日反蒋”的口号。接着，9月15日至17日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确地估计了在新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

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及时地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这一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口号。

张闻天还同毛泽东、张浩等一起，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与耐心的教育。1936年6月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后又被迫同意北上。张闻天为促成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在1936年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最后发言。对会上的一些议论，如“以西安为抗日中心”、“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以至“除蒋”等等，用正面表示自己意见的方式，对这些根本性的方针表示了明白的反对。他认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对妥协派（按：指蒋嫡系势力）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经过会后6天的发展变化，党中央领导人的认识趋于一致。在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发言中赞同毛泽东关于和战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的主张，并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强调我党“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主张“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并对

“公审”蒋介石的宣言在会上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会议通过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两个文件《对西安事变通电》（公开）和《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党内）。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但回南京不久，即扣留张学良，派重兵进攻西安。内战又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危急关头，张闻天于1937年1月下旬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和彭德怀、杨尚昆、任弼时、王稼祥等多次紧急会商解决危机的对策。他们作出的决策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同，被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后终因2月2日发生枪杀王以哲的不幸事件而失却了“三位一体”（指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局面。

张闻天返回延安，正值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他即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并表示在确定五项国策的前提下中共作出相应的四项保证。此后，国共两党即重开合作抗日的谈判。

历史证明，在从瓦窑堡会议到西安事变的伟大策略转变中，张闻天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为党和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跨 入 新 阶 段

1937年3月，张闻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说明它已基本上结束了动摇，开始转向抗日；

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由停止内战进到准备实际抗战的新阶段；完成巩固和平、准备抗战任务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国共合作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争取领导权。在4月发表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①中将这个新阶段的任务概括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指明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5月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指出为了完成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红军必须成为模范的抗日军，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的核心理”，强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接着，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讨论中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6月6日，张闻天根据6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同他1936年10月18日写的小册子《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②精神是一贯的。在国共两党走向合作之际，总结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方针。张闻天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清算了过去10年来在策略上所犯的关门主义和冒险

① 载1937年4月24日《解放》周刊第1期。

② 见《张闻天选集》。

主义错误。这次会议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明确了新阶段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正确地决定了具体工作的转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张闻天于8月9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政治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发展将从局部的应战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目前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失败主义，并提出实现全国抗战的“八条纲领”。在“结论”中他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成为“十大纲领”。可以说这是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草案。在8月22日至8月25日于洛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发言并作关于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和“结论”。他赞同毛泽东报告中阐述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重要思想。同时，在3次讲话中都论及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发言”中他指出“抗日是持久战，即部分妥协发生仍是持久战”。在“补充报告”中张闻天对“持久战”作了论述。他说：“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不因失败而丧气。”“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退守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坚苦斗争的过程”，其间“可能发生挫折、失败、妥协、叛变的事件”，“战争的坚持就是有许多困难在其中。”并指出，“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必然取得领导权。”张闻天的这些论断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赞赏。毛泽东发言作了阐发，并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概括为“用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洛

川会议的民主讨论中，不难看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最初构想。太原失陷后不久，张闻天即著文指出，山西“开始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呼吁“将政府的军队的抗战彻底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提出“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的战略任务。^①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他抹煞国共两党的原则分歧，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张闻天虽然一时没有看透王明鼓吹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右倾实质，在会上承认过去有某些错误，但仍然明确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的统一战线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王明在“结论”中批评他没有指出中心问题是“对国共合作了解不够”。在1938年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就清醒地强调，在国共合作中“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要与国民党合作，但也必须时时保持戒心”，同时也要“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和扩大”。王明到武汉后，张闻天配合毛泽东在中央内部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届六中全会。

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组织报告”。同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相呼应，组织报告强调了同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强调战区、敌后的工作，

^① 《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载1937年11月27日《解放》周刊第25期。

强调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他还特别提出“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运用各国经验要适合中国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在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纠正了王明的右倾路线。

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

在王明回国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决定党中央领导机构和人员分工进行调整。张闻天是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之一。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空气。”诚如毛泽东所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①张闻天根据上述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在六中全会时，即首先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②张闻天虽然没有把书记一职让掉，但会后即主动地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转到毛泽东住处开，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毛泽东定夺。不过，一段时间内会议仍然由张

^① 王震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中转述在延安时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见《回忆张闻天》第13页。

^② 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闻天主持。实际上，六中全会前后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了。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37年12月起）、干部教育部部长（1939年2月起）和两部合并后的宣传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解放》周刊主编（1937年5月起）、《共产党人》编辑（1939年2月起）、马列学院院长（1938年4月起）、中央研究院院长（1941年7月起）等职，领导理论宣传、干部教育和文化工作多年，建树良多。

他主编《解放》和《共产党人》，亲自执笔撰写了大量论文，阐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讲演《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和《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等一组论思想品德修养和党性锻炼的文章，使延安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时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同志深受教益。他还亲自指导和组织力量，于1941年初出版了一种兼用英、俄、法三种文字的油印刊物《中国通讯》，以开展国际宣传。

他领导筹办马列学院并兼任院长，这是党在延安创建的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学员一部分是前方和机关的干部，大部分是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党员。按照由浅入深、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教学内容少而精的原则，头几个月学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中国近代革命史、党的建设，后几个月是政治经济学、西方近代革命史和哲学。张闻天常主持星期六下午的课堂问答，使所学内容融会贯通。他亲自约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朱德、陈云等同志来院作报告。从前方或大后方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也都被邀讲演。3年间，马列学院共办了8个班，学员5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一直活跃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或理论宣传战线上。确如李先念所说，这所学校“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作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一批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干部”。^①1940年2月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的《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办理党校的目的是“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教习的目标是“求得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要发扬民主学风，并提倡自习为主、循序渐进的方法，就是张闻天在对马列学院办学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

他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编译、基础教程的编写和重要读物的编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亲自兼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主持编译出版《马恩丛书》（10册）和《列宁选集》（20卷）。扩大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他讲授和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8年正式大量出版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各种干部学校都使用它。在张闻天倡导下，延安出版了《抗战中的中国丛刊》、《西北丛书》、《文化教育丛书》等知识读物。为了让参加革命队伍的现代中国青年从鲁迅作品中得到宝贵的教益，张闻天还提出并指导刘雪苇选编出版了《鲁迅论文选集》和

^① 引自李先念给马列学院建校50周年纪念会的信。李先念是该校第一班学员。

《鲁迅小说选集》。

在指导文化工作方面，张闻天作过不少报告，起草过不少政策文件。他是首先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他主张“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①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历史经验和分析文化人特点的基础上，张闻天提出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正确处理党同文化人和文化团体的意见，促进了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总之，张闻天“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②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整 风 前 后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号召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8月，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报告，表示要彻底清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提出“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

① 引文分别见《张闻天选集》第241、250、290页。

② 引自邓小平《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现在要补课”，主动要求下乡。在得到中央同意后，他亲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团长，于1942年1月26日，奔赴抗日前线的晋西北根据地，以向群众学习的谦虚精神和从实际中求真知的科学态度进行农村调查。他本人持续调查了一年零两个月，至1943年3月3日奉命回延安。

在调查研究中，张闻天住在农村，不仅亲自主持调查会，而且挨家逐户同农民、干部促膝交谈，同各种人物谈话。他一丝不苟地记录下素材、数据，他和调查团成员收集、核算了各种历史帐薄，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经过分析和综合，张闻天亲自或指导其他同志写出了19篇调查报告。可惜现在找到的只有3件（20万字），其余的都在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销毁了。

调查团2月到达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张闻天亲自在当地最大的自然村贺家川调查，其他同志分别到另外几个自然村调查，各自整理出调查材料，然后由张闻天亲手写成《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调查报告以充分的数据精细地记录并透辟地分析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各种具体因素及其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认为“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其前提是“充分发展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力”。并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治应该是“发展他们的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政治”。1942年4月中旬至兴县，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碧村附近的村庄调查，张闻天亲自调查了碧村和任家湾。写成《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提出“以后土地问题的解决，除继续采取‘迫’、‘挖’的方法外，

还应采取‘拉’的方法，即转变其生产方式的方法。这就是提倡资本主义式的经营，使地主（部分的富农）分散使用土地的吃租子的经营，转为集中使用土地的雇工经营。”9月到陕北米脂县，张闻天在杨家沟调查了马姓地主集团，完成了一份地主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它以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中国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结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农民进行三位一体的残酷剥削，从而更猛烈、更大规模地兼并土地。象这样典型细致的同类性质的调查和报告，在我国是少见的。

1942年12月至1943年初，张闻天带领调查团在米脂、兴县、绥德等城镇，作了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可惜因赶回延安而未及整理。

回到延安以后，张闻天写了《出发归来记》，向中央报告1年多调查研究的体会。他严肃地剖析自己的学风，论证“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并阐述了“着重典型”、“分析与综合”的原则及调查工作的方法。《出发归来记》表明张闻天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他思想上、理论上完全成熟的标志。

张闻天于3月初中断调查赶回延安，是为了参加三月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张闻天离开中央书记处，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10月，张闻天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高级干部的

整风运动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学习讨论。通过学习和反省，于1943年12月写出了长篇笔记，叙述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无情地解剖自己，系统地深刻地批判过去犯过的“左”倾路线错误，对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和与此相关的同志，都负责地说明自己的看法，评价其功过是非。张闻天写好后，首先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立即到张闻天的窑洞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①

1944年5月起，张闻天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他参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工作，为“历史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整风和两条路线学习的产物，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反复修改的“决议”稿本上，留下了不少张闻天的手迹。

与此同时，张闻天又兼任中央政治材料室主任，主编党内《参考资料》。他比较系统地调查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亲自撰写了《最近美国对华动向》、《十二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动态》等9篇详尽的评论文章，为党中央和党内高级干部提供对于国内外形势与动向的分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1945年4月至6月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作了发言，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的分析，沉痛地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在“七

^① 访问刘英谈话（1985年10月22日）。

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创建合江根据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经中央批准后于10月下旬离开延安，11月26日到达北满分局所在地哈尔滨。

在陈云主持下，张闻天参与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于29日和30日用陈、高（岗）、洛（甫）名义电致东北局并中央。对有不同认识的关于东北工作方针问题提出建议，认为我党独占东北的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不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三大城市，而要在东北广大城乡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在长期战争中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后夺取东北全局的优势。对这一建议，党中央很快复电“完全同意”。

东北局决定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北满分局委员。12月中旬赴佳木斯途中，因土匪叛乱在林口受阻，张闻天等遂折回牡丹江。他化名张平之，以北满分局代表的名义，到宁安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在短短四五个月时间里，领导了反奸清算、清剿土匪、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等工作，为把宁安县建设成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张闻天从实践中了解了东北的情况，取得了在东北建设根据地的初步经验。

1946年5月中旬，张闻天到达佳木斯就任合江省委

书记。通过调查研究，他提出全省工作应是“一个中心，三项任务”，即以发动群众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完成剿匪、生产、支前的任务。^①他要求抛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

剿匪斗争是建立合江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合江境内的土匪都是接受了国民党委任的政治顽匪。在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形势下，张闻天指出，对土匪采取收编加委的办法是错误的，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反磨擦的“打拉政策”也是错误的。我们的剿匪方针应是消灭不是争取，是“杀头”不是“洗脸”。在战术上，他主张以穷追堵击相配合，采用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战术”，实行以毙俘匪首、消灭股匪为目标的歼灭战。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执行了张闻天制定的清剿方针与战术，亲自率领部队在林海雪原中战斗，前后不到5个月，基本上把土匪消灭了。

土改是建设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在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张闻天深入实际，亲自蹲点，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发动群众，稳健地掌握政策，使合江土改避免了“左”右摇摆。1946年冬，他在桦川县会龙山村蹲点，发现“反奸清算”不彻底，假分地、瞒黑地、转移浮财等各处都有。他向陈云汇报以后，即提出重新广泛发动群众，煮熟“夹生饭”，消灭“半生不熟”地区的任务。全国土地会议以后，1947年冬曾刮起一股“扫堂子”风。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挖出来分掉。合江有些干部责

^① 张闻天 1946年6月20日在中共合江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问省委为何不发动“扫堂子”，甚至埋怨省委“右倾”。张闻天坚决顶住了这一“左”的做法。这时又有部分地区发生平分中农财产、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张闻天知道后连夜采取措施，坚决制止了侵犯中农的做法。在农民发动起来平分地主土地与浮财的同时，他们还要到城镇挖浮财和平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张闻天得悉后，立即召开城乡干部会议，指出进城“挖浮财”的做法是同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相违背的，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前线与满足农民本身的需要都是不利的。统一认识后，省委发布了张闻天起草的《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指示，严禁农民随便进城抓人、捕人和起浮财。在张闻天正确领导下，合江土改于1948年春基本结束。张闻天又及时提出从平分土地运动转入生产运动。

张闻天在领导合江工作的复杂斗争中，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无私无畏地坚持真理的崇高品德。仅仅两年时间，就把一个政治混乱、土匪猖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东北的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以人力、物力、财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张闻天在领导剿匪、土改、生产等工作中从实际出发规定的正确政策，多次得到党中央和东北局的肯定评价和赞扬。

探讨经济建设方针

1948年5月，张闻天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1948年春张闻天就提出地方党的工作重心应转

移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上来，要将生产、支前作为两大中心环节来抓。他思考的重点已经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了。他到哈尔滨就任新职以后，在7月18日各县组织、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为国家经济（或叫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合作经济，指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合作化方向。8月31日张闻天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应由农村转向城市，分析了城市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提出党在城市工作中的政治路线是：依靠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联合中、小资本家，反对和打倒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①

在上述报告与总结的基础上，张闻天在9月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②指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份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提纲》具体分析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阐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对各种经

^① 收入《张闻天选集》，题为《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

^② 该文已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两段引文见该书第396页、第416页。

济应该采取的政策，并提出东北经济建设中的阶级路线：“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个《提纲》立即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不久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纲》中的思想被吸收到毛泽东的报告和会议的文件中去。

1948年12月，张闻天改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了对各种经济成分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对正确执行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新的依据。1949年5月到安东（今丹东）担任辽东省委书记后，也主持起草了有关经济建设方针和做法的一些决定。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7月，他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and 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等问题，向党中央和东北局写了4个文件，^①对东北经济工作中的各种矛盾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政策建议。如：发展合作社的道路，应该是从供销到生产，通过供销合作发展到生产合作；合作社应为群众服务和盈利，股金应该分红；农村生产合作必须坚持自愿两利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反对“千篇一律、到处硬搬硬套”和急性病；应该允许少数新富

^① 这4个文件都收入了《张闻天选集》。

农的存在和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农村党员应该为合作化事业奋斗，不能当新富农；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方面，应该根据实际出现的偏差，及时克服右的或“左”的偏向，等等。

对于张闻天的创见和他所支持的新生事物，党中央大多是赞同的。但对某些具体做法意见也不尽一致，如供销社实行盈利分红，有的同志就不以为然，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一直争论到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当面表态支持张闻天的意见，才告终了。

实践证明，张闻天起草的《提纲》以及后来写的一系列有关文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贡献。

在外交战线上

1950年1月，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首席代表，遂离开安东赴北京。后因美国等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未能及时恢复，中央乃改派张闻天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于1951年4月到任。1955年1月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协助先后兼任部长的周恩来和陈毅主持部务，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免职。张闻天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整整10年。他坚决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处理外交事务，参加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坚持不懈地研究国际问题，扎扎实实

地进行组织建设与业务建设，是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外交工作杰出的推进者。

张闻天就任驻苏大使后，即进行思想整顿，建立政治学习制度，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在此基础上，大胆改进使馆工作，进行组织建设与业务建设，使整个使馆井然有序。他提出研究驻在国情况和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一项根本任务，立即建立研究室，写出很多有价值的书面报告，开了大使馆设研究室和大使亲自领导调研工作的先河，使大使馆真正发挥党和国家耳目的作用。驻苏使馆的建设走上正轨后，他又受命巡视我国驻东欧六国的使馆，推动了它们的工作。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根据中央当时方针，在对苏联关系方面掌握得比较好。中苏经济贸易关系和科技合作关系有很大发展。为了完成 156 项基建项目的谈判，他费尽了心血。他还建议在使馆设留学生的管理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生活、学习管理^①。

张闻天回国主持部务以后，作了一个“加强调查研究，提高业务水平”^②的报告，号召全体干部钻研业务，加强形势和政策研究，以便更好地执行中央的对外政策。外交部加强了专管形势政策调查研究的机构，各有关司也相继设立了综合小组。他经常主持或参与主持外交部的形势讨论会、“务虚会”，倡议实行形势通报制度，倡议出版

^① 据曾涌泉《外交工作的杰出改进者和领导者》，见《回忆张闻天》第 251—252 页。

^② 这个报告的部分内容以《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

交流调研成果的内刊和促进学术交流的杂志，使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馆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为了推动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他筹建了国际关系研究所，筹办了外交学院，还同有关部门商量，恢复和加强了世界知识出版社。他原来计划创办一座国际关系的专业图书馆，可惜没有如愿。

以理论家而为外交家的张闻天，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唯上，不唯书，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独立思考，勇于发表科学的创见和新颖的建议。他既注重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动向的研究，又很重视对国际关系和外国人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在战后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独立运动与民族主义国家问题和我国外交方针与风格等方面，张闻天用力尤多，成果卓著，形成了他那富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他的不少见解为中央赞许和采纳，许多论断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所证实。如：1951年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大家所想的是怎样把美帝赶出朝鲜，而张闻天却已看出有通过和谈走向停战的新的苗头。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张闻天认为局部战争的可能仍然存在，而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和平共处成为国际上总的趋势，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得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对于民族主义国家，张闻天指出，战后的事实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和国家独立后“仍然保持着领导地位”，取得独立的国家除少数例外，一般也只能实行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民族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民族主义国家我们应予支持，不能要求人家也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的

事搞好，决不能搞输出革命。^①在外交工作实践中，他主张驻外使馆要以各国政府为主要工作对象，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提倡和坚持勤俭办外交的原则，等等。1956年3月，张闻天为提供外交使节会议讨论写了一个文件《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②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经验总结为12条，全面、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得到会议的肯定，至今仍是指导外交工作的重要文献。

庐山蒙冤

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虽然身在外交战线，但对国内工作一直是非常关心的。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张闻天从这年9月就看到问题和缺点不少，并深为忧虑。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从11月郑州会议开始纠正某些“左”的错误，张闻天是竭诚拥护的。然而他还力图从指导方针和根本理论上寻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从东北到西南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对当时“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深刻原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① 据曾涌泉《外交工作的杰出改进者和领导者》、何方《张闻天同志和研究工作》，均收入《回忆张闻天》。

^② 见《张闻天选集》。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尖锐、明快地揭露了大跃进以来的主要问题。16日，毛泽东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张闻天以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精神，辞谢一些同志的好心劝告，坚持犯颜直谏，7月21日下午在华东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①

张闻天的发言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详细分析了比例失调、“共产风”、强迫命令、虚报浮夸、下放过多、体制紊乱等缺点的严重后果，指出了“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发言”尤其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探究原因，从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民主与集中等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指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上存在的偏差。张闻天在“发言”开始后即点出，“比例失调”一条可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一条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在“发言”中，张闻天从理论高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批评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夸大主观能动性而不考虑客观条件，只讲政治挂帅而忽视和违反经济规律，急于“过渡”和平均主义导致否定集体所有制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并进而指出，造成

^① 这篇发言已以《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

种种问题而又长期不得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为此，他认为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张闻天在发言的最后，还无所畏惧地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在当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的全面、深刻、科学的理论总结，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一时期正确思想的最高水平。可是，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却因为这篇发言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他被指责是同彭德怀“文武合璧”进行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下庐山回到北京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逼交代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这时虽然还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特 约 研 究 员

经过再三请求，到1960年11月，张闻天才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没有任何职权的“特约研究员”。但他还是十分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依然竭忠尽智，克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以后，正是“反右倾、鼓干劲”遭致失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的时期。张闻天在1961年至1962年间，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还把目光投向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物价问题上。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在香山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会，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和用“读书笔记”的名义写的论文，并到苏、沪、浙、湘三省一市作两个月调查，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深化和发展了庐山发言的思想。

针对当时思想、理论上的种种错误观点和糊涂认识，张闻天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精辟见解。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有独立经济形态的阶段，不能跳跃，它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不同的小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统一”，把它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发展生产

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在相当长时期内，生产关系不能不断改变，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或看做僵化不变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按劳分配是自觉劳动的分配原则，它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和平均主义的有力武器；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先公后私，公私两利”；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剩余产品和产值，没有盈利，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价值不但反映生产关系的阶级性，而且也反映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化生产所必要的，社会主义生产中必须利用价值规律，要算“经济帐”，不能靠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或单纯的政治考虑；^①等等。这些观点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1962年7月上报党中央的关于集市贸易的调研报告，是张闻天对流通问题的理论研究同具体经济政策相结合的产物。他主张在市场和物价问题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建议对集市贸易放宽政策，扩大范围，允许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允许集市贸易超出本地区范围同其它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允许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按市

^① 以上概述据《张闻天选集》选收的《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要点》等文和《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所载张闻天的《读孙冶方同志的〈论价值〉》。

场价格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油棉）的权利，国家的工业品除配给者外，也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可惜的是，这份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工农联盟的报告根本没有得到重视，后来还被诬蔑为“复辟修正主义的黑纲领”而受到批判。

在1962年7月至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张闻天，进一步受到打击，被取消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一切党内文件的权利，被进行专案审查。张闻天同党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绝，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他没有就此消极遁世，还是认真进行学习与研究。他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每隔两个月左右，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思想。不时还给他们寄去研究国内、国际问题的文稿，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类文稿，到“文革”之前，先后共有11篇，计30万字。但都象一箭之入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在“文革”风暴中

早在1964年秋社教运动中，张闻天就被指责为同经济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搞利别尔曼那一套修正主义经济理论。进入1965年，新上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对张闻天采取种种限制，先是吊销供应卡，接着撤掉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很快波及张闻天。8月9日，

在经济所第一次被揪斗，当场昏厥。从此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岁月。他无数次地被批斗，被审问，在1967年1月至11月间，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等累计达219起之多。^①不论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他总是负责地据实回答，决不乱说，从不谄过于人。他给“批判陈云联络站”写的材料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②江青等妄图利用所谓“伍豪启事”反周总理。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造反派：“‘启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③

在许许多多被“勒令”交代的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所谓“61人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陷害刘少奇，诬指刘少奇1936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成所谓“叛徒集团”。事实上此事曾经党中央讨论同意，指示这些干部采用非常办法迅速出狱，领导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这个涉及这么多领导同志的大问题，张闻天一开始就不推诿，不含糊，忠于事实，忠于历史，说明此事刘少奇请示过中央，是经他（代表党中央）批准的。为慎重起见，他将1967年2月

① 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交的《接待总结》，见他的《文革记事本》。

② 张闻天1967年3月20日写的材料。

③ 写于1967年11月20日。录自张闻天的《文革记事本（二）》。

16日写就的材料即送康生，要他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康生是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的。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报告华北工作时曾谈及此事，讨论时康生就此事发了言，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但是，这时他故意不给答复。于是张闻天在2月18日另写了一份材料交出，略去第一份材料上所说“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情节，由他个人独自承担全部责任。材料肯定刘少奇为此事请示过中央，而“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保护了刘少奇和61个同志。为避免涉及中央，他又特别说明“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到如此地步，中外历史上也属罕见。嗣后涉及此案，张闻天始终肯定此事是经他同意的。对此，康生憎恨之极。他在张闻天4月28日给他的信上竟批道：“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6月27日又派中办专案组干部审讯张闻天，指责“61人案”被张闻天“把水搅浑了”，威胁他要“替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不得为刘少奇开脱，并责令张闻天：“写交代材料”“澄清事实真相”；以后不准造成新的混乱。^①在这千钧压力面前，张闻天凛然不动，于7月3日致信康生，表示他已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唯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

^① 张闻天1967年7月3日给康生的信。

见，张闻天真正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之气！

1968年5月16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夫妇实行“监护”。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糊得严严实实，门上开一个小方孔，警卫日夜窥望监视。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家人来往。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每天放风一次，时间错开，始终不让两人碰面。这种暗无天日的独身牢房生活一直持续了523天。张闻天已年近古稀，老而病，身心两受其害，然而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表现了高尚的人格，纯净的党性。

遣 送 肇 庆

1969年10月20日，在武装监护、隔离审查近一年半后，才以当时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为由，将张闻天夫妇遣送广东肇庆。他们于10月底到达，居住在肇庆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大院内半山坡上的一座小平房里。张闻天不准用本名，只好化名张普，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离开宿舍区要经批准，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求同意后才能看。军分区保卫科每月向上汇报其思想、言行。不过，张闻天觉得比在京被隔离的生活毕竟自由得多，现在可以看书、读报、听广播了，有时也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山下西江大堤上漫

步。

这时，张闻天因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视力只有 0.2 了，高血压等疾病又折磨着他，但他的心并没有衰老。他依然忧国忧民，思索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探求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他的十多本读书笔记本和 13 篇文稿合订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他就从头开始，重新读书写卡片，并将它们按专题一迭迭分装在纸袋里，有些连贯起来就是一篇理论文章。他读报特别仔细，关心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从这一事件中洞察到“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从 10 月中旬起，他即动笔写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到 1974 年 5 月，写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4 篇文稿，^①约近 10 万字。在这些文稿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总结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错误理论，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阶级关系、党与国家的关系、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和公私关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

^① 《张闻天选集》从这 4 篇文稿中选收了以下各篇：《人民群众是主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

义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肇庆文稿”中有许多精辟的议论，显示了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坚定和勇敢。如，张闻天指出，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出发，从它的阶级关系出发”，将政治路线和策略“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政治路线“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规律来判决”。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斥责林彪、江青之流说，“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踏成画饼充饥的魔术。”再如，他指出，如果上层领导者“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如果表现出这种骄傲自满的态度，那是不能真正发扬民主的”，他又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短期内所能完全实现的”，最主要的主观原因之一“在于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这些议论，不用说包含着对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作风和当时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的批评。张闻天在“肇庆文稿”中对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虽然文稿中也难免留有当时社会思想折射的痕迹，但瑕不掩瑜，“肇庆文稿”作为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主义论纲依然是光彩夺目的。它是张闻天在十年浩劫中用他的忠贞与睿智构筑的一座理论丰碑。

1974年初春，张闻天、刘英获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进行社会调查。张闻天很珍惜久被剥夺的深入实际的权利，立即到工厂参观调查。他几乎走遍了肇庆当时的各主要工厂。也只是到这时，他才有机会游览肇庆著名的风景区七星岩。张闻天的心中又升起了希望。他让从上海来探望的外甥马文奇秘密誊抄所写文稿，准备将来出书或到会上讲讲。他接连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到北京住，恐不合适”。要求回上海，也不同意。直到1975年6月，才得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

屈死江南

1975年8月25日，张闻天抵达太湖边的城市无锡。9月1日，住进汤巷45号。他除了沿用“张普”的化名以外，多了一个代号——45号。

张闻天还没有等把家安好，就开始伏案写作。9月7日，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文稿校阅、改定，接着又修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他改得非常认真。全稿约有1/4经过修改，删改重写的有9页之多，还增补了2页。文稿首页右上角标明改定日期：16/9/1975。其时，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的写于1962—1966年的13篇文稿合订本刚刚发还，他又逐篇校订，一一标上写作日期和序号。

进入深秋季节，江南天气冷热多变，衰老多病的张闻

天适应不了。11月初冠心病发，接着又因感冒引起肺水肿，住院20多天才好转。出院后即移居新生路7号招待所。这时，邓小平复出后经整顿出现的转机又被逆转。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政治风暴在张闻天心里激起层层波澜，从2月起，房颤、心绞痛、急性肺水肿频频发作，病情益趋重笃，4月23日、5月22日竟两次出现“急性左心衰竭”、心室停搏等险情。^①4月下旬病重时，张闻天对坐在床前的夫人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并要刘英当场写下字据。^②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张闻天清晨听完新闻节目，喝了几口米汤，就闭目静卧休息。下午精神稍好，翻阅一份外文资料，看到介绍一种新式轮椅，可以方便老弱病人活动，很感兴趣。他想搞一张。还风趣地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可是，不到1小时后，就因心脏病猝发而离开了人间。

张闻天逝世一个星期以后，上面有关部门才电话答复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无锡，在《新华日

^① 据“张普病历”，江苏省委组织部向中央组织部作的历次“张普同志病情报告”。

^② 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回忆张闻天》第343页。张闻天逝世后，刘英即将张的储蓄4万元连同利息196.6元作为党费上交。

报》发一消息。7月9日向遗体告别，花圈上仍用“张普”或“老张”。直到7月13日才在《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登出北京方面拟定的张闻天逝世消息。全文78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

“四人帮”对张闻天的冷酷，无损于张闻天的光辉。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①在张闻天逝世后不到100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悼词最后号召向张闻天学习：“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

^① 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回忆张闻天》第341页。

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张闻天的革命一生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公正评价。

陈翰笙事略

吴友文 田野

(一)

陈翰笙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现已 93 岁。1985 年 9 月 28 日，首都学术界举行座谈会，庆祝他学术工作 60 周年时，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

陈翰笙 1897 年 2 月 5 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是个秀才，后来在满清军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在贵阳创办了陆军小学，以后到湖南兵备处工作。因此陈翰笙幼年时即离开无锡，后进入长沙明德中学。

1911 年春北京清华中学招考，陈翰笙前去应试，不料这次是招考赴美留学生，当时他程度不够，没有被录取。1911 年 8 月回湘继续在明德中学攻读。明德中学历史教员傅熊湘，字君剑，为南社诗人，他是日本留学生、同盟会会员，他讲课对陈翰笙有很深的影响。有一次，当傅老师在课堂讲课，批评曾国藩效忠满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激昂慷慨，陈翰笙在课桌上画了一个曾国藩像，头上加上一把刀。原来

明德中学是黄兴、宋教仁等创办的，辛亥革命后不久，黄兴曾到该校去讲演，陈翰笙听了受到很大鼓舞。

1914年陈翰笙去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听美国人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听到中国进口的美国金山橙是由美国接种专家波办克用四川的种子经过长期的选育而产生的。陈翰笙听后很兴奋，他想到美国去跟波办克学习，希望回国后自己接种，如果成功，就不必进口金山橙了。

1915年他得到母亲的积极支持，母亲把自己的首饰当了，为他筹办了两千元路费，陈翰笙便由长沙经过上海自费去美国留学。第一年读预备学校，第二年考进帕莫纳(POMONA)大学勤工俭学。最初学植物学，因为他视力不好，用显微镜看细胞看不清，适应不了植物分类的学习，就改学地质学。学地质学要进行野外考察，他所画的图往往有错误。1918年夏天，他看学理科不行。那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听到后思想上产生很大震动，他想中国也要革命。1919年他想学外国历史，特别是俄国历史，因此就选读俄文、德文。1920年夏在帕莫纳大学毕业后，到芝加哥大学读了一年，得硕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又学了一年俄文。1921年冬他到哈佛大学读俄文和俄国历史。这一年他和顾淑型结婚。顾淑型的父亲顾栋臣，字枚良，是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后裔，他是个秀才。1909年满清两江总督端方到无锡访问东林书院遗迹，找顾宪成、高攀龙的后代，找到了顾栋臣。正好这时湖南籍的军机大臣瞿洪机要为他儿子聘请家庭教师，端方就推举了顾栋臣。陈翰笙在北京到清华中学应考时，住在

他姨父（陆定一的父亲）家，姨父曾说：清华中学招考看试卷的顾栋臣是个数学家，他在北京创办“译学馆”（后改名为“京师大学”，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顾栋臣曾帮助张伯苓创办南开中学。

陈翰笙和顾淑型认识是经焦墨筠（女）介绍的。焦墨筠 1916 年也在帕莫纳大学学习，比陈翰笙高一班。1919 年夏天，她在加利福尼亚夏季学校碰见陈翰笙，要他一起到码头去迎接一个朋友，一见面知道她叫顾淑型，原来她就是顾栋臣的女儿。他们用无锡话交谈，一见如故，1921 年他们就结婚了。1922 年他俩一起去德国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那时，马克贬值，他们带去的是美金，以每月 5 美元的房租租了一所房子，1922—1924 年研究东欧各国历史。两年以后陈翰笙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这时，蔡元培在德国，他请陈翰笙去北大讲课。1924 年 4 月，陈翰笙在北大任历史系教授，讲世界历史、美国宪法史、欧美史学史三门课。顾淑型任艺文中学教务长。^①

（二）

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陈翰笙的北大同事李大钊常跟他谈话。当时蓬勃发展的五卅运动震动了他。李大钊派他到上海去策划租界里的印度巡捕罢工。当时准备开

^① 艺文中学是个进步学校，教员和学生中有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该校改名为北京市二十八中，顾淑型曾被全国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

支 30 万作为策动罢工的费用。但经过调查联系，两月罢工开支起码要 70 万，费用不够，未曾成功。

回北京后，经过于树德、李大钊的介绍，陈翰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陈翰笙和于树德是在新中学会认识的。于树德是共产党员，当时做新中学会的工作。新中学会在海外很有影响，当时日本分会由周恩来领导；陈翰笙 1921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参加美国分会，那时美国分会由高仁山领导。

陈翰笙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党支部设在东城翠花胡同，经常和他来往的是李大钊。

1926 年 3 月 18 日游行示威，李大钊和陈翰笙都去了。军警向示威群众开枪，李大钊头部和双手受伤，群众背着他走出东门。事后陈翰笙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说明真象。那时他同从德国回来的朱家骅教授手举大旗，领导了游行队伍，抗议吴佩孚的卖国政府。北大教授中当时分两派，胡适、高仁山、蒋梦麟是从美国回来的，为美国派，李石曾、朱家骅、顾孟余是欧洲派，两派间有矛盾。陈翰笙和这两派都熟悉，这样他和国民党人来往很多。后来同陈公博、唐有壬也很熟悉。

1925 年孙中山来北京，后因肝癌发作，病逝于北京。那时为孙中山准备的房子有个大厅，陈翰笙常常在那里和国民党人共进午餐，因此他认识了顾孟余、陈公博、邹鲁等人，他们也以为陈翰笙是国民党员。朱家骅也不知道陈翰笙和李大钊的关系。一次游行示威，反对段祺瑞、吴佩孚，陈翰笙与朱家骅手拿大旗游行回来，朱家骅对陈翰笙说：我们赶快去把面粉分了。面粉是苏联太平洋劳工

协会捐助给中国工人的。朱家骅说：分了它，免得共产党来分。由于陈翰笙与朱家骅、陈公博、顾孟余认识，国民党的事情，他知道一些。

1926年李大钊介绍陈翰笙与苏联大使加拉罕会面，那位大使要陈翰笙为第三国际工作，陈翰笙同意了。随后他就和文化参赞坎托洛维奇经常联系，为第三国际办的刊物《国际通讯》供稿。他写稿用英文，前后共写了54篇，都是关于中国问题的。

陈翰笙有个好朋友高仁山，他俩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同学，高仁山回国后担任北大教育系副主任，并和陈翰笙、于树德、查良钊一起在北京办了艺文中学。以后高仁山，住在外交部街46号。李大钊被捕后的第3天高仁山也被捕了，随后北大女学生张挹兰（湖南人）也被捕了。环境恶劣，陈翰笙随时有被株连的危险，必须立即迁移住处。开始他搬到小牌坊胡同暂住。他在北大的学生王寅生，认识一个进步的日本朋友铃江言一，便托他想办法。铃江言一就介绍陈翰笙认识另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中江丑吉当时是替日本人办的奉天时报写社论的，曹汝霖为了拉拢日本人，把他在北京的一所房子让给中江丑吉居住。中江丑吉就让陈翰笙住到那所房子里。几天以后，陈翰笙决定先到日本，再从那里去苏联。于是他和顾淑型一起去天津，中江送他们到火车站。到天津后他们住在一个小客栈，登记说是到上海去。当时去日本不用护照，他们就买船票去神户。驻神户的中国领事是顾淑型的亲戚，给他们办了去苏联的护照。他们由敦贺（TSURUGA）到伯力，

由那里坐火车去莫斯科。他们走后不久，1927年4月李大钊和张挹兰被绞死了。1928年1月18日高仁山也在天桥被张作霖枪杀。

(三)

在离开北京以前，陈翰笙曾和塔斯社主任明欣商谈过他想去苏联研究农民问题。明欣建议他到莫斯科去找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所长沃斯尼亚钦斯基。沃斯尼亚钦斯基是立陶宛人，身躯魁梧，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翰笙和他见面后，他立即同意他们的要求，并介绍他们见会计员斯大林夫人阿利卢伊娃，说他们的生活费以后向她领。陈翰笙还被介绍认识所里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员马扎尔及布哈林的父亲，几年以后，布哈林就被枪毙了。1927—1928年正值苏联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初去找不着住所，布哈林的父亲也没有想到办法。后来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女和顾淑型认识，她把乡间的两间房子借给陈翰笙夫妇居住。这房子原是她们夏季用的，但既无地板，也无家具，陈翰笙用草垫起来做床铺。陈翰笙想研究农民问题是和蔡和森一次长谈的结果。1926年初，蔡和森到北京，住在城外一个很远的地方，他派地下党员胡鄂公去找陈翰笙，让他到他住所长谈了一夜。蔡和森谈了广东海丰陆丰的农民运动，说农民问题很重要，是一个根本问题，劝陈翰笙注意研究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翻身问题，要着重研究历史和现状。蔡和森的话对他有很大的鼓舞。因此，陈

翰笙一到苏联就要求研究农民问题。

研究员马扎尔是匈牙利人，他和陈翰笙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为中国从北宋以来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陈翰笙不同意他的观点。陈翰笙说：北宋时期流通全国的商品，主要是烟草和蚕丝。那不过是商业资本在发展，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为此辩论过好几次各不相让。当时农民运动研究所几个人都喜欢辩论，但都只是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不以事实为根据。一次一个年轻人和陈翰笙辩论，遭到陈翰笙的反驳，到了理屈词穷的时候，他就问陈翰笙：“你读过《资本论》没有？你们中国人是不懂得中国历史的。”陈翰笙很不满意他们的这种教条主义学风。到了第二年即1928年的夏天，他就和顾淑型取道日本回上海了。

那时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想让陈翰笙到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研究所的副所长王世杰婉言拒绝，他对陈翰笙不放心，怕他可能是共产党员。蔡元培就介绍陈翰笙到商务印书馆王云五那里审阅大百科全书的稿子。第二年王世杰到南京法制局当局长，蔡元培让陈翰笙去当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自己兼所长。

陈翰笙想趁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机会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聘请北大历史系学生王寅生为助理研究员。开始，他们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棉纺织厂中进行包身工制度的调查。调查报告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陈翰笙知道后，迅速转变方向，改做农村经济调查。

陈翰笙当时认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够彻底

地了解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这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也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中国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的设计。”随后，他就和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石凯福（现名石樵）、钱俊瑞、秦柳方等人选定先从无锡、保定、潍县、凤阳的门台子等地进行农村调查。

1929年7月至9月陈翰笙和王寅生组织了一个45人的调查团到无锡农村调查。为了做好思想准备，他们还组织大家学习《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通过3个月的调查，从无锡农村1204家农户中获取了大量可贵资料和数据。随后他们用了1年多的时间，把调查从长江流域推向冀中平原以及黄河和珠江流域共24个县，还对另外56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信调查。其中，对广东农村的调查是这样进行的：

1933年10月间，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的介绍，陈翰笙在南京见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理事长孙科和总干事马超俊，他们聘请陈翰笙任该馆特约研究员，陈翰笙就向他们提出了到广东农村调查的计划。当年11月开始用中山文化教育馆、岭南大学名义在广东进行调查。宋庆龄听到他们要到广东做农村调查的消息以后，就向陈翰笙建议从中山县开始，她还写了介绍信让陈翰笙去见中山县模范县长唐绍仪。这个办法果然生效。中山县开了头，后来到梅县、潮安、惠阳、顺德、台山、高要、广宁、英德、翁源、曲江、乐昌、茂名、廉江、合浦、灵山

各县也就毫无障碍了。他们还在番禺县的 10 个代表村做 1209 户的挨户调查。调查结果于 1934 年 9 月写成《广东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陈翰笙作了序言，1934 年出版，后来曾有两种日译本。这次调查团员中有王寅生、孙勉之（即孙冶方）。薛西林（即薛暮桥）带领广西师范学院学生对广西农村做了调查，并写了调查报告。

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他们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王寅生、孙晓村、千家驹、李紫翔等人写出一篇又一篇论据充足的论文，同托派就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问题展开论战。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压迫之下，农民日益破产，国民经济没有发展可能，除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外，没有别的出路。

1933 年陈翰笙和吴觉农、孙晓村、张稼夫、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被推举为研究会的理事长。第二年出版了研究会的理论刊物《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编。抗战期间在南昌、武汉、长沙出版战时特刊，仍由薛暮桥主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员达 500 多人，成为我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研究团体。

(四)

30 年代陈翰笙在上海担任三项工作。首先是搞农村

调查，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已如上述。其次，继续为第三国际工作，他和史沫特莱、佐尔格、尾奇秀实等人联系。此外，他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邓演达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做斗争。

史沫特莱是1929年在上海和陈翰笙认识的。她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她常常向陈翰笙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情况，由于陈翰笙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有交往，因此能告诉她一些情况，1929年还让她到无锡参加农村调查。她为德国报馆写的稿件，也常常给陈翰笙看过。由于她的报道揭露了国民党阴暗腐朽、内部矛盾重重等事实，使国民党很生气，后来胡适、丁文江通过德国领事馆控告史沫特莱，因而使《法兰克福报》不得不停止史沫特莱的记者工作。

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陈翰笙认识了第三国际的佐尔格。佐尔格是苏联优秀侦察员，他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德语、俄语、英语都很熟练。但他在上海和日本东京时期，从来不说俄语。一次，他和陈翰笙约好要会见孙冶方，陈翰笙让他和孙冶方在自己的住处见面了，孙冶方冒昧地用俄语问好，他装做没听懂，并从此不愿和孙冶方见面。佐尔格在东京假装纳粹党人，得到德国大使的信任，聘请他当顾问，住进德国大使馆。他利用自己搞的秘密电台，直接发报给斯大林，报告了1941年希特勒军队进攻苏联的预定时间，并侦察了日本准备南进，关东军不会出兵西伯利亚等重要情报。1941年他与满铁会社尾

奇秀实一起活动，被日本特务发觉；两人同时被捕，并在1944年一同被绞死。后来苏联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并为他树立了铜像。

佐尔格不让人家知道他和陈翰笙认识，他和陈翰笙联系是通过尾奇秀实。1932年1月，他让尾奇秀实送信给陈翰笙，要陈翰笙陪他一起去西安。他从上海出发，陈翰笙从南京出发，约定在徐州车站候车室见面，陈翰笙手持打字机，他拿一本书做记号，见面后一起坐火车到潼关，由潼关再去西安。他们一起去拜访了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第二天南汉宸请他们两人吃午饭。过了5天，他们准备回来，潼关发现瘟疫，火车不通。佐尔格找到在西北军队工作的一个德国人驾飞机送他们两人到洛阳。到洛阳后佐尔格回上海，陈翰笙乘火车到太原，转赴五台山去看冯玉祥。陈翰笙见冯玉祥是通过查良钊的关系。查良钊是国民党员，曾和陈翰笙在北京一起创办艺文中学。他介绍陈翰笙和冯玉祥、李德全认识，陈翰笙在那里呆了1周以后回到上海，他在五台山发现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

1933年6月18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被暗杀，傅斯年继任总干事，他对陈翰笙不放心，终于说服蔡元培把社会科学研究所由上海劳利育路迁至南京鸡鸣寺。陈翰笙在中央研究院无人支持，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他就向蔡元培提出辞职，蔡比较谅解，给予他通讯研究员名义。1933年11月陈翰笙组织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合作，在广东开始进行农村调查。1934年2月陈翰笙感到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多大希

望，于是向中山文化教育馆取得特约研究员名义，加上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的名义，去日本东京东方文库研究中国经济史。他请茶叶专家吴觉农在他离开上海时代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的职务。1934年春陈翰笙和顾淑型在东京租了一处房子住下，常到东方文库去看书研究。去东京前，佐尔格与陈翰笙约定，他也去东京，要陈翰笙通过尾奇秀实，专与满铁株式会社的地下共产党人来往。尾奇秀实在上海满铁株式会社研究所工作，陈翰笙从他那里认识了许多满铁株式会社的年轻朋友。此外，有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也与陈翰笙有联系。

一次，陈翰笙和一个在上海的外国朋友约定1935年4月某日在东京百货商场见面，可是到了那天，不见他来。陈翰笙不放心，就由神户乘船回上海想找史沫特莱了解一下情况。他在船上看到英文《字林西报》，无意中发现一条惊人的消息，说有个不明国籍的西人在上海被捕，他身上查出有三个护照，他看了大吃一惊，原来这个被捕的西人就是和他约定要在东京见面的。一到上海陈翰笙就和大公报的胡政之一起到新雅饭店去，在那里要了个房间，挂上牌子，甩掉了后面跟踪的特务，然后到霞飞坊去看史沫特莱，她见着他就大声喊叫：“天大的幸运，你来了”。从这时起就不让他再出门。到了晚上，史沫特莱送他到路易·艾黎（Louis Alley）那里。艾黎那时是工部局工厂视察员，见了面，艾黎让陈翰笙同他工部局的同事英国工程师钱普林（Chambllen）住在一起，那里只有两个单身汉，很少有人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可算是最安全的地方

了。第2天史沫特莱和陈翰笙商量，让陈翰笙以前在北大的学生王寅生去东京把顾淑型接回上海，安排她住到工部局一个德国工程师哈姆布尔格（Hamburg）夫妇寓所里。10天以后，史沫特莱就为陈翰笙夫妇准备好了去苏联的护照。他们乘的是艘苏联轮船，停在上海海关附近。艾黎送陈翰笙上船，哈姆布尔格夫人送顾淑型上船。上船后他俩被锁在船长办公室旁边的厕所里，两小时后，船开出吴淞口以后，才把他们放出来。到海参威后第三国际两人来迎接，送他们到莫斯科。不几天，十月革命节来临，陈翰笙夫妇被邀到红场观礼，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斯大林。

陈翰笙被安排到东方劳动大学讲课，住在客栈里。

1935年纽约太平洋国际学会（总部设在纽约，在美、英、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法国都有分会）要办英文季刊《太平洋事务》，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任编辑，还要找一个助理编辑。总干事卡特为拉拢苏联分会，就要苏联方面介绍一个人到纽约去帮忙。苏联分会答复：他们抽不出人，但前年太平洋学会在加拿大开会时，他们认识中国代表陈翰笙，说此人可以担任这项工作。卡特接受了这个意见。一天，第三国际的人找到陈翰笙告诉他这件事，并说你在第三国际的任务结束了，现在介绍你回中国党去。于是陈翰笙就去见中国派驻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康生对陈翰笙说：太平洋学会要你给拉铁摩尔帮忙，担任《太平洋事务》的助理编辑，你要以中国代表的名义前去，不要说你是从苏联去的。又说：太平洋学会总干事卡特在巴黎，你到巴黎去找

他。康生还让吴克坚和陈翰笙一起去巴黎，吴克坚是到巴黎去帮助吴玉章办救国日报的。

在离开莫斯科前，潘汉年到旅馆去看陈翰笙，他说：“以后有什么事，通过你和宋庆龄联系，好在你们在上海早已熟悉。”

陈翰笙到巴黎后，知道卡特那批人在伦敦，他就赶去伦敦。在那里见到卡特和拉铁摩尔，便和他们一起乘船去美国，同行的除顾淑型外还有爱尔塞·丘茉莉和卡特的秘书。1936年5月29日到达纽约。

1936—1939年陈翰笙在太平洋学会帮助拉铁摩尔编辑《太平洋事务》英文季刊。在此期间认识了冀朝鼎和他的好多朋友。康生曾嘱咐让陈翰笙帮助饶漱石在纽约创办《华侨日报》，故陈翰笙常在此报上用笔名写文章。

1937年2月陈翰笙应邀到加拿大中部与西部5个城市作公开演讲，详细解释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同年夏季又被帕莫纳大学邀请，在夏令营学校讲授中国政治6个星期。陈翰笙利用这个机会尽量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真象。

(五)

1932年12月宋庆龄在上海和鲁迅、蔡元培、邓演达、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邓演达和陈翰笙是朋友，经常一起讨论教育改革问题，他对陈翰笙了解，常在宋庆龄那里谈到陈翰笙。因此，陈翰笙也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开会时，大家推举宋庆龄为主席，杨杏佛任秘

书长。民权保障同盟有时要护送难友脱险或送交信件，这些事情常常交给陈翰笙。1931年6月15日，太平洋区域劳工局秘书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第三国际请了一位瑞士律师来上海为牛兰夫妇辩护，陈翰笙曾几次把宋庆龄的信件送交那位律师。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一人送信，后面往往跟一人，以便了解是否发生意外情况。邓演达被捕，蔡元培以民权保障同盟名义给陈诚写信营救。他知道陈翰笙和邓演达是朋友，就派陈翰笙去南京。陈翰笙拿着这封信，找了彭学沛引见，当面将这封信交给了陈诚。

陈翰笙是1927年冬和宋庆龄认识的。那时陈翰笙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宋庆龄和陈友仁从比利时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回到莫斯科暂住几天，陈翰笙的朋友邓演达告诉他这个消息，并和他一起到红场附近苏维埃旅馆去拜访宋庆龄。宋庆龄平易近人，对同志流露着革命热情，给陈翰笙以很深印象。30年代陈翰笙回到上海后，和顾淑型一起去莫里哀路宋庆龄住所去看她，从此，就逐渐熟悉起来。宋庆龄曾让陈翰笙帮助几个共产党员秘密离开上海。那时宋庆龄对宋美龄帮助蒋介石政府很反感，同时宋美龄对她姐姐也故意疏远。有一次宋美龄从南京写信给宋庆龄是秘书代写的，宋庆龄拿给陈翰笙看，可见她们姐妹之间由于政见不同是多么隔阂。

1939年4月，宋庆龄带信给陈翰笙要他去香港。陈翰笙和顾淑型离开纽约，路过菲律宾呆了一个星期，看了看朋友，5月底到达香港。宋庆龄和她的秘书梁淑德到码头去迎接他们。一天，廖承志来看陈翰笙，并说：潘汉年

要来看他。陈翰笙感到潘汉年的关系太多，怕因此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因此他就对廖承志说：“潘汉年工作很忙，不必来见我，以后就通过你联系好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国际朋友和海外侨胞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纷纷捐助款项和医药器材。在宋庆龄的赞助下，外国朋友艾黎、斯诺以及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等组织了一个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来担任执行秘书。通过这个委员会接收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捐款，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在香港接受了海外捐款两千万美元，由廖承志的亲戚（姓邓）通过有关银行分派到内地，汇到延安的款项是由李富春签收的。

那时，胡愈之由重庆来到香港，为了加强国际宣传，他向陈翰笙建议创办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陈翰笙接受了胡的建议，主办这个半月刊，并把所写稿子按期交给新华社印发国外各地。这个刊物是最早向国外报道皖南事变的，陈翰笙把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伏击新四军的真象公之于世，动员全世界舆论起来申斥国民党这一破坏团结抗日的事件。后来叶挺被释路过香港去重庆的时候，由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孙冶方介绍，见到了陈翰笙，叶挺对陈翰笙当面表示感谢。

在香港时期宋庆龄和陈翰笙不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国民党为此曾派驻重庆英国大使到香港，劝宋庆龄离开香港去重庆，遭到宋庆龄的拒绝。邓小平同志 1981 年 6 月 3 日在宋庆龄同志

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曾提到此事说：“国民政府为此曾通过外国势力向宋庆龄同志施加压力，遭到宋庆龄和在座的陈翰笙同志的驳斥。”宋庆龄一直坚持斗争，直到香港沦陷前夕才坐最后一趟飞往重庆的飞机离开香港。

(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8日香港沦陷，一个多月后陈翰笙和顾淑型扮作难民乘船从香港到江门，转赴桂林。在中共华南局直接领导下他和李亚群一起做桂系的统战工作。那时李济深是国民党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主持那方面的工作。在桂林陈翰笙见到了林砺儒，他邀请陈翰笙到桂林师范学院去担任西文系主任并讲课。陈翰笙还同张锡昌、简竹坚一起编《工合月刊》，并帮助顾淑型办了一个妇女手工业合作社。他还抽出时间到江西赣县、福建漳州等地联系，不辞辛劳，为工合奔忙。

廖承志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陈翰笙利用和外国记者谈话的机会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经过外国记者的传播，舆论纷纷指责国民党，为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廖承志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廖承志终于释放了，何香凝画了一幅腊梅赠给陈翰笙，表示感谢。

1943年11月，陈翰笙和杨刚在桂林举办十月革命纪念会，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44年重庆军委下通缉令，把陈翰笙列入黑名单。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倾向革命，他接到这个密令以后，派陈此生通知陈翰笙说

重庆军委会下通缉令，名单里有陈翰笙，叫他赶快跑。

陈翰笙和顾淑型先到广西全州暂避，同时托顾淑型的姐夫孙树珊帮助办去印度的护照。孙树珊是重庆交通部参事，护照上用的都是假名字。《工合月刊》的简竹坚给了陈翰笙 600 美元，作为他们去印度的旅费。

陈翰笙初到桂林时曾和英国人拉关系。英军服务处赖德上校 (Connel Rustle Ride) 要他介绍一个懂日文的人为他们工作，他就介绍了中共党员孙亚明。他还认识美国驻桂林的副领事查理斯·塞维斯 (Charls Service)，他是陈翰笙在美国帕莫纳大学的先后同学，他要陈翰笙介绍一个中文秘书，陈翰笙便介绍了中共党员杨承芳。

因此，陈翰笙夫妇秘密离开桂林，曾得到英美人士的同情援助。英军服务处赖德上校让他们的军车带陈翰笙夫妇到昆明。在昆明，英国领事馆派军用飞机送他们夫妇到加尔各答。赖德上校还和印度英国新闻部远东局联系好，让陈翰笙夫妇到印度后在那里工作。

陈翰笙、顾淑型在加尔各答不到一星期，就去新德里工作，不久认识了德里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来希 (Curashi) 教授，他邀请陈翰笙在德里大学历史系任入学考试评卷员。陈翰笙还加入了印度历史学会，两次出席他们的年会，并有机会游历了印度许多地方。他还在新德里认识了印度历史学家潘尼迦，此人后任印度第一任驻华大使。

1945 年 9 月至 11 月，陈翰笙在印度做了农村调查，并访问了印共学者，如南方的南布迪里巴德 (E.M.S.Nomboodiripad)、孟加拉的安必加·高士

(Ambia Ghosh) 和戈帕尔·哈达 (Gopal Haldar)，他们给陈翰笙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陈翰笙还仔细阅读了1927—1928年出版的“皇家印度农业调查团证词” (Evidences Taken by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in India)。全书共有14巨册。英国皇家调查团为写此书旅行了18,197英里，除克什米尔外遍历所有主要省份，开支总数达102,955英磅，当时约合50万美元。为调查团口头作证明的，有178人是当地政府官员，还有217人为地主、佃户、长工、临时雇农、商人、店员、小贩和高利贷者。书末还附有大量原始资料和次要资料。根据这些资料陈翰笙于1950年写成英文著作《南亚农业区域》一书。1959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中译本，书名改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

(七)

1946年初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请陈翰笙去讲课，陈翰笙夫妇从印度动身赴美。1946年4月到达波士顿，一上岸就听到戴笠坐飞机摔死的消息。这次是他第3次到美国，共呆了4年，直到1950年12月回国。

这次在美国，陈翰笙应邀到几个大学讲课并参加研究工作。1946年4月先在华盛顿大学任特聘教授，讲授中国历史半年。接着应拉铁摩尔的邀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参加新疆史地研究工作，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亚洲腹地边疆》这部集体著作中。1年后，陈翰

笙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印度历史研究员。以后应纽约亚洲研究所聘请担任教授，每周讲课1次。

1947年1月，一个英国记者给陈翰笙一张字条，是周恩来、廖承志带给他的，信上说：在美国的中共党员要和陈翰笙联系。

留美学生党员座谈会是1946年董必武指示组织的。后来周恩来指示正式命名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徐永瑛为组长，陈翰笙任小组顾问，和徐永瑛、徐鸣、唐明照、龚普生、杨刚、薛葆鼎等同志经常联系。陈翰笙每周和在香港的乔冠华通讯一次，报告美国的情况。

通过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和太平洋学会的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k Field）的介绍，陈翰笙认识了美共领导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

1946年，冯玉祥和李德全、罗元铮（冯的女婿）、赖亚力（秘书）一起到美国。他们经过巴尔的摩（Baltimore）去看拉铁摩尔，拉铁摩尔在巴尔的摩大学工作。陈翰笙与冯玉祥、李德全、罗元铮一起在拉铁摩尔那里吃早饭。陈翰笙又单独请冯玉祥全家吃饭。冯把他所写的字和画的鸡赠给陈翰笙。有一次，陈翰笙陪冯去华盛顿，两人一起走，冯忽然要去苏联大使馆，径直往楼上跑。后来知道他是去看苏联大使潘友新，想全家搭乘苏联轮船从纽约去敖得塞。以后冯玉祥在去敖得塞的船上看电影时着火，他和他的女儿不幸遇难。

1950年12月，陈翰笙接到乔冠华的通知要他回国，他即于12月30日乘船去英国，签证是南斯拉夫的波波维

奇帮助办理的。到英国后他去剑桥大学看了拉铁摩尔，1周后乘飞机到捷克。在那里见到了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伍修权、乔冠华、龚普生、浦山等同志。以后陈翰笙夫妇去华沙，在那里等候去苏联的签证，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八)

1951年1月31日，陈翰笙、顾淑型回到北京，乔冠华、龚澎到火车站迎接，当晚住北京饭店。第3天李克农请陈翰笙、陈家康几个人吃饭，李克农让他秘书安排陈翰笙夫妇到东城象鼻子后坑（现改名春雨二巷）调查部新买的那所房子里去住。李克农对陈翰笙说：“我本想安排你到中联部工作，他们不要你，说你是资产阶级学者。”陈翰笙听了哈哈大笑，说：“一点也不错，我出身于封建家庭，又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但一个人的出身与所受的教育，为什么要和资产阶级思想等同起来呢？”

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请客，陈翰笙、顾淑型、乔冠华、龚澎、陆定一参加。第一道菜上来，周总理让服务员拿到后边去送给毛主席。晚餐后，周总理对陈翰笙说：“你是否帮我的忙，我兼外交部长，章汉夫任副部长，他一人弄不了，你也来当副部长。”陈翰笙说：“今天总理请客，用的是筷子，假如你请我吃西餐，我不会用刀子叉子。”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当外交部顾问吧！”

陈翰笙学识渊博，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于是正式任

命为外交部顾问，同时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经常接待各国来访友人，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平理事会议等。

1952年亚澳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许多国家派代表来，陈翰笙被指定担任中国方面代表。

1952年4月他与南汉宸、冀朝鼎一起去莫斯科参加世界经济讨论会。

同年4月我国组织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马寅初任团长，陈翰笙、李一氓参加。

陈翰笙1944年—1946年曾在印度呆了两年，解放后又3次去印度：第一次和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一起前往印度进行友好访问；第二次去印度参加亚洲和平大会；第三次陪同宋庆龄副主席去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访问，廖承志、顾淑型也同去。

陈翰笙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3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一次在民主德国东柏林，一次在芬兰赫尔辛基，一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1958年人大代表团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访问。彭真任代表团团长，章伯钧和陈翰笙参加。

他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主持《中国建设》外文月刊的编辑工作达6年之久。

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学术工作，领导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担任哲学社会

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常务理事、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编兼外国史主编等职务。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中亚文化协会理事长。

陈翰笙重视调查研究，治学态度严谨，著作十分丰富。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洪进曾将他的主要著作列出目录，计有 124 种，四大系列（国际形势、中国土地问题、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并提议以他的 8 部代表作为对象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探讨。

陈翰笙在 30 年代初和王寅生、张稼夫、薛暮桥、张锡昌等人组织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1933 年他又和吴觉农、孙晓村、薛暮桥、张稼夫、钱俊瑞、孙冶方、王寅生、张锡昌、姜君辰、陈洪进、骆耕漠、徐雪寒、冯和法、石西民、狄超白、千家驹、秦柳方等发起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掀起了中国社会史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使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逐渐形成起来，并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现在许多老同志都承认他们的觉醒过程和当时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是分不开的。

陈翰笙十分关心年青一代的成长，他诲人不倦，谆谆教导，在七八十岁高龄、视力只有 0.1—0.2 的情况下还担任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并在家里设帐教学，辅导青年学习英文，为培养出国留学学生而奋战。

1985年9月28日首都学术界举行座谈会，庆祝陈翰笙学术工作60周年，胡绳、薛暮桥、吴觉农、孙晓村及外国朋友爱德乐（在中联部工作）、爱泼斯坦都讲了话，对陈翰笙坚定的革命精神、优良的学风和学术成就以及诲人不倦的精神一致赞许，给予高度评价。

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军区党史办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对派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叛乱。这是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打着宗教、民族的旗帜，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背叛祖国，妄图永远维护其封建农奴制度而掀起的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军在西藏广大人民的要求下奉命平叛，经过了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平息西藏叛乱的任务，为西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西藏叛乱发生经过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绝非出于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10月24日，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但是，达赖喇嘛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的墨迹未干，以西藏地方政府两个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

本珠仓·洛桑扎西为首的分裂主义分子，即在拉萨支持一些人以“人民会议”^①的名义出面，反对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独立”。这些人到处寻衅滋事，在大街上唾骂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包围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驻地和中共西藏工委机关，枪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军区第一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他们阻止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卖粮给进藏人员，妄图乘我补给困难之机，把解放军饿跑。尤为甚者，他们竟向拉萨调集藏军，阴谋发动武装暴乱，把解放军赶走。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在作了相应的防卫准备后，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大局出发，三次致函达赖喇嘛，并冒被“扣留”之险，亲自前往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指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和伪人民会议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破坏协议、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罪行，敦促达赖喇嘛责成噶厦^②立即采

① “人民会议”，是在1951年秋天，我军进驻拉萨、日喀则等地后，在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唆使下，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指使、支持下，以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一些活佛、喇嘛出面组织的，其中有哲蚌寺的加央达娃等五六十人。以后该组织迅速扩大，在日喀则、江孜、黑河、山南等地先后建立“人民会议”组织，其宗旨就是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

② 噶厦，藏语，意为发布命令的机关，即西藏地方政府。1751年清政府废原封郡王命由噶伦4人（3俗1僧）主持噶厦，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意志，共同管理西藏地方政府事务，遂成定制。

取有效措施，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严正要求和伪人民会议分子破坏协议、破坏团结、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进行分裂祖国的大量事实面前，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明令予以取缔。达赖也宣布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但后来，伪人民会议名亡实存，一直得到西藏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也受到保护和优待，他们继续进行着破坏协议、分裂祖国、反对西藏人民的活动。1955年夏天，他们支持的伪人民会议分子又蠢动起来。当达赖等人从北京开完全国人大会议返回西藏时，阿乐群则^①等伪人民会议的代表人物到康定、雅安迎接，并上书达赖，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名誉，撤销对两司曹的处分。他们在理塘召集康南（即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地区的反动头人20余人聚会，确定：在康区（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采取“武”的一手，组织武装“起义”；在拉萨采取“文”的一手，同共产党搞政治斗争，争取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独立”，两手配合，互相支持。他们派人常驻康定，利用邮电局电台，通过暗语，与康区反动头人保持联络，进行指挥。接着，

^① 阿乐群则，四川理塘县人，是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之长兄当才活佛的经纪商，伪人民会议重要的幕后人物，噶伦堡“幸福事业会”负责人之一。他长期住国外，1983年回国定居。他回国后说：“我在国外生活的20多年里，一直在为‘西藏独立’呐喊、奔跑，但都成了水中泡影，毫无结果。”

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来和达赖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在随达赖返藏途中，在康定新都桥分南、北两路，沿途进行破坏祖国团结统一、策划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他们对被接见的土司、头人、上层喇嘛、活佛说：“你们内部要好好团结，世界上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多矛盾，我们要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和阻挠民主改革，阻挠不成就组织武装起义。要起义必须与外国取得联系，才能达到藏族独立的目的。”并要求他们今后多联系，如有困难，西藏噶厦可给予帮助。1956年春，阿乐群则在拉萨即通过邮电局电台向康区发出正式进行武装叛乱的信号。赤江、阿乐群则等人住过的理塘寺和索康等人住过的甘孜大金寺首先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分割、包围袭击地方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者达数百人。该两地成为康区南北地区叛乱的中心。在康区发生武装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则通过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①派人与叛乱武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派人参加康区叛首会

^① 帕拉·土登维登，江孜人，大农奴主，是英帝培植的反动分子，四品副官长（藏语称卓尼青布）。1950年达赖出走亚东，帕拉竭力主张其去印度，是伪人民会议幕后的核心人物。1956年随达赖去印度时，与嘉乐顿珠、夏格巴等多次密会，策划“西藏独立”和阻留达赖于印度。1958年初，帕拉通过美特给美国政府写信，要求美国对“西藏事业”给予支持与援助，随达赖逃印后任“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长。

议，派骡帮以商队的名义向叛乱分子运输武器弹药，康区叛乱武装也经常派人以朝圣、念经和行商之名到拉萨向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汇报。康南叛首丁雍阿臣被俘后供称，他曾先后派 10 余人到拉萨汇报，有一次得到的指示是：“迅速扩大武装，外国将有帮助”。据青海玉树地区叛乱头子供称，从 1957 年 2 月开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在到拉萨“朝佛”的青海藏族地区上、中层人士中策划叛乱，这些人士中的某些人还到了印度噶伦堡^①。与此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又借“学经”为名，派大批喇嘛到青、甘藏族地区煽动、指挥叛乱。在甘南甘德县日乎寺就缴获有所谓“大藏族独立国”的文件。1958 年 1 月，玉树扎武百户仁庆才仁从西藏给扎西才旺多吉、索昂则莫等人去信说：“达赖指示不要走合作化。政府一定叫你们走，你们就组织人马打。赶走共产党，才能宗教信仰自由，才能保住千百户及活佛的地位。你们不要怕共产党，我支持你们打共产党。我们的后面有印度、美国支持。你们打不过，来西藏。”接到信后，扎西才旺多吉、索昂则莫、蔡作桢、白马丹增 4 人当即密定，攻打政府，占领县城，并确定了攻打各县的指挥人员，拟定了“赶走共产党，成立新政府”的人选。大量的证据证明，康、

^① 噶伦堡，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北临锡金，是西藏通向印度的交通孔道，距我亚东边境仅百余公里，有不少外逃的藏、康、青、甘等地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及帝国主义和台湾特务经常聚集在这里，对西藏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青等藏族聚居地区的武装叛乱是西藏上层集团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一手策动的。策动邻区藏族地区的武装叛乱是他们在西藏发动全区武装叛乱、妄图实现“大西藏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

1956年4月22日，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在会上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达赖喇嘛，并致贺词。筹备委员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不是正式的政权机关，在委员会全部51名委员中，除5名共产党员委员外，其余46名委员都是藏族，达赖喇嘛还担任主任委员。但就是这样，也为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所不容，他们竭力予以反对。在召开成立大会期间，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对昌都地区江达宗（县）解放委员会主任、江达地区头人齐美公布^①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金沙江以东康区的武装叛乱）。还说：“这是达赖的指令”。齐美公布返江达不久，即随德格小土司乌嘎及其管家俄马日郎上山叛乱，与邻区窜入的叛乱分子纠合一起，在川藏公路岗拖至妥坝段抢劫骚扰。到8月底，该段公路21个道班被抢劫一空，仅8、9两个月，叛乱分子对来往汽车伏击两次，袭击

^① 齐美公布，昌都地区江达头人，原任江达宗（县）解放委员会主任，1956年7月参加叛乱。1958年1月被我争取回来。1959年3月又复叛，率叛乱武装窜入边坝地区，充当该地区叛乱武装副司令，后逃至青藏交界地区活动，1960年11月29日被我俘虏。

1次，部队和地方人员伤亡22人（内亡8人）。11月，叛乱又扩大到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地区。曾于1955年护送过赤江·洛桑益西的宁静宗解放委员会主任、头人普巴本·泽旺多吉率60余人，于11月25日突然袭击守卫澜沧江竹卡溜索的解放军分队，副连长以下25人全部惨遭杀害。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党委鉴于昌都地区发生的局部叛乱已有为数不少的藏族群众被裹胁进去，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坚定不移地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上采取自卫的原则来解决昌都地区的叛乱问题。

1956年11月间，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是否应邀前往，中央指示由达赖、班禅自行决定，体现了中央对他们的充分信任。达赖一到印度，就被西藏的内外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所包围，而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引诱、拉拢，各方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向达赖施加影响，企图挟持达赖在国外领导分裂祖国的活动，同时在拉萨等地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及其随行的一些主要官员思想也发生动摇，对返回祖国迟迟不决，经周恩来总理多次教育、规劝后才于1957年4月返回拉萨。

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了的。其中第11条指出：“有关西藏的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

之。”西藏社会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农奴制度，政治、经济、文化极为落后，西藏人民长期陷于穷困落后的深渊，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不进行社会改革，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西藏的生产建设就无从谈起，人民就永远得不到翻身。但考虑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中央对于在西藏的改革问题，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并确定在将来的改革中，坚持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即仿照内地城市对民族资本家那样的作法，国家赎买三大领主的生资料分给农民，并对这些贵族、官员、活佛、喇嘛在政治上给予安排，政府把他们包下来，生活上不因改革而降低，并将逐步得到提高。在改革的方法上，由达赖喇嘛决定，由西藏人民自己去改革。只有西藏民族的领袖和人民有了一致要求和决心的时候，西藏地方的改革才可进行，而决不能够由别的民族去代替进行，也不能由中央下命令来改革。在改革的时机上，考虑到一部分上层人士“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待后年执行”，采取等待的方针。中央的上述方针、政策早就反复多次地向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上层代表人物开诚布公地讲清了。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期间，一部分上、中层人士对邻区藏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抱疑虑态度，表现恐惧和不安，针对这种情况，陈毅副总理及西藏工委的主要领导在发言中就西藏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时机、方法等也作了进一步阐述。毛泽东

主席在 1956 年 8 月 18 日复达赖喇嘛的信中再次肯定了上述方针政策。毛主席在信中说：“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大家都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9 月 4 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西藏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不谈改革，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再看情况实行。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于同年 12 月 29 日、30 日，1957 年 1 月 1 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3 次和达赖谈话，恳切地告诉他：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6 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产生的前后经过。1957 年 2 月 27 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向全国全世界作了宣布。根据党的“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在 1957 年 3 月决定，大量紧缩机构和精简人员。工委系统的地方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 92%，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 70%，这些人都撤回了内地。留驻西藏的少数人员，只在拉萨、日喀则、噶尔昆沙、林芝、泽当、黑河等城镇及其附近的不到 20 个地方设点驻守。“六年不改”和西藏工作的收缩方针的决定，表明中央是严格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中“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规定的，它得到了西藏广大上、中层人士特别是得到爱国进步的上、中层

人士的一致拥护，他们更加信任中央，心向祖国。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认为6年之后仍然要改革，其农奴制度迟早也要覆灭，他们叫嚣要“永远不改”，从而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同时加快策划武装叛乱的步伐。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流窜到西藏的以恩珠·公布扎西、夏格·郎加多吉、甲马·桑培等为首的康区叛乱头子，于1957年5月在拉萨组成了“曲细岗珠”反动组织，汉语直译为“四水六岗”，泛指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聚居的地区，即“大西藏国”所要揽括的地方。该组织一成立，即以向达赖献“金宝座”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捐献活动。在召开捐献活动的筹备会议时，西藏噶厦的噶伦柳霞·土登塔巴^①、先喀·居美多吉^②出席了他们的会议。7月4日，“曲细岗珠”向达赖正式献“金宝座”的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噶厦以达赖名义向参加仪式的藏、川、滇、甘、青500多名“曲细岗珠”的组织成员回送了礼品。尔后他们又向达赖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地区。接着，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下，

^① 柳霞·土登塔巴，原西藏地方政府僧官噶伦，曾任“西藏外事局局长”，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关系密切。随达赖逃印后，于1961年8月率所谓“西藏代表团”参加在新德里召开的“亚非西藏会议”，后去美国任“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

^② 夏苏（先喀·居美多吉），三品代理噶伦，随达赖逃印初期，曾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长。

他们成立武装并不断扩大其力量，泡制了“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反革命纲领和口号。1957年，西藏噶厦大幅度地调整区划、机构及其领导人员，委任了一批分裂主义分子担任宗本（县长）、基巧（相当专员）等职务，以强化其反动统治。又经过一段串联、酝酿活动后，在1958年4月20日，由邻省窜入拉萨的近5000名叛乱武装的头目及藏军，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结成同盟，将所有武装力量统一于“曲细岗珠”组织之内，并正式签订了同盟书，各自承担了将来叛乱时所担负的任务。6月15日，恩珠·公布扎西^①等带两名藏籍美特^②和部分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建立叛乱“根据地”。24日召开有27股叛乱武装的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卫教军”^③，由恩珠·公布扎西任司令，夏格·郎加多吉、甲马·桑培

① 恩珠·公布扎西，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人，后到拉萨和尼泊尔、印度经商，成为大商人。1956年在理塘地区发动叛乱，后逃到西藏继续组织扩大叛乱，1959年4月从山南地区逃入印度，1964年9月27日在印度大吉岭病死。著有《四水六岗》（忆西藏抵抗运动）一书。

② 1957年8月美帝国主义在西藏南部地区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桑伊宗（即桑日县）空降两名藏籍特务，该两特务携电台于1958年初潜入拉萨与恩珠·公布扎西取得联系，其任务是及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西藏的情况、接受指示、组织指挥“西藏抗暴运动”。

③ “卫教军”是“卫教志愿军”的简称，藏语为“达朗登松马喀”。按照藏军的编制设立司令部（马基康），下辖4个机关（列空），按地区编成36个连队。

等任副司令。“卫教军”一成立，就得到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空投、陆运武器弹药等物资援助。西藏噶厦更是全力给予支持。早在3月他们就给各宗（县）、（区）寺庙下令要大力支持“曲细岗珠”组织，积极为叛乱分子筹备粮秣。噶厦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向叛乱分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叛乱武装则有恃无恐，气焰嚣张。7月21日，在拉萨以东仅80余公里的争莫寺伏击了解放军的1辆运输汽车，打响了在西藏噶厦管辖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接着，又在麻江、贡噶、扎朗等地伏击解放军车辆，使副团长殷春和、营长杜效模、分工委副部长沈凤楼等军政人员10人被杀害，22人致残，汽车被焚毁和破坏10余辆，并劫走我大量武器弹药。到1959年初，武装叛乱活动加剧升级，愈演愈烈。叛乱分子不仅洗劫道班、袭击兵站、伏击车辆、炸毁桥梁、截断公路，而且围攻各地解放军和党政机关。泽当中共山南分工委、扎木中心县委、丁青县委和驻这些地方的解放军先后被叛乱分子围攻，山南分工委被围攻两次共77天，丁青县委被围攻90余天。叛乱分子所到之处，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破坏寺庙、杀戮无辜、残害僧俗人民和爱国进步人士，无恶不作。墨竹工卡有84户群众被叛乱分子抢劫一空，连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被抢走；嘉黎阿扎寺活佛及其管家叛乱后，不顾众僧反对，抢走寺内金银珠宝，焚毁经书，捣毁佛像；山南凯松溪卡，一个仅有50户农奴的村庄，“卫教军”在村里设了一个粮

站，家家被洗劫，妇女被奸污，从10来岁的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无一幸免，这个村庄被蹂躏达10个月之久。乃东县群众平措反对叛乱，被“卫教军”挖心致死；那曲地区牧民白达向解放军报告过情况，被叛乱分子挖掉了双眼。叛乱分子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对于从1958年7月开始的在噶厦管辖区由噶厦直接策划、支持而发动的局部叛乱，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指出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他们转变立场，认真担负起制止叛乱进而平息叛乱的责任。并告诫他们，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实行武装平息叛乱。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提高警惕，加强防御，坚持“保点、保线、自卫”，坚持不先打第一枪的原则。根据中央的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军区采取了必要的防卫措施，驻拉萨和各地的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成立了民兵，分别编成团、营、连、排战斗组织，配备必要的武器，构筑工事，储备粮草、饮水，准备必要时就地进行自卫。只是在威胁到交通和驻地安全时，才采取必要的自卫性的有限的反围攻或出击的军事行动。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曾去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通报了帝国主义特务、邻区窜入西藏的叛乱分子，勾结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要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的情况，重申了中央对西藏社会改革和叛乱的既定方针。指出噶厦对叛乱分子采取纵容、支持的立场是错误的，请达赖责令噶厦转变态

度。但是，西藏噶厦对中央的忠告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支持叛乱活动。他们开始从藏军中选派号兵、机枪手去山南帮助训练“卫教军”，10月以后，又准许藏军的官兵携械去参加叛乱武装。一开始第二代本^①即去了200人，其它各代本有20至50人陆续去山南参加叛乱，到年底发展到整排、整连集体去参叛。11月2日，达赖曾召集全体噶伦、孜仲^②、马基（即藏军司令）及三大寺的堪布^③、堪苏（即卸职的堪布）开会，“希望全体官员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担负起平叛的责任”。11月5日，噶厦召开全体官员会议，名为传达讨论达赖的指示，实际开成了一次反对中央、准备叛乱的会议。继后，在12月20日由噶伦索康·旺清格来主持召开的“官员代表会议”上，公开反对达赖去北京出席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分裂主义分子叫嚣：“为了宗教和民族要与中央战斗到底”，藏军代表发誓：要为维护西藏农奴制度而牺

① 代本，西藏地方政府军职称谓。藏语“代”即团之意，是藏军编制的最高单位。“本”即长官之意。1793年清政府规定西藏额设藏军3000名，代本6名，每代额定500名，沿为定制。“代本”由贵族出身的俗官担任。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大量扩军，“代”的数目也随之增加。

② 孜仲，藏语音译，亦称“济仲”，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僧官的统称。凡在拉萨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之一取得僧籍，并在译仓（意为秘书处）附设机构受训合格，委以官职者。定额为175名。

③ 堪布，藏语音译。其义有三：一、佛教寺院的僧职官。大寺院的扎仓（僧学院）和中、小寺院的最高主持人。二、原西藏地方政府僧官名。如总管布达拉宫宫廷事务者称基巧堪布（总堪布）。三、佛教中主持受戒者的称号。前两类堪布一般属于握有政治、经济实权的上层当权派。此处指的是属于第二类堪布。

牲。会议还决定“要把达赖喇嘛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和他们战斗”。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统一思想，准备发动全区性武装叛乱的动员大会。到1959年初传昭^①期间，西藏噶厦又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他们指使藏军在大街上绑架青藏公路管理局两名汉族工人，由达赖的姐夫一代本（即达赖的警卫代本）彭措扎西进行非法审讯，随即捏造出离奇的谣言：“汉人行刺达赖，凶手当场抓获”。传昭的最后一天，按例达赖应出席讲经，但被取消了，并造出谣言：贸易公司楼上架有机关枪，正对讲经台，要谋害达赖。藏军还企图去贸易公司搜查，蓄意制造紧张局势。在传昭期间，分裂主义分子还散发大量传单，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叫嚣“西藏独立”，加紧制造叛乱的舆论准备。

2月7日，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达赖邀请前往布达拉宫观看“跳神”（又称“送鬼节”，一种宗教仪式）活动，达赖与邓少东、郭锡兰进行了交谈。达赖希望看军区文工团演出，邓少东、郭锡兰表示衷心欢迎。当天邓少东即把达赖要看文工团演出的意愿通知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旺

^① 传昭，藏语叫“莫朗青布”。按西藏的传统说法是为了在新的一年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而举行的一种宗教活动。“大昭”从藏历1月3日开始，24日结束，传昭期间近3万喇嘛集中在拉萨大昭寺念经祈祷，喝茶吃粥，领取布施。按第五世达赖喇嘛规定，传昭期间，拉萨市的治安、司法权全部交给哲蚌寺的铁棒喇嘛掌管，所有市区的僧俗居民都得遵守他们的一切规定。

清格来等噶伦及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对达赖要看文工团演出这件事十分重视，做了充分准备。3月1日，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面见达赖，请其确定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达赖说：现在传昭完了，“格西”（宗教最高学位）也考完了，看演出的时间大体确定在藏历二月初一、初二、初三（即公历3月10日、11日或12日），具体安排，你们可以和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①直接联系。3月5日统战部副部长梁洪会见洛桑仁增，商量达赖看演出的时间并将拟就的一个邀请陪同看演出的人员名单交给他，他表示同意这个名单，具体日期请示达赖后再告。3月8日噶章·洛桑仁增电话通知统战部：达赖定于藏历2月1日（即3月10日）到军区礼堂看演出。3月9日统战部一位处长将接待计划交给噶章·洛桑仁增，他表示同意，当即发出请帖。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利用达赖将到军区看文艺演出之机，加紧发动叛乱，公开叛国。9日夜间，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墨本（市长）洛卡娃·泽旺仁增向一些市民宣称：达赖喇嘛明天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奉噶厦命令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看戏。3月10日

^① “基巧堪布”为藏语，意总堪布，领导秘书长工作及负责达赖喇嘛近侍的全部事务，与噶伦平级，为全体僧官之领袖。噶章·洛桑仁增，三品代理基巧堪布，1959年3月随达赖外逃。

晨，西藏噶厦的警察代本（即第二代本）俊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一起荷枪实弹，穿梭奔驰在市内大街小巷，吆喝驱赶群众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11时许，商店纷纷关门，抢贮饮水。“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等谣言传遍全市。12时左右，昌都堪穷（仅次于堪布职务的僧官）、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去晋见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大门口，被叛乱分子用石块砸死。接着，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乘汽车去罗布林卡，临近大门时，遭到叛乱分子的石块袭击，车窗被砸坏，桑颇头部被砸伤，司机迅速驾车离开现场，方幸免于难。下午3时左右，叛乱分子将帕巴拉·索朗降措遗体系于马尾，鞭马拖尸“示众”达两公里，惨不忍睹。同时，叛乱分子纠集1000余人在市区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你们不滚出去，我们也有力量赶走你们”等反动口号，沿途张贴“西藏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今天起，我们西藏怎样独立自主，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等反动标语，撕毁墙壁上的宣传画，捣毁交通指挥亭，抛掷石块，打砸机关、百货公司门窗，向执勤的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投石块，恣意寻衅。就在此时，噶伦索康、柳霞、夏苏3人到西藏军区会见中央驻藏代理代表、军区政委谭冠三，谎称：噶厦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

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戏，事态发展到使噶厦无法控制的地步，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谭冠三政委当即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是他自己提出并经过1个多月的协商安排确定的，你们竟然说是噶厦不知道，怎能使人相信！谭冠三最后要噶厦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今天事件的主谋者，惩办凶手，抚恤、慰问死伤者，妥当处理善后事宜。索康返回罗布林卡后，立即召开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与会者100多人，索康开始就造谣煽动说：军区请达赖喇嘛看戏，没有通知噶厦是不对的，所以达赖喇嘛不能去。当天的会议决定：从那天起“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并决定，由索康·旺清格来、噶章·洛桑仁增、雪苦巴、大惹·多阿塔青、凯墨·索安旺堆和洛珠格桑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18时左右，叛乱集团派堪穷喇嘛拉、仁希（即四品官之意）沙龙等12名所谓“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给予支持、保护。印度总领事蔡伯尔竟然接见了西藏叛乱分子，并表示要有一个书面文件为凭。黄昏时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命令三大寺的1400多名喇嘛和分散潜伏在拉萨周围的武装叛乱分子利用夜暗向市区集结，并以加强达赖警卫为名，一部分进入罗布林卡，将达赖置于武装包围控制之下。

3月10日以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活动继

续发展，局势日趋恶化。11日叛乱集团召开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准备作战；三大寺立即组织“先锋队”；凡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即日前来登记悔过，否则必将严惩。并派人星夜分赴工布、彭波、江孜、山南、曲水等地送噶厦命令，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当天，又派人去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声明西藏已“独立”。12日，叛乱集团在布达拉宫前的“雪”（地名）印经厂，召开“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除僧俗官员“代表”外，还有近千名武装叛乱分子以“人民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会上推举噶伦索康、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即堪布秘书）土登降秋、孜本^①雪苦巴、孜本凯墨巴5人为“人民会议”领导；调整“西藏独立国”武装总司令部组织，任命拉鲁·次旺多吉^②为总司令。13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向各宗谿发布命令：“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定将依法惩处”。16日、17日，西藏上层叛乱

① 孜本，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财政、人事的俗官，四品，其地位仅次于噶伦，一般担任过孜本的都可升为噶伦。

② 拉鲁·次旺多吉，解放前夕曾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任昌都地区总管，1952年达赖下令，“以其在昌都总管任期内残酷地压榨剥削老百姓”为由，革除其噶伦之职。1959年3月任拉萨叛匪总司令，3月21日在拉萨战斗中被我俘获，1965年8月被特赦释放。

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印度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①发去密电两封，声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幸福事业会”^②及所有在印度的西藏人宣布，并向邻国印度政府、佛教协会、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以设法谋求他们的支持。上层反动集团在大力策划组织叛乱的同时也积极作出逃准备。噶伦柳霞等从布达拉宫金库中取出大量印度卢比及金砖金币，征集骡马、鞍具，并向罗布林卡集结。16日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其北面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连续开枪射击，至17日除继续向该站射击外，又向油库射击。该站民兵未经请示向叛乱武装还击“六〇”迫击炮弹两发，落在罗布林卡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这就是后来西藏叛乱集团和国外反动派制造的所谓“中国人的两发炮弹落入罗布林卡池塘里”谣言的真相。他

① 夏格巴·旺秋德丹，原西藏地方政府管财政的孜本，四品，出身于大贵族，曾留学英国，1948年西藏地方政府曾派其去美、英等国乞求“援助”。和平解放后，长期住噶伦堡，从事“西藏独立”反对祖国的活动。达赖外逃后，被任命为“达赖驻新德里办事处”负责人，成为达赖的代言人，后以治病为名去职，于1963年5月15日赴美国居住，在美写了《西藏政治史》一书，他在书中诡称：“西藏的历史和政治的发展清楚表明，它是一个主权国家”。

② 西藏“幸福事业会”，是由原来在噶伦堡的“西藏自由同盟”、“西藏佛教协会”、“西藏福利协会”、“喜马拉雅协会”等反动组织于1957年合并组成的，主要头目有夏格巴、鲁康娃、嘉乐顿珠、当才等20余人。出版有《西藏镜报》，其宗旨是鼓吹“西藏独立”和对西藏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们歪曲事实，对我进行诬蔑攻击，说什么就是这两发炮弹，把达赖吓走的。17日夜，达赖和索康、柳霞、夏苏3噶伦、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及达赖的家属、随员、藏军等600余人，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出逃山南。沿途要地都有叛乱武装警戒接应，足以表明他们的出逃是有组织、有预谋的。3月18日在罗布林卡召开了“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会上宣读的达赖17日签署的给叛乱武装各司令转全体人民的一封信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目前汉藏团结已处于分裂之际。为了设法保全生命并使佛教、政治不致受损，我本人和负责政治的僚属们不得不暂时出走……云云。3月26日，达赖一行逃抵隆子宗，召开群众大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来代表达赖宣布西藏已“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并决定隆子宗为“临时首都”，任命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前为代理司伦），还以“西藏独立国临时政府”名义向各宗、谿发布命令，要求僧俗人民遵守“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斗争。达赖一行经错拉、沙则（兼则马尼）、仲昆桥，于3月31日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占领区，印度政府派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至达旺迎接，给予“贵宾礼遇”。4月18日，他们抵达印度提斯普尔后，即由印度外交部官员向记者散发用英文书写的“达赖喇嘛的声明”，声明竭尽歪曲造谣之能事，谈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叛乱的经过，并说什么中国把“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声明谎话连篇，漏洞百出。世界舆论

当即指出，从声明的内容、形式、使用的文字及某些观念和文体看来，是由别人精心编造，强加给达赖的。4月22日达赖一行抵达印度穆索里后，再次以达赖名义发表声明称，4月18日在提斯普尔的声明，是在达赖授意下发表的，表达了达赖的看法，真是欲盖弥彰。此后，达赖集团在印度继续进行背叛祖国、反对西藏人民的活动。1960年7月，他们在印度的达拉姆萨拉召开所谓“首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并将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在后来每年的这一天，达赖集团都要进行纪念和发表声明，进行坚持“西藏独立”、反对祖国的种种活动。中央对达赖一向是仁至义尽的，拉萨叛乱发生后，中央仍竭尽全力予以争取，达赖在出逃拉萨前也曾先后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写了3封信。在3月11日的第1封信中说，反动分子正在借口保护他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他的活动。对此他正设法平息。在3月12日的第2封信中，再次说明反动分子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制造的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他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达赖还说他已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他名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对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就在3月16日，达赖出逃拉萨前1天给谭冠三的第3封信中，达赖还说，他已经向噶厦官员进行了教育，并表示几天之后，设法到军区。鉴于上述信件内容，在达赖出逃拉萨后，中央即

指示西藏工委“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集团挟持达赖”，对达赖是留有余地的，并且长期地给他保留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达赖逃往国外后，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否认他是被劫持的。达赖说“我从拉萨起程时，是按照我的意愿出发的，而且也是由我决定的，而不是由我的仆从们带走的。”达赖说给谭冠三的信是出于“缓和双方愤怒的情绪”，“消除没有武器之我的人民与汉人军队一触即发的危险”，“使拉萨人民得以在和缓中生存”。达赖说，这就是写信时的“真实想法”。根据上述情况，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第151次会议作出撤销达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职务的决定。

达赖出逃后，留在拉萨的叛乱集团加紧军事准备，他们打开布达拉宫军械库向叛乱分子配发武器弹药；抢占要地；破坏拉萨通外的公路桥梁，破坏通讯设施，烧毁民房。至3月19日，聚集在拉萨之敌已达7000人左右。叛乱分子控制了罗布林卡、药王山、布达拉宫和市区的大昭寺、小昭寺等坚固建筑，对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形式分割包围态势。3月20日凌晨3点40分，盘踞于罗布林卡南侧之叛乱武装首先向我在拉萨河南岸执行任务的分队开枪射击，随后在市内和郊区向各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罗布林卡北侧之叛乱武装数百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连续3次冲击，被我由

80 余名职工组成的民兵连击退；盘踞在市区北侧小昭寺及其附近的叛乱武装，集中 1000 余人向建筑工程处发起攻击，并一度攻入院内，被该处民兵打退。继后，叛乱武装攻击中共西藏工委机关，炮袭西藏军区司令部。

经过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长期酝酿、长期策划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终于爆发了。

依靠政策，依靠群众，平息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掀起的武装叛乱，遭到了包括爱国上层贵族、官员、活佛喇嘛在内的西藏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3月20日10时，西藏军区驻拉萨部队向围攻党政军机关的叛乱武装进行反击，经过两昼夜激烈战斗，于22日拂晓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这一胜利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西藏全区性叛乱失去指挥中心，不仅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也是给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拉萨反击叛乱武装的同时，驻藏部队迅速解除了日喀则、亚东、江孜、协噶尔、定日、黑河、噶尔昆沙各地藏军的武装，接管了这些地方的反动政权，使西藏的重镇完全置于解放军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迅速增调部队进入西藏，与原驻藏部队团结一致，共同担负平息西藏叛乱的任务。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

“坚决平息西藏叛乱，彻底解放西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粉碎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一切阴谋”的指示，同时为了避免叛乱大幅度地反复，加速平叛斗争的进程，确定在平叛斗争中采取“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在平叛斗争的行动上又采取了“先平息叛乱的中心地区，后一般地区；先边沿，后腹心地区；先公路沿线，后偏远地区；以及先农区后牧区”等步骤。当拉萨反击战一结束，新入藏的部队陆续进入拉萨、昌都等地后，西藏军区即于4月初挥师南下，对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一举荡平了叛乱武装的老巢，解放了被叛乱分子长期蹂躏的山南地区广大人民，截断了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从陆地上资助叛乱武装的主要通道。7月初、8月底又相继对聚集在纳木湖（腾格里海）和麦地卡地区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保障了公路运输的安全。在昌都地区，从4月中旬开始，先后组织了对昌都东北、盐井及昌都东南两个地区的平叛作战，基本上歼灭了昌都南北地区及川藏公路沿线的大股叛乱武装，控制了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在西藏全区完全控制了城镇和交通干线，进驻了大部分边防要点，基本构成了“关门平叛”和对腹心地区集股叛乱武装分割的态势。1960年乃集中主要力量对腹心地区几大股叛乱武装发起进剿。从2月底开始，首先对恩达、丁青、嘉黎、倾多地区（代称1号地区）和申扎、萨噶、定日地区（代称3号地区）的叛乱武

装发起进剿之后，又组织了对盘踞在温泉、黑河、巴青地区（代称2号地区）、昌都东南地区（代称4号地区）及阿里、宁静、三岩地区的叛乱武装的进剿，先后经过6次较大的进剿战斗，特别是1、2号地区的两次战斗，全歼了叛乱武装主力，歼灭了美帝国主义派遣的（通过空降）藏籍特务^①，缴获了大批空投的武器弹药、电台，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在西藏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迷梦。

在大股叛乱武装被歼以后，漏歼的少数叛乱骨干分子则分散逃至荒山僻野，四处流窜。1960年下半年即转入清剿。至1961年底，在西藏全区范围内基本上肃清了公开活动的武装叛乱分子，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净化”^②。1962年上半年，我军进驻墨脱地区，歼灭了最后一股叛乱武装。随着平息叛乱斗争的胜利，部队陆续进驻边境要地，设防守卫，逐步在西藏全区形成“关门平叛改革”的态势，并结束了西藏长期存在的“有边无防”的局面，从而也

^① 达赖集团逃印后，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下，于1959年5月即着手在外逃的叛乱分子中，挑选青壮年两批共70余名，其中一部分经印度情报部门组织送往美国拉多州洛基山中央情报局办的“康巴游击队员”训练营地，经特工、游击战训练后，于同年9月至1961年3月，分批先后空降到西藏的纳木湖、边坝、聂荣宗以北和昌都以南，共50名，其中被我击毙26名，俘5名，逃往国外15名，下落不明4名。

^② 1961年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提出，在平叛地区“净化”的四条标准是：“1、公开活动的叛匪和隐藏的匪首、骨干（不包含外逃的匪首）已彻底搞光；2、掌握在反动分子手中的枪支、反动证件，已全部或基本上收光；3、基本群众已充分发动，反动的社会基础已被彻底打垮，我基层政权已获巩固，政治优势已较稳定地树立起来；4、杜绝了较大的叛乱反复现象。”

有利于巩固腹心地区平叛斗争的成果。在实施上述“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中，充分注意了各个阶段和各个战斗之间先后关系的衔接，达到集中力量分别歼灭敌主力的目的。在每一个地区的作战行动上又采取“进剿”与“清剿”两步。在进剿阶段，集中足够的兵力，多路分进合击，进入叛乱地区，迅速歼灭叛乱武装主力，摧毁反动统治，站稳脚跟；清剿阶段，部队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继续清剿残余叛乱分子，进行民主改革，直至成股的叛乱武装基本肃清，群众基本发动起来，改革的局面打开，再把部队转移出来开辟新的地区。这样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使叛乱分子的生存条件和活动地区越来越小，政治上越来越孤立，更便于我彻底加以歼灭。

党中央、中央军委还提出在平叛斗争中，为了较快地、彻底地平息西藏叛乱，必须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实施坚决有力的军事打击，消灭叛乱武装力量，才能打垮叛乱分子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斗志，促使叛乱集团内部的动摇分化，从而为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只有广泛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给叛乱分子一条出路，才能加速瓦解叛乱武装力量；只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同叛乱分子斗争，才能最有效地促进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从根本上保证平叛改革的胜利。西藏的叛乱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反动的农奴主发动的，叛乱是违背西藏广大人民意愿的，

坚决叛乱、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更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被上层反动官员、农奴主、头人胁迫、欺骗拿起武器的一般群众，我们应尽一切可能采取政治的手段，把他们从叛乱武装的阵营中争取回来。各平叛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对主动投降回归的叛乱分子，不论其罪恶大小、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的“四不”政策。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并广设招降站，动员一切力量宣传党的政策。3年平叛中，从空中、地面散发宣传品30万份，党政军民一齐出动招降、劝降。在强大的政策威力感召下，出现了叛乱分子自动来降、父母劝儿、妻子劝夫、弟妹劝兄和亲串亲、友连友的劝降局面，在全部的平叛过程中，政治争取来降的占歼灭叛乱分子总数的41.9%。在战斗中对于绝大部分被欺骗、胁迫上山叛乱的一般群众，不论其是主动或被迫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都加以保护，发给他们口粮、路费，送其回家生产，一律不再以叛乱分子对待。

· 党中央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区性武装叛乱后及时提出：“必须结合平息叛乱斗争，采取边打边改的方法，完成西藏全区的民主改革”。平息叛乱，为民主改革铺平了道路，实行了民主改革。

西藏人民在平叛中起了重要作用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倒行逆施，背叛祖国，违背西藏广大人民意愿发动武装叛乱，激起了百万农奴极大的愤怒。他们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了自身的解放，与人民解放军一起，前仆后继，同叛乱武装进行了刀对刀、枪对枪的殊死斗争。3年平叛斗争中西藏民工随军支前15800余人次，出动牦牛（骡马）104400余头（匹）次，在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有的翻山越岭为解放军带路；有的赶着牦牛或者自己带着给养支援解放军；有的自动组织起来为解放军整修前进的道路，不顾天寒地冻，洪水泛滥，突击抢修。他们豪迈地说：“解放军平叛到哪里，我们就坚决支援到哪里！”有的地方组织自卫武装，主动出击；有的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搜山，成千上万的群众拿着刀矛、棍棒，四处搜捕叛乱分子，陷敌于无隙可躲、无洞可藏的境地。林芝地区东久的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在一条100多里长的山沟里遍设岗哨、观察哨，村与村、牧场与牧场、牧场与村之间都建立联络，一村发现敌人，各村出动，一人发现叛乱分子，人人齐追。广阔的深山成了密织的天罗地网。有一次，东久村农奴拉巴发现叛乱分子逃跑，他带着一只狗跟踪追击，在雪山上潜伏了1天半，终于活捉了3名叛乱分子。在江达地区一次围歼叛乱分子的战斗中，当地群众自动组织搜山，做到“山山有瞭望哨，条条路口有岗哨，部队到处能得到情报”。有一

个 10 来岁的小孩，拉着马尾四渡急流给解放军送情报；有位 60 多岁的老阿妈，自动在森林里放哨，叛乱分子到后，她躲入林中，把叛匪人数数清后就跑去给解放军报告。黑河地区年逾 6 旬的牧民占堆和嘎，用自己身佩的一把腰刀，同 11 名武装叛乱分子搏斗，砍死 4 个，砍伤 1 个，其余弃马丢枪狼狈逃跑。宁静（芒康）县农奴洛桑泽仁带领民兵捉捕叛乱分子，用身背的步枪托砸死叛匪 1 名，俘 5 名。28 岁的藏族青年登巴，在了解到宁静地区的叛首普巴本潜藏的巢穴后，主动给解放军带路，歼灭了该股叛乱分子，在战斗中登巴就击毙了两名敌人。堆布村芒果是一位年轻的藏族农奴，一天叛乱分子逼他参加叛乱去打解放军，遭芒果拒绝，敌人就下毒手砍掉了他的右手。部队到后为他治疗，并帮助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芒果深受动感，主动提出给解放军当义务侦察员，不消灭叛乱分子、不报仇不罢休。他背着糌粑经常外出了解情况，在仅 1 个多月的时间里，报告 3 次准确情况，据此部队歼敌 30 多名。他还和其他人一起活捉了 1 个叛乱分子，大家称他为“独臂侦察员”。贡觉县农奴降村扎西，在叛乱分子的威逼下曾参叛，1 个多月后跑回，以后主动向解放军报告情况。当他了解到叛首麦巴本·贡布多吉潜藏的地方后，立即向工作组报告，并亲自带路顺利地歼灭了该股敌人，击毙了贡布多吉，活捉叛乱分子 8 名，缴步枪 5 支、手枪 4 支。打拢宗扎西多吉是年仅 22 岁的草场牧工，一天 8 名叛乱分子到牧场抢牛羊，并威胁说：“你向解放军报告就杀掉你全家”，但扎西多吉没有被吓住，他一面应付

着敌人，一面叫家里的人去报告解放军。由于路远，当解放军赶到时敌人已逃跑，他又立即带领部队跟踪追击，最后歼敌4名、俘1名，缴步枪3支。类似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至于西藏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如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他们的贡献更是巨大的。总之，西藏人民在平息叛乱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功绩应永载史册！

为《湖南致中央函》辨白

吴 荣 宣

毛泽东起草的 1927 年 8 月 20 日《湖南致中央函》，既引人瞩目，也招人争议。因为，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①有些同志对此多有批评，或作为论据，证明毛泽东不可能在 1930 年初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他与李立三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甚至推论毛泽东思想不可能在 20 年代后期 30 年代前期形成。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为该信辨白。

起草这封信的历史背景，是在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协助改组省委并发动秋收起义。在省委会议讨论土地问题、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秋收暴动等问题之后，毛泽东代表省委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后来，毛泽东本人对此有过解释。他说：“我在长沙发了一封信向中央建议：国民党旗帜不要了，要共产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集第 303 页。

党；不要国民革命军，要工农革命军；不要国民党政府，要工农革命委员会。”^①笔者认为，毛泽东本人的解释说明这封信的中心思想乃是主张抛弃国民党旗帜，打起红旗，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建立工农革命军，建设工农民主政权。

为了进行历史性的考察，确切了解此信的针对性，首先应当弄清八七会议前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策略等问题的观点，以便有所比较和鉴别。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均有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最具权威性的自然是斯大林的见解了。斯大林按所谓“三阶段论”的公式，认为中国 1927 年革命的失败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了，却又将进入“苏维埃革命”的时期。所谓“苏维埃革命”或“第三阶段”，显然指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的这种判断，利少弊多，导致尔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屡次混淆革命性质、屡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问题，照斯大林的估计，中国 1927 年革命的失败，既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也不是俄国 1905 年革命那样近乎长期的失败，而是类似俄国革命在 1917 年 7 月所遭到的那种失败，只要经过两个月、半年或一年，新的革命高潮就会到来。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并非完全失败，反对取消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前途持悲观失望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虽然承认当时不是革命高潮，却又强调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对于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集第 303 页。

形势发展估计得过于乐观，这就不切实际了。这种估计对于尔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盲动主义的屡屡出现是具有深刻影响的。至于党的斗争策略问题，斯大林既赞成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但又极力主张继续利用国民党的旗帜，或者“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领导”；或者仍以国民党的名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他强调，只有在争取“左派国民党”计划失败和革命新高潮到来的两个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才能抛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苏维埃革命”，组织“工农代表苏维埃”。实际上，斯大林是把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的问题硬纳入他的“三阶段论”的框框，强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必须自始至终利用国民党旗帜，只有到了“第三阶段”，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其实，是否抛弃国民党旗帜的问题同革命的性质并无本质的联系。在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抛开国民党的旗帜，独立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旗帜在工农群众的心目中已失去信仰，硬要打国民党的旗帜，反而会束缚共产党的手脚，不能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贯彻到底。但是，由于斯大林坚持利用国民党的旗帜，所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反复强调：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①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第54页。

显然，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毛泽东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上述观点的影响。当时，5人中央常委、瞿秋白等基本上是按照上述观点来分析革命的性质、形势和制订党的斗争策略的。为此，八七会议既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又认为它“有生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而且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中国统治之支柱”。八七会议对于形势的估计，虽然没有认为当时已出现革命高潮，但又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所以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必要的退却以保存革命阵地和聚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关于党的斗争策略问题，八七会议的方针也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它在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下，实行发动工农群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而且把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放在农民方面；另一方面，它却又不肯抛弃国民党的旗帜，硬要以国民党的名义建立新的工农政权。这种互相矛盾的策略，势必给领导暴动的地方党组织带来种种困难。毛泽东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会议的各种决议必将在他的思想中有所反映，《湖南致中央函》便是例证。但是，对于具体问题还要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关于革命的性质和策略问题，更不能一概而论。

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23日《复湖南省委函》中曾

指责毛泽东等：“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①瞿秋白在1928年4月12日起草《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报告时，亦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命令传到以后，“高谈着中国革命已经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又多半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本身的逻辑造成的。如上所述，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强调：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反之，主张抛弃国民党旗帜，就是主张“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就是主张搞“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了。按照这种逻辑，中央自然要把所谓“第三阶段”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强加于湖南省委。实际上《湖南致中央函》并未出现有关“第三阶段”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任何提法。虽然，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提到：“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了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十月”，然而，整句话却是这样说的：“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了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但在这中间最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现在应扩大宣传苏维埃政权。”请看：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土地革命”；政权的性质仍然是“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其中，也没有搞“第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302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第168页。

三阶段”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思。如果我们不是断章取义，而是注重于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实际思想状况的分析研究的话，那就更加不可能得出毛泽东当时主张搞“第三阶段”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结论了。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重视农民运动，深信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和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能力，所以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而且从政权的高度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由此也可推断，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际，他不会轻率地抛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贸然主张搞“第三阶段”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征之后来他在1928年的言行，也有轨迹可觅。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为毛泽东比较好地执行了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湘南特委的代表批评他“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①1928年10月，毛泽东又在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决议中明白无误地指出：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这种提法与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以及党的六大的提法迥然不同。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以及党的六大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公式，叫做：“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77页。

② 同上，第47页。

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①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毛泽东确实没有背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轨道。

那末，《湖南致中央函》所谈“一九一七年”和“一九〇五年”问题的真谛何在呢？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主要意思就是就革命形势而言。毛泽东基本上赞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革命形势问题的估计，即认为中国 1927 年革命的失败，既不是完全失败，也不是俄国 1905 年革命那样近乎长期的失败，而是类似俄国 1917 年 7 月所遭到的那种失败，经过较短时间，新的革命高潮就会到来。毋庸讳言，这是毛泽东对形势估计的失误，即对形势的发展估计得过于乐观，在理论上表现为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由此产生的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他在信中表示：“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革命急性病的表现。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毛泽东和当时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一样犯有革命的急躁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有所失误，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对于时局的严重性也有一定的认识和精神准备，即考虑到了在形势发展不利时退向农村边界山区实行武装割据，作长期斗争的打算。早在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58 页。

1927年7月底，毛泽东就在武汉拟订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通称“湘南暴动大纲”），提出武装割据“以汝城县为中心”，包括桂东、宜章、郴州等五六县的计划。这一计划与众不同，因为它主张以地处农村边界山区的汝城县为中心，而不是通常那样以湘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衡阳为中心。与此相联系，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会议上又不断地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而不是象当时中共中央大多数同志那样，迷恋于群众性的武装“暴动”，把“暴动”奉为至宝，作为斗争的最高形式。除此之外，他还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历史上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提出对待“会党土匪”的政策问题。他正确地指出：“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我们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①以上这些思想恰恰表明当时毛泽东并不是把“上山”仅仅看作保存农民武装的权宜之计；更不是陈独秀所批评的“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而是脚踏实地准备应付时局的严重性，作更长远的打算。从这一方面来考察，当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不是那么盲目乐观的。

如果对“一九一七年“和”一九〇五年”的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还会发现毛泽东也并非仅就形势而言，其中还涉及关于党的斗争策略问题的考虑，即是否应当抛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第73页。

弃国民党的旗帜，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因为，关于是否应当抛弃国民党旗帜的问题，究其实质来说，乃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应当独立领导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工农联盟尚未巩固，因而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推开立宪民主主义自由资产阶级、直接同农民实行联盟、成立工农代表所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使革命达到胜利结局的方针未能实现。由此联想毛泽东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而非一九〇五年”，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这样的一层意思，即中国共产党经历过第一次大革命，已经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情况下，应当坚决地抛开他们，依靠工农联盟的力量，夺取政权。自然，在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下，抛开资产阶级，并非主张政治上打倒他们和在经济上对他们实行剥夺。对于小资产阶级，则更应当实行正确的团结和争取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就已明言：“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①“只要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②当时，毛泽东并没有被那种所谓“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的形式逻辑所束缚。虽然，他在八七会议上还只是表示“使工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集第 304 页。

②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8 日）。

农群众进国民党当主人”^①，但回湖南后，眼见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人民群众厌恶国民党，他便坚决主张抛弃国民党的旗帜，由无产阶级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这种主张既同托洛茨基在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失败之前便主张退出国民党和组织苏维埃的意见具有原则上的区别；也比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设想更富远见。后来，由于南昌起义军失败于潮汕，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未能实现，以国民党名义在广州组织“中国临时革命政府”的计划流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乃不得不于1927年9月19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承认应当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建立苏维埃政权。

至于谈到“工农兵苏维埃”口号的问题，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苏维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创造的斗争形式，起初作为工人群众的政治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起义机关和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自然，这种斗争形式无论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适用的。作为政权形式，它既可以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也可以具有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而且，这种政权形式还有利于革命的转变，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湖南致中央函》所谈“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主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第57页。

要指借用“苏维埃”的形式来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并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例如，彭公达报告在谈到“政权问题”时曾作如下表述：“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立即建立苏维埃式的政府”。又说：“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由此可见，“建立苏维埃式的政府”和“建设工农政权”两者的性质和政策是相同的，它虽不包含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却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后来在井冈山斗争和赣南闽西的斗争中，或称“工农兵政府”；或称“苏维埃政府”；或称“革命委员会”，其性质都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俄国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而中国共产党在尚无独立建设革命政权经验的情况下，借用“工农兵苏维埃”的形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湖南致中央函》应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第一次大革命猝然失败，中国共产党对于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之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往往倾向于接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主张，接受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冀求中国革命早日成功。然而，中国共产党毕竟经过了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洗礼，特别是积累了领导农民运动、巩固工农联盟的经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已经开始

考虑到了中国革命的某些特点，诸如农民是主要群众，土地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在经济力量方面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只能先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等等。他们在八七会议前后都提出过许多比较切合实际的意见，尤以毛泽东最为突出。正因如此，我们从这一时期中央及各省委的文献中几乎都可以看到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特点的探索互相交织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湖南致中央函》就深深地打上了这种历史的烙印。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湖南致中央函》，既不能断章取义，也不可一概而论，而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撷取其最主要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理解，笔者坚持认为，尽管毛泽东所起草的《湖南致中央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失误，但是其中心思想还是主张抛弃国民党旗帜，打起红旗，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建立工农革命军，建设工农民主政权。联系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前后提出的到农村边界山区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等等，应当说，毛泽东在《湖南致中央函》中所提出的抛弃国民党旗帜，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确实有其难能可贵之处。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基础出发，经过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革命实践和不断的理论总结，毛泽东终于1928年10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于1930年初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苏联珍藏有吴玉章的《八一革命》手稿

李 良 志

1989年9月，我应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邀请，赴莫斯科进行学术访问，在远东研究所、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访问了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并在国立列宁图书馆等单位查阅了一些资料。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最重要的收获，是经舍维廖夫同志协助发现了吴老的《八一革命》手稿。

吴老1927年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了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以后，他随起义部队转战江西、广东、福建，及至潮汕失败后，经香港、上海赴苏，于这年的12月抵达莫斯科。由于吴老亲自参加了南昌起义，又是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等院校的师生，热烈欢迎他前往介绍起义的有关情况。吴老欣然答应，并写了详细的有关南昌起义的报告提纲。12月22日，他首先在东方大学作了讲演。这时他的痔疮恶性发作，入院割治后，苏联立即安排他到克里木的萨达德海滨疗养。疗养中，他在东方大学讲演提纲的基础上，写成了《八一革命》一书，脱稿的时间是1928年5月30日。手稿完成后，他将手稿首先送到东

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最后将手稿送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他向共产国际执委递交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书面报告。吴老希望将来有一天《八一革命》这本书能传布到国内，可是这个手稿不仅在苏联未出版发行，并且一直未转送到国内。本来，吴老的记忆力惊人，可是在他所写的自传和所有的回忆录中，也从未提到过《八一革命》这个手稿，这一点是颇令人深思的。

我在莫斯科未看到《八一革命》一书的全文，只看到了部分复印件，但该书的全貌是很清楚的，现简介于下：

第一章 “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

- 一、中国革命的性质
- 二、中国革命的阶段
- 三、“八一革命”在历史上的意义

第二章 “八一革命”的远因

- 一、南昌武昌的斗争
- 二、党权运动
- 三、武汉成了革命组织的中心
- 四、蒋介石失势与叛变及与帝国主义和张作霖之勾结
- 五、南京政府之成立与帝国主义之利用
- 六、戴季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 七、蒋介石叛变与一般人的谬见

第三章 “八一革命”的近因

- 一、第二次北伐的决定
- 二、促成武汉叛变的事实

- 1.军事的紧急
- 2.财政的困难
- 3.工人阶级斗争之加紧
- 4.农民为土地而崛起
- 5.湖南省民会议的刺激
- 6.帝国主义的威吓
- 7.由阶级斗争之加紧而反映出之两党关系
- 8.郑州会议的关系
- 9.小资产阶级分子之动摇

三、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经过

第四章 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

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

- 1.中国革命的目的
 - a.对外在打倒帝国主义
 - b.对内在铲除军阀及封建残余
- 2.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
- 3.中国革命的前途
- 4.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战略
- 5.国民党的策略
- 6.三民主义的内容
- 7.国共两党合作政策的正确
- 8.批评同盟者之必要
- 9.阶级意识之必要
- 10.领导和推进作用之必要与为革命的出路而奋斗

11. 共产国际的策略

二、汪精卫所说共产国际训令之研究

1. 改组国民党

2. 发展农村革命

3. 改良军队

4. 设裁判所

三、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以前的）政策的错误

四、失了巩固革命的几个机会

第五章 “八一革命”的经过

一、农村革命为这次暴动的中心问题

二、回广东的计划

三、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四、政策的错误

1. 政治上

2. 军事上

五、由南昌到广东

第一期 由南昌——会昌

第二期 由会昌——流沙

第六章 “八一革命”失败的原因

一、没有认识农民革命的重要

二、没有保持着优越的精神和高度的勇敢

三、我党组织的松懈未能作暴动的核心

四、军队指挥不统一

五、武装党员的缺乏没有改良军队的性质

六、没有果断的精神和勇决的手段

第七章 “八一革命”的影响和教训

一、反革命的方面

二、革命的方面

1.引起各地暴动

2.形成广州苏维埃政权

3.造成中国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

第八章 结论

一、革命的客观环境

1、资产阶级的力量

2、革命的需要

二、革命的主观力量

1、加深和普及革命的理论

2、健全和扩大党的组织

《八一革命》一书，是当时我党最早全面系统介绍和总结南昌起义的重要文献之一，由于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吴老“孑然一身来到苏联，毫无参政文件，全凭记忆”，要求作者像现在这样来阐述南昌起义，这当然是不实际的；但是，吴老在书中对许多问题的论述，仍是十分深刻和精彩的。比如在阐述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时，吴老说：“八一革命是中国革命阶级力量转换的一个暴动，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一幕”，它“推动和促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要占最重要的位置”。在第一章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时，吴老明确地说：“中国革命直到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带有

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性质。因为革命的目的，在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军阀及封建残余使中国得到统一民主与独立自由，而这个目的，现在丝毫也没有达到。”吴老关于当时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同极“左”观点迥然不同，但同以后召开的中共六大的观点，同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的观点，则是完全一致的。又如，吴老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时，把没有认识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作为第一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八一革命》一书关于南昌起义经过的介绍，对学术界长期以来一些争论的问题，如起义究竟是何时、何人首先提出？最后怎样形成决定？起义有没有设总指挥部？是何时、何人？起义的准备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